

昆都仑文史第五辑目录

包钢史料

- 包钢，倾注着乌老的深情厚爱.....史玉华 李汀 (1)
- 回顾包头老一代设计人员的几段经历.....顾钧 (7)
- 包钢建厂初期选择水源地前前后后.....吕智豪 (18)
- 回顾全国各地支援包钢建设的片断.....阎克英 (26)
- 包头钢铁公司与军事工业.....于俊 (34)
- 三枚金桔.....张树宽 (39)

市政史料

- 建国前的包头教育简况.....张曙辉 (41)
- 国共通邮史话.....李文勋 (52)
- 创刊《包头青年报》的回顾.....王倚一 徐淑娴 (56)
- 育才幼儿园.....薛飙 (61)
- 旧包头的妓院和性病传播.....郭休绪 (69)

老干部忆当年

- 对“五一”反扫荡的片断回忆.....苏中 (72)
- 从当童养媳到走向革命.....孙岐珍 (81)
- 对通辽以北地区一次战斗的回忆.....〔蒙古族〕郑林台 (87)
- 回忆点勒素之战.....任福才 (90)
- 激战态基庙.....任福才 (93)
- 从西北卫校到朝鲜战场.....李士昌 (96)
- 难忘的战地摄影生涯.....杜守恒 (103)

昆都仑文史

人物春秋

- 塞外文豪——荣祥……………狄生云(113)
马海德同志在昆区……………李士昌(121)
老一团抗战人物……………高志昌(123)
马占山将军轶事……………易 磐(130)
智勇双全的宋政委……………郭体绪(131)

鹿原名人志

- 内科专家康子铮……………阎充英〔蒙古族〕乌云(133)
药理学教授石山……………朱企泰 阎充英(143)
著名画家白铭……………王德恭(152)
中年书法家麻天佑……………王新洲 高志昌(159)
稀土事业的领导者——葛鸿文……………张 毓(163)

政协人物

- 眼科专家郭体绪……………张 清(171)
矢志不渝报国情……………李光玠(180)
走向光明……………易 磐(185)
优秀的民族教育工作者包家驹……………〔蒙古族〕包广仁(189)
“老有所为精英奖”获得者小志
……………〔满族〕关铁玉 刘 捷(195)

- 编后记……………昆区政协文史委员会(198)

包钢，倾注着乌老的深情厚爱

史玉华 李汀

乌兰夫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心情非常悲痛。岁月的变迁莫能使我们忘却故人，时间的流逝没有磨灭我们的记忆，乌老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浮现，在耳边萦绕，永远难忘乌老对包钢的深情厚爱。

包钢，工业基础薄弱，生活条件艰苦。建厂的地方，到处都是堆积起的一道道沙梁，上面布满了一条条花纹，活象一只屈身蹲卧的猛虎。山风吹来，“猛虎”一跃而起，张牙舞爪，风起沙涌，肆意闯荡，坚硬的沙粒把脸打肿了，呼啸的山风把脸吹黑了，口干唇裂，一个个建设者成了黑脸大汉。夜晚风沙钻进帐篷，搅得建设者夜不能寐，广大建设者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建设。工人进驻工地不到两个月，就是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乌兰夫主席派内蒙古歌舞团到工地慰问演出。工人坐在旷野荒郊，演员站在露天舞台上，用歌喉传递着党和政府的深情厚意，表达着乌兰夫同志对建设者的关怀。慰问演出过后不久，乌兰夫与权星垣来工地视察。那时，一切都刚刚开始，广大建筑工人平地起家，开始砌筑家属宿舍。乌兰夫沿着脚手架看望工人，问寒问暖，从工人的起居到饮食，从施工建设到文化生活，他老人家都关心得无微不至。看到工人住简房睡二层铺，特别嘱咐我们要搞好环境卫生，不要闹传染病。并一再嘱咐，要体谅工人的辛苦，多想工人的难处，关心工人，尊重工人，大家同

心同德早日把包钢建设起来。

1958年4月26日，包钢焦炉工程举行开工典礼，乌兰夫同志再次来到喧腾的工地，为焦炉工程剪彩，并开襟解怀，挥锹装车，一锹两锹，不间断地挥动着大锹，很快把混凝土小车装满了，为二号贮煤塔浇灌了第一车混凝土，掀开了包钢建设史上沸腾的一页。广大建设者看见乌老额角出汗了，都抢着去夺他手里的锹，他固执地又装了一车，然后直起腰，望着周围忙碌着的工人、干部点头微笑。

创业是艰难的，获得的支持也是广泛有效的。乌兰夫同志曾陪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彭真、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视察包钢，使包钢各族职工深受鼓舞。

1958年7月19日，乌兰夫同志陪同朱德同志再次视察了包钢，翌日视察白云鄂博铁矿。在去白云鄂博的专车上，两位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中苏白云鄂博地区合作研究队主要负责人。

朱德同志和乌兰夫同志步履矫健的登上白云鄂博主峰，一览无余地俯视铁矿全貌。白云鄂博铁矿是包钢的矿石供应基地，原是牧人们祭奉神的敖包。自从成了包钢的矿石供应基地以后，山下便热闹起来了。铁路穿过阴山，通过草原，直到山脚。当年牧人们三年举行一次“那达慕”的地方，不到四年时间，就变成一个拥有上万人口的城镇。矿北是工业区，正在修建一所全国最大的铁矿石破碎厂；矿南是街市和居民住宅区，一派欣欣向荣。谁知几年前白云鄂博敖包搬家，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勘探队一进白云铁矿，反动贵族一方面在牧民中散布流言蜚语，蛊惑牧民阻止白云鄂博的勘探工作，胡说什么“南蛮子挖走了山里的金丹老佛爷，草原要降灾的”；一方面又暗中鼓动几个旗的反动上层人物策划叛乱，与流窜在草原上的土匪相呼应，使草原不得安宁，工业建设不能进行。国家及时派来了剿匪部队，赶走和消灭了豺狼。当时担任达茂旗旗委副书记、副旗长、后调任白云铁矿任党

委书记的巴彦都荣同志带领旗干部走家串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发矿山的决定，并把乌兰夫的照片翻印成八寸照片，送到广大牧民家里，使广大牧民知道了毛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乌兰夫是蒙古族的领头人。广大牧民把毛主席像和乌兰夫照片挂在蒙古包里，他们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乌兰夫是我们蒙古族的领头人，我们跟他们干革命。”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在乌兰夫的影响下，在旗委的有力推动下，大喇嘛首先表示敖包可以搬迁，于是，将白云鄂博敖包搬到白云宝格达——白云敖包。

朱德、乌兰夫详细地询问了矿山建设情况，在俱乐部接见了工人代表、牧民代表，然后驱车到离矿山七里路的乌门胡图格的牧民业日皮勒家作客。散置于碧草绿树中的白色蒙古包，在阳光照耀下，犹如一颗颗白蘑，耸立于草毯之上。圆圆的天顶，温馨的包房，一别于矗地擎天的大厦。朱德、乌兰夫在巴彦都荣陪同下，与业日皮勒和他妻子钦仁皮勒喝着奶茶，谈叙家常，感情融洽，气氛和谐，犹如一家人一样。乌兰夫喜爱的抱起主人的小男孩图木格，亲切的夸奖着说：“这孩子真好，长得真壮实！”

大家在一块儿谈叙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驱车到牧民苏和家做客。

在白云鄂博刚开始勘探时没有水，勘探队员化雪溶冰，作为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苏和放牧看到勘探队缺水，就顶着凛冽的寒风，帮助勘探队找到了白云布拉格。白云布拉格是个不冻泉，淙淙流水，常年不断。勘探队找到了水源。用汽车运水，解决了一大难题。朱德得知这位牧民为开发白云铁矿做出过贡献，满怀深情地握住苏和的手表示谢意。巴彦都荣把朱总司令的谢意和关怀翻译给苏和听，苏和激动得把斟满了酒的银碗高高举过头顶，献给朱德和乌兰夫，非常动情地说：“总司令，是党救了我，为建设自己的矿山找水，是我该做的事，哪值得您感谢。您整天为

国操劳，为民效力，怎么担得起您来看望我，我苏和一辈子也不忘党的恩情。”

乌兰夫望着满怀激情的苏和，抚摸着站在一旁的苏和的女儿，意味深长地鼓励他们世世代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乌兰夫与人民血相通，心相印。他们离开牧民的家，业日皮勒骑上马，带上奶食，分赴到各蒙古包，大家分享他们一家人的幸福。

1958年包钢进入大规模建设，计划施工的主体厂矿和辅助设施共有115个项目。工程浩繁，工期紧迫，材料不足，设备订货不能按时到货，困难重重，严重影响建设。乌兰夫得知这一情况后，分别致函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北等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请求支援。在致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信中说：“包钢在你省订货的设备和材料，仍需按中央平衡分配的时间按期或提前予以交付为盼。按内蒙现在工业状况，包钢的建成没有各省市的援助是不可能的。”他还写信给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同志，请他对包钢建设中存在的钢材、水泥、重大设备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给予解决。1958年11月26日，乌兰夫同志就包钢建设中的几个紧迫问题，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汇报了包钢自选定厂址五年来各项重点工程的建设速度和预计在1959年实现出铁、出钢、出钢材的设想；提出包钢在基建投资，尤其在原材料和附属设备、非标准设备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此特向中央提出把包钢的建设列为专题解决、请求全国各省市支援包钢等七项建议。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乌兰夫就包钢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问题。周总理为此专门接见了包钢经理杨维，详细地询问了包钢的困难。随后，乌兰夫向邓小平、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转交了包钢1959年1月28日和29日的两个报告。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包钢建设中还存有
不少问题，这次设备订货会议中，有些材料设备得到了解决，有

些还没有解决。包钢写了两个报告，现送上请审阅，并希望指定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2月3日，邓小平就乌兰夫1月31日报告批示：“陈云、富春同志阅后交一波同志，请一波处理报告中所提的问题。”2月6日，薄一波办公室复函乌兰夫：“包钢这个报告，一波同志已处理。据冶金部王部长报告，‘这些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正与有关部门商议解决中’。请报邓副总理。”

1959年1月9日，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包钢建设的领导和支援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包钢正进入一个比以往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建设过程，自治区的党政机关和各族人民、国家干部和建设包钢的全体职工，要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支援包钢。《决定》要求必须以保证重点的精神，把为包钢建设所必须的一切建设项目首先纳入地方计划，然后安排其它各项事业。由于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多方努力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包钢建设出现空前的大好形势，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支援包钢建设的热潮，确保了1959年9月提前一年建成了以一号高炉为中心的各项配套工程。9月20日包钢一号高炉开始烘炉。乌兰夫同志和内蒙古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亲临包钢炼铁厂视察出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听取包钢领导同志的汇报，亲切慰问了建设包钢的各族广大职工。9月26日包钢一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结束了内蒙古草原寸铁不生的历史，包钢从此加入了祖国钢铁大军的行列。10月15日，周总理乘专机由兰州抵达包头，专程参加庆祝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盛典。周总理在叶剑英、乌兰夫等陪同下来到会场。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广大职工热烈鼓掌，纵情欢呼，大家共同分享着胜利的喜悦。继一号高炉出铁后，1960年5月5日，乌兰夫同志亲自为包钢一号平炉剪彩，并视察了炼钢厂。乌兰夫热情洋溢地说：“包钢一号平炉是一个设备先进、技术复杂的大型工程。这个工程在较短的时间内能以建

成，进一步说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

“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已经跨入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同时并进的新阶段。因此，在继续加强领导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前完成包钢和其它重点建设的基本建设任务，保证使全部工程尽快按质按量建成投入生产的同时，还必须以足够的力量，保证搞好当前的钢铁生产，尽快的提高高炉、平炉利用系数，增大钢铁产量，提高钢铁质量，降低成本，使包钢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以便更快地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和科学文化的自治区。实现这个光荣的任务，是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者所担负的责任更重大。包头工业基地已具有一定规模，在发展自治区经济建设中，包头要发挥其基地的作用。要大量培养建设人才，不断增加技术设备，满足生产建设发展需要。在培养职工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壮大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有计划地发展与培养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技术职工与企业管理干部，壮大民族工人阶级是培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加强民族团结，提高各民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最好办法之一。”

乌兰夫的话满腹深情，一腔衷曲，深深铭记在包钢广大职工心中。

几十年过去了，日月不灭，苍穹不老，山河不死，广大钢铁工人站在平炉旁，依然听到乌老心声的怦响，依然感到乌老心房的滚烫，万朵绚丽的钢花，熔聚着钢铁工人对乌老的深情厚意，滚滚奔腾的钢水，凝结着钢铁工人对乌老的崇敬和爱戴。

本文作者：史玉华，包钢党委书记，昆区及包头市人大代表；李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二冶经理办副主任，现已离休。

回顾包头老一代 设计人员的几段经历

顾 钧

1957年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包头成立黑色冶金设计分院，从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调来职工45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70人。这是一支从内地来支援包头钢铁基地建设人数较多、时间较早的知识分子队伍。三十多年来大家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包头市和内蒙古的建设。同时也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值得回忆。今择记一二，但愿能作为借鉴，帮助我们发扬一些好的传统，摆脱一些陈旧观念的羁绊，减少一些今后的失误，振奋中华民族精神，使我们国家快一点发达起来。

(一)

包院成立，包钢工程的大量施工图设计任务已经迫在眉睫，1957年包钢主体工程已经开工。原先拟定包头设计院的任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量是管理国外设计。只有一部分施工图设计由国内配套完成。后来情况起了变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材料、设备供应和施工能力等种种原因，改为从炼钢开始，施工图统统由国内自己承担。繁重的设计工作量和包院当时的人力相比，相差很悬殊，1958年4月，包钢公司将设计处、勘察工区和设计院合并，全院人数增加到877人，其中技术人员有525名，设计力量有所增加，但毕竟还是一支新组建起来的年轻的设计队伍，专业也不配套。1958年地方钢铁厂遍地开花，包院又增加了内蒙、山西、宁夏、甘肃等省、区的地方厂设计，任务更加繁

重。但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这支队伍没有被繁重的任务压倒。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在“大跃进”形势要求下的各项设计任务，某些方面在质量上还有些新的突破。

后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利用兰州、西安等地一些企业和单位下马的机会，1962年从这两地又调入包院一批技术人员。加上1963年国家分配给包院几十名大学生，力量顿时壮大，使包院初步具备在1963年下半年分别成立炼铁、炼钢、轧钢三个专业设计科的条件。其他专业设计科也相应增加了力量。这几次力量的充实，为包院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与实力奠定了基础。

(二)

包院成立初期，即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除了要完成繁重的设计任务之外，还要同时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

解放初期，着重“阶级斗争”教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已经有口皆碑，成为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成了人们的基本工作原则和方法。

这几年的政治运动，大致可罗列如下：

1958年2月，继反右派斗争之后，在设计人员中开展向党交心活动，随后即开展了红专辩论。

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

1960年进行“新三反”运动。

1961年4月在干部中进行“五好四查”，在工人中进行“六好三勤”，并同时进行肃反整风。是年，开始精减人员。

1962年开始对“右倾”分子甄别平反。

1963年开展增产节约及“五反”运动。

1964年11月开展全国性的设计革命运动。

1965年进行“四清”。

1966年8月，拉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动乱开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政治运动习以为常，显然它必须占用大量的业务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与此同时，还有经常性的“干部参加劳动”，和配合政治运动的许多群众活动。如当时在“大跃进”时期的“保钢保铁”、“大炼钢铁”、实现“人民公社”化等等，都占去了设计人员大量业务工作时间。

(三)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设计院位居冶金工业系统，更应全力以赴，当时设计人员有三条战线，一条是保证包钢工程建设；一条是参加地方厂建设小钢铁厂，并协助他们开炉生产；还有一条便是自己大炼钢铁。这都是保钢保铁的具体任务。目标是“超英赶美”，因此这也是政治任务。

1958年6月设计院在街坊内东北部兴办“七一”钢厂，既不理睬城市规划，也不讲环境保护，修起3立方米小高炉，此外还修建了土焦炉，土法炼钢的“鸡窝炉”。除了“七一”钢厂的员工之外，全院职工都要参加砸矿石、炼钢、炼焦等劳动。一时，街坊内白天烟尘弥漫，夜里灯火通明。消耗了大量煤、电等能源。把收集来的废钢烂铁，砸碎了扔进“鸡窝炉”内熔化，最后拣出来的是不成形的和不明成分的“钢块”，用这种“钢块”过秤，登记“产量”，就可以报捷了。在这种基础上，常常可以听到电台广播全国钢产量不断上升的消息，劳动者聊以自慰。在紧张劳动之余，夜里十二点，可以到食堂吃一餐敞开供应的夜宵，这是标志着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似乎共产主义已经为期不远了。

当时设计院一位党委副书记不只一次地鼓舞大家，“共产主义就像在大青山脚下，大家努力干吧！”在这种狂热的鼓动下，

大家为实现美好的理想而埋头苦干。

当时的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蛮干，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自然会有人提出异议。但当时有一句常被人当作口头禅的话：“不要光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群众也就无权讨论了。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什么问题都可以上阶级斗争的纲，1959年开展的反右倾运动，要求从五个方面进行对照：

一、对总路线、大跃进的看法和态度；

二、对群众运动的看法和态度；

三、对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的看法和态度，是否能打破洋框框，搞土洋结合；

四、对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是否摆正了？是否做到了又红又专；

五、反对暮气与个人主义，看有没有干劲，革命意志是否衰退？

如在包钢工程中反对“投资一变二”那就是右倾了。以上各条，看了足以叫人警觉。

当时对知识分子处在被团结、教育、改造的地位。所以一般人都学会了做到有自知之明，不能在政治思想领域把自己树立成资产阶级靶子。慢慢习惯于处在一种违心的屈从状态中。

(四)

在包钢设计工作中，技术经济论证和科学分析常常被长官意志所取代。一个口号，就可以把设计折腾几个反复。

1958年4月15日的《包钢工作简报》第六期称：“根据冶金部精神，要求包钢投资从21亿元降到11亿元左右，因此公司决定在节约的原则下，能缓建的工程一律缓建，大力精减机构，降低建设投资，把‘投资省一半，速度加一番’作为包钢建设的奋斗口号”。

当时包钢建设已经开始，规模已经确定，总平面已经铺开，

投资省一半的要求，是比较主观的。但是照办还是不照办被上纲为对总路线、大跃进的态度问题。后来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有些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被戴上“右倾”的帽子。

设计院在1958年明确归属包钢公司领导，对领导机关作出这样的决定和提出的奋斗口号必须执行。当年5月，草草提出了《包钢300万吨规模冶金工厂部分节约方案草案》。

当时和我们一起从北京调来的史星三院长忧心忡忡，常常征求大家对投资减一半的看法，并组织研究对策。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到我家里来，找我陪他到正在施工的工地去，察看施工情况，面对现实，琢磨投资降到11亿的可能性和将造成的后果。后来他在公司的讨论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强调应该尊重设计工作的内在规律，要给设计工作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自主权，不应用“投资省一半”这种口号来代替设计结论。结果他受到了批判，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1959年10月，史星三同志带病调离设计院。事后许多同志都感到十分惋惜。

此后，又做了多次包钢节约方案，修改补充初步设计方案，第一期工程填平补齐方案等等。到1962年底，冶金部指令以包院为总包院，全面开展包钢初步设计的修改和补充，有一些问题得到了纠正。1963年3月26日，冶金部在北京召开审核包钢补充初步设计方案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除了包钢、冶金部各设计院之外还有铁道部设计院、煤矿设计院、建工部给排水设计院等单位参加。审查会议于5月17日结束。会上对矿山、选矿、烧结的有关设计问题作出了决定。

此后，包钢一面建设一面仍进行补充初步设计的工作。直到1965年初，冶金部召开包、武、太会议，对包钢、武钢、太钢今后如何建设作出了原则决定。对即将完成的包钢补充初步设计不再要求完成，包院对包钢补充初步设计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工作给了我们做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总体设

计的锻炼机会。通过这些工作，设计人员水平有一次“质”的提高，是包院设计力量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五)

我们为包钢1150初轧厂前后一共做了五套施工图，谈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过程如下：

第一套图于1958年11月完成。其内容按照包钢投资节约一半的精神，和国外设计相比取消了2100吨设备，厂房由钢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投资降为4600万元。

第二套图于1959年5月份完成。在检查设计质量中认为1150初轧厂设计中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过多，于是把原设计的初轧均热炉跨和钢坯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改为钢结构。

第三套施工图是在1959年10月份，按照上级指示：“国外设计不作任何修改。”又按苏联为包钢所作初步设计，做了施工图。

第四套图是在1960年按照上级提出“速度是灵魂，上马第一”的要求，为了解决建设钢材供应不上的问题，又把厂房结构全部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修改的同时，为了做到“设计为生产服务”、“三满意”、“四个一样”等，按照厂方提出的考虑双锭轧制，轧机能力按年产530万吨设计，但规模仍按300万吨不变等要求来完成的。

第五套施工图，按照冶金部1964年审批包钢1150初轧修改初步设计的意见：车间规模按年产150万吨钢坯进行设计，但设计中要考虑到将来要发展到300万吨规模，凡是可以分期建设的，这次设计中不予考虑。按此包院作了第五次施工图，也是最后一套施工图。

1965年初轧厂开始施工，该项设计从此结束。设计指导原则多变，增加了许多设计工作量。从另一方面看，通过反复设计，增加了设计人员的锻炼机会，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最后，

这一个我国自己制造设备，我国自己设计的初轧厂还是比较成功的。

（六）

设计院初期的工作特点是任务重，加班加点多，参加体力劳动多，需要经常到地方厂出差多。在大跃进时期，设计大楼里经常灯火通明，加班加点。那时候超额工作没有奖金，出差补贴十分微薄，而大家还是维持着相当高的工作热情，可惜的是不少力气都花在一些无效劳动上。当时大炼钢铁所作的虚功自不必说，设计院还搞了“畅想设计”、“装配设计”、使用“超声波”等等，都占用了设计人员不少时间。

1960年全国经济开始出现困难，首先反映在吃的方面。市面上食品供应开始紧张，食堂里菜的油水越来越少，设计人员粮食定量普遍只有27斤，开始填不饱肚皮。炊事人员为大家千方百计主食搞“增量法”，副食搞“人造肉”，其实只能起一点精神作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包钢工地现场设计组的同志，由于活动量大，已按相同工种施工人员的定量用粮，困难时期出现以后，这种做法受到了指责，有些人认为这是多吃多占，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党支部领导的监督下，定量一律改回27斤，而且为此专门召集会议，要求每个人都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上纲为：“说每月27斤粮食不够吃，那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给三面红旗抹黑”，岂能等闲视之。

但不久，食物供应的越来越匮乏使得用“增量法”也无法满足每家每户精打细算的用粮要求，两年前用“人民公社”化的名义办起来的集体食堂开始解体。家家户户都必须精确地以半两一两为单位来计划用粮，而且采用干稀搭配、瓜菜代等方法，来维持自认为最合适的膳食方式。这是两年前谁也未曾想到的。

记得我每天带到炼钢工地上去的饭盒里，经常只能装三、四只

一两一只的筱面蒸饺，馅是甜菜叶子，没有一点荤腥或油水。早上在家里只能喝一碗玉米面糊糊。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到工地办公室，已经精疲力尽腿软气短，常常要坐在值班用的帆布床上，提前吃掉一些饭盒里的“午餐”，才能缓过劲来开始工作。

在工作劳动紧张而食物缺乏的情况下，人员体质普遍下降，设计院浮肿病人很普遍，患肝炎者也不少，但不少人还得抱病工作，有的人至今留下了后遗症。

在1959年底，一开始出现困难苗头，设计院就决定兴办农场。在青年农场附近建设路北侧，建房、打井、修筑猪场鸡舍，用拖拉机开垦一片菜地，种菜种粮。院里抽调了一批干部驻农场经营管理。其余职工轮流到农场参加劳动。当时大家对农场寄以厚望，劳动热情很高，有时一天就去农场几卡车人，顶着风吹日晒，干得热火朝天。中午每人可饱食一大碗丰盛的烩菜和两只窝窝头，大家对此都很满意。驻在农场的同志更是干劲十足，春天育苗常常遇到刮风天气，为了保护好秧苗，不惜用自己盖的棉被覆盖在苗圃上，精神十分可嘉。

但后来由于设计任务繁重，大家对务农又都是外行，虽化了许多劳力，没有获得应有的收成，从经济上得不偿失，农场只得停办，1963年1月将农场全部折价让给部队经营。

在浮肿病流行的时候，组织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61年初党委决定：1.成立消灭浮肿病的工作组，对职工定期检查和进行必要的治疗；2.工作安排要注意劳逸结合；3.按照市委要求对浮肿病员治疗并普遍进行一次思想教育，解除患者思想负担。

在这一段时期中大家遭遇的困难都很多，经历过的人都能记忆犹新，毋庸赘述。人们把这几年称为“困难时期”。引起困难的原因，固然有“自然灾害”和别人“卡脖子”等等，但决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是前两年自己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冒进、浮夸、和浪费，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

(七)

五、六十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权威性的分析，“我国知识分子中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其余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中还有百分之一、二、三是一遇风浪就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极端反动的人，即阶级敌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

基于这个论断，经常性的斗争不足为奇，而且步步升级。

在1964年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就提出要与少慢差费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5年设计院在四清运动中，清思想，就是要清除设计人员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在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5月25日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文革”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时设计院在四清工作组领导下，也贴出了批判三种意识形态（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种意识形态）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大字报。许多人被点了名。

1966年8月8日中央公布了《十六条》。8月14日，包院部分群众有组织地贴出了揭发批判“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在设计院内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1966年8月设计院内也开展“破四旧”，一些外来的“红卫兵”在院内“革命造反派”陪同下，挨家挨户地破四旧。被指为属于“四旧”的物品有：西服、旗袍、连衣裙、高跟鞋、牛仔褲、古典文学和音乐唱片、麻将、扑克、金银首饰、结婚照片和戴着学士帽的照片，以及人参、阿膠等补药……只要“红卫兵”认为“四旧”，都在应破之列。一时连搜带缴，足足放了一屋

子，在办公楼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办了一个展览会。

当时有这样一句话：“上海有条南京路，包头有个设计院”把设计院喻作资产阶级在包头的“巢穴”，甚至把上海话亦列为不许说的“混蛋话”。

在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工程师们和一批年岁较大的同志几乎都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嫌”、“坏分子”等等各式各样的帽子。并进行“群众专政”。1968年3月，一次就有21名同志被强加各种罪名实行“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

1968年7、8月间，设计院在“挖肃”斗争中触及116人，被群众批判89人，批斗27人，49户被抄了家。

1968年11月开展挖“新内人党”，打击面越发扩大。在12月的一次“宽严大会”上“专政”26人，涉及300余人。在挖“新内人党”的五个月里共触及126人，“专政”59人，进“学习班”39人，因被打致伤残发公伤证者26人，局部伤残25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

在“十年浩劫”中设计人员受的迫害形形色色，以上仅列举一般。

设计人员虽身处逆境，在1966年到1976年间，仍完成了大量的设计工作。主要工程项目有：包钢1800立方米第三号高炉；50吨氧气顶吹转炉；酒泉钢铁公司的炼、轧钢初步设计和30吨氧气顶吹转炉；西宁特殊钢厂的电炉和轧钢车间；广东韶关钢铁厂的255立方米高炉、10吨氧气顶吹转炉和轧钢车间等；还有呼和浩特钢厂改建；兰州钢厂；西北铁合金厂；新疆“八一”钢厂和静钢铁厂等。

其中西宁特殊钢厂设计在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和冶金部优秀设计项目。包钢三号高炉和转炉车间都是1970年在军管会领导期

间，设计人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突击设计出来的，都收到了较好的质量效果。设计人员就是这样在十年浩劫之中，仍不断作出贡献。

1976年“四人帮”覆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打破了“左”倾思想的长期禁锢，知识分子得以正名。在中央反复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创造宽松环境与和谐气氛，设计人员的智慧和才能才有了充分发挥的条件。这几年来，设计队伍有了新的发展和壮大。作为老一代的设计人员为四化建设做工作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但都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和好的传统留给年轻的一代，希望我们这支设计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推陈出新，为创造祖国美好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包头市政协副主席、冶金工业部包头钢铁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包钢建厂初期选择水源地前前后后

吕智豪

一九五三年六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开始建设。作为工业尖兵的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工程地质队来到包头（部队设在今东河区和平路115号），进行选厂勘察，对三处初选厂址（宋家壕，乌梁素海，万水泉）进行地形测量和地质钻探，为最后确定未来包钢厂址提供可靠的地质资料。并经设计部门有关专家研究分析，对比论证，一致同意以宋家壕作为包钢厂址，呈报上级审批。一九五四年六月，经中央政府经济委员会批准，包钢厂址选定在离包头市旧城（今东河区）约26公里处宋家壕村附近建厂。

建设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需要大量生产用水。当时，按初步设计要求，决定取自用之不尽的黄河水作为包钢的供水水源地。但从黄河取水，却存在着以下不利条件。

一、包头市附近的黄河两岸均为沙滩，常年不断地受到河水冲刷和淤积，河道摆动不定经常变迁。据包头县志记载：几十年来，曾有多次大的变动，当地农民形容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有在包头西约35公里处，昭君坟渡口一带，两岸为岩石露头，系属岩石河床，但相互关系不甚明确，尚需进行钻探，进一步了解河床的地质条件。唯独此处近百年来河身未变。北岸还有个西海子，面积为10平方公里，最大水容量为1,000万立方米，河水大时可自流入海，是个天然的储水库。

二、根据磴口水文站资料：黄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混沙，在洪水期平均为百分之三，枯水期平均为百分之一左右，故若取用黄河水，必须进行河水沉淀处理设施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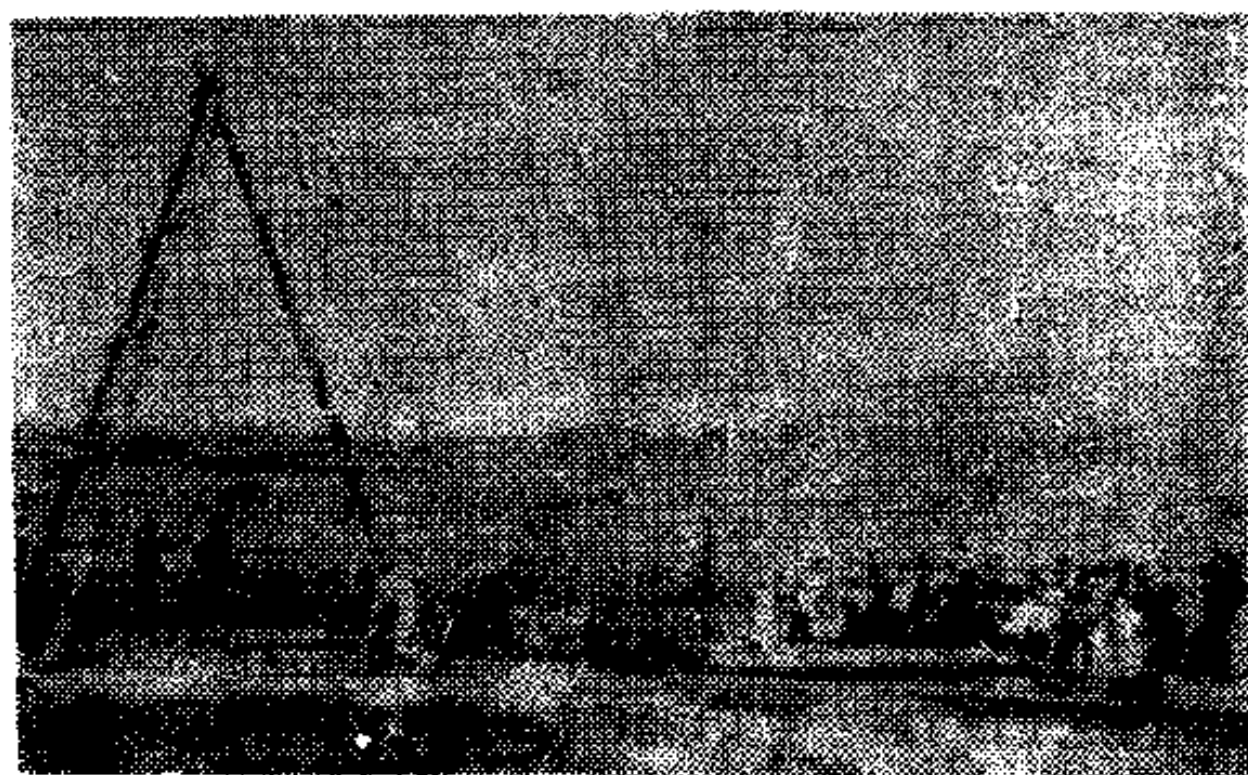
三、该地区气温较低，最低可达零下摄氏23度，河水冰冻期为三至四个月，冰结厚度为0.6米，每年冰凌期常常造成冰坝，故对河中取水设施有不安全之因素。

四、在昭君坟渡口处，若拟筑坝来提高黄河水位引水入厂，固然是充分利用黄河水的根本办法，但需要大量的投资及建设期过长。若在河中抽水入厂。因厂区与黄河水面高程差为60米，需要二级梯抽水泵站，故需经常消耗电力为6000瓩。

一九五四年四月，担负包钢建设总体设计任务的苏联专家，到包头审查包钢造厂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书时，就黄河水源问题，实地调查了宋家壕厂区周围的地形，发现厂区东侧有昆都仑河，北依大青山和乌拉山各冲沟的山前冲积平原，西侧洼地，南侧黄河。根据这样的地形和地质条件，在该区域内是否存在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呢？需进行勘探，若查明区域内确有丰富的地下水，而且能满足包钢工业用水的需要，何必要舍近求远？而不利用既经济又质优的地下水呢？按设计要求：包钢计划第一期（1962年前）用水量为3.5立方/秒，第二期为6.5立方/秒。在苏联专家设计要求下，决定在宋家壕厂区周围开始进行水文地质勘察。

由谁来承担该项工程？当时，成为一个难题。因为，筹备处工程地质队，是担负包钢选厂勘察的，都是从事工程地质勘察专业的技术人员，不懂得水文地质勘察技术。只好借求外援，并由设计处李光处长偕同工程地质勘察任务书到北京，请示重工业部（今冶金工业部）派专业水文地质队来包头承担包钢厂区供水水文地质勘察任务。当时，重工业部设计司唐司长对他们说：部里搞水文地质专业人才很少，仅有一部分，现尚在武钢工作，抽不出来支援你们，希望包钢自力更生，在现有的工程地质专业人员

的基础上，设法自己干。当时，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刚刚开始，百业待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技术力量相当薄弱。尤其水文地质这门学科，几乎是一项空白。新的技术力量又还没有培养出来。是等待，还是自力更生？这是对包钢建设者的一个严峻考验。包钢公司杨维也鼓励说：“水文地质对我们是一门新的科学，现在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大学生，现从学校培养，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依靠你们现有的技术人员，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外援无门的条件下，包钢厂区供水水文地质勘察任务，仍落在工程地质队员的身上。由原非地质院校毕业的，只从事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一、二年历史的大学生洪维闹、施耀祖带领其他技术人员，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争取早日建成包钢的强烈愿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勇敢地接受了包钢厂区供水水文地质勘察任务。在苏联专家具体指导下，制定了厂区供水水文地质应体现如下内容的勘察工作纲要。



1954年包钢地质队正在宋家壕厂区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时，使用笨重的人工手拉冲击钻机的情况。 吕智豪 摄

- 一、应探明各蓄水层的埋藏深度。
- 二、弄清地下水的特征，它是属于自由水，还是承压水。
- 三、探明蓄水层的厚度，及各分层的厚度以及有关夹层等。
- 四、对蓄水层的岩性，按每隔0.5米采取试样，进行分析化验。
- 五、测定蓄水层的透水性，了解整个区域内蓄水区渗透系数的变化情况。
- 六、测定地下水的化学成份，细菌含量及其水温等。
- 七、布置区域内地下水长期观察孔，以了解蓄水区在不同季节里的水位变化规律。
- 八、掌握地表水与地下水之相互关系及各蓄水层的相互关系。
- 九、计算区域内各蓄水区地下水总储量。

在苏联专家指导和帮助下，边学边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编号为54—108的宋家壕厂区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程（后简称54108工程）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在只有几台简陋的工程地质手摇式钻机的条件下，全面地展开。

宋家壕厂址在包头旧城（今东河区）西约26公里处，座落在乌拉山南麓，黄河以北的台地上，北起包宁公路，南至营盘梁，东滨昆都仑河，西靠宋家壕洼地。在其勘察区域内就其地形可分山地和平原两类。

山地主要以大青山、乌拉山及色尔腾山为主要山岭，统属于内蒙古著名的阴山山脉系统，分布于蒙古高原之南沿，为东西走向。自黄河平原北望此诸山脉，势如高原南部东西连绵的天然屏障，诸山之间所环抱者为山间凹地，凹地东西方向延长，系因下陷所造成，大青山和乌拉山南缘为陷落地区形成山前平原。

平原系指大青山和乌拉山之南缘开阔山前平原而论，南以黄河超河漫滩，二级阶梯为界，与黄河平原相接壤，南北5至20公里。中部较宽，东西两边较狭，海拔1020~1100公尺，高在黄

河平原10—90公尺，并以百分之零点五坡度由北向南倾斜，地势平缓。唯东部较高。并为河流沟谷所割切，其深度为二至五公尺左右。同时，普遍有风成沉积，故微呈凹凸不平现象，西部较低，且无明显沟谷割切及风成堆积现象，表面甚为平坦，山前平原东西向延展甚远，在本区域内所见约长50公里。

本区域内的水系与水文情况，主要有昆都仑河与哈德门沟。昆都仑河发源于固阳县境内东北大青山脉北麓之春坤山。由发源地向西南流经固阳、公益明至后口子转向南流，横切大青山、乌拉山后段（段于山前平原、仅在洪水期始有水流注入黄河）。全长约126公里，流域面积2700平方公里，水流由北气沟成元福滩至固阳一带，沿河有泉水渗出，流量为0.2立方/秒。由固阳至公益明处有水流，公益明至后口子水渗入地下，河面断流，后口子以下，水又沿河渗出地面呈明流。一般流量为0.1立方/秒。根据昆都仑河前口子水文站记载：每年有多次洪水发生，洪水流量一般为30至50立方/秒，最大者为179立方/秒，洪水期多发生在每年七、八月间，昆都仑河流域地质及地势变化很大，该地区降水量很少，河水除蒸发及部分渗入地下外，地面流量很少。为查清该河的正确水文地质资料，故必须在该河山前出口处以下地段两侧进行钻探及涌水量试验。于是，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开始包钢厂区周围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先从西河楞至南排地，韩胜基窑子至窝兜兔壕布置两条横截昆都仑河断面勘察线上，每以1000公尺的间距，布置若干钻探点，而后选择6处进行扬水试验，测定其涌水量。由于缺乏经验，扬水试验多次遭到失败。但最后还是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中将靠近南排村的25号扬水试验孔，建成永久的抽水井，作为今后在该地区大规模住宅建筑，提供生产施工和生活用水。

完成昆都仑河流域内的水文地质勘察工作之后，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开始进行哈德门沟山前冲积平原区域的水文地质勘察，

在宋家壕以西，从张家营子至甲燕窑子，垂直于黄河布置了第三条勘察线，又从宋家壕向西到哈德门沟，垂直于乌拉山各冲沟布置了第四条钻探线，以了解黄河北岸台地冲积层和各山沟冲积扇蓄水层的情况。并从这两条垂直向的勘察孔中，选择多处钻孔进行扬水试验，取得大量水分地质。其中将靠近张家营子村的一个扬水试验孔，建成生产抽水井后，移交给包头冶金建设公司（今二冶），为该公司日后在该地区大规模建造职工住宅，提供施工和生活用水。

此时，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工程地质队改名为包钢工程地质队，队部从包头市旧城迁移到西河楞村帐篷内办公。当时，职工都住在帐篷里，工作与生活都十分艰苦。生产上使用的是手拉式人工冲击钻机（如图），全靠人力推拉，劳动强度大，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工作地点都是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上，无路可走，汽车无法行驶，每次搬运钻具设备，全靠人工肩扛。当时气候也十分恶劣。每逢风季到来，几乎天天刮着七八级大风，整日天昏地暗，咫尺看不见人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风包头，冷集宁，不冷不热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它形象地比喻包头地区风沙大的地理特点。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在一九五五年的初春，工地进行扬水试验，因人手不够，需要我们试验室的工作人员支援工地扬水试验。当时，我们都住在帐篷里，有几次帐篷被大风刮倒，夜间都是戴着口罩蒙着棉被睡觉，否则难以入睡。每当早晨起床，只见盖着棉被上落着一层尘砂。平时，工地都在露天就餐，突然一阵狂风刮来，饭菜上被刮进砂土，咀嚼饭菜，牙齿吱吱作响，难以下咽。由此可见，五十年代包钢建厂初期，工作与生活的确十分艰苦。但当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果实时，却感到无比的喜悦。有一天，王柏山钻探小组，在甲燕窑子工地上，打了一口104米的深钻孔，遇到承压水地层，清澈的地下水沿着管口自喷而出，水柱喷出地面高达十余米，钻工们看到这一壮

观景象，个个欢呼雀跃，兴奋之极，由欢乐代替了疲劳。

54108工程，历时一年零二个月，共计完成钻探孔72个，其中有21个钻孔进行了扬水试验。此外，还进行大量的水文地质工作普查。从东起包头旧城，西至哈德门沟，南临黄河岸边，北到大青山乌拉山脚下，在几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处处留下包钢勘察队员的足迹。在普查区范围内对各泉水点和民用饮水井，均进行了井深、方位及水质化学分析和细菌检验等资料的收集，取得大量有价值水文资料。证明宋家壕厂区周围的山前冲积平原和昆都仑河冲积扇，都存在着二层地下水蓄层，第一层为浅层的自由水蓄水层，以砂砾、砾石、粗砂及粘性土夹层组成。深度一般为二至五公尺，蓄水层厚度一般为十至四十公尺。第二层为深层承压水蓄水层，多为中砂和砾砂组成，其埋藏深度一般在55至132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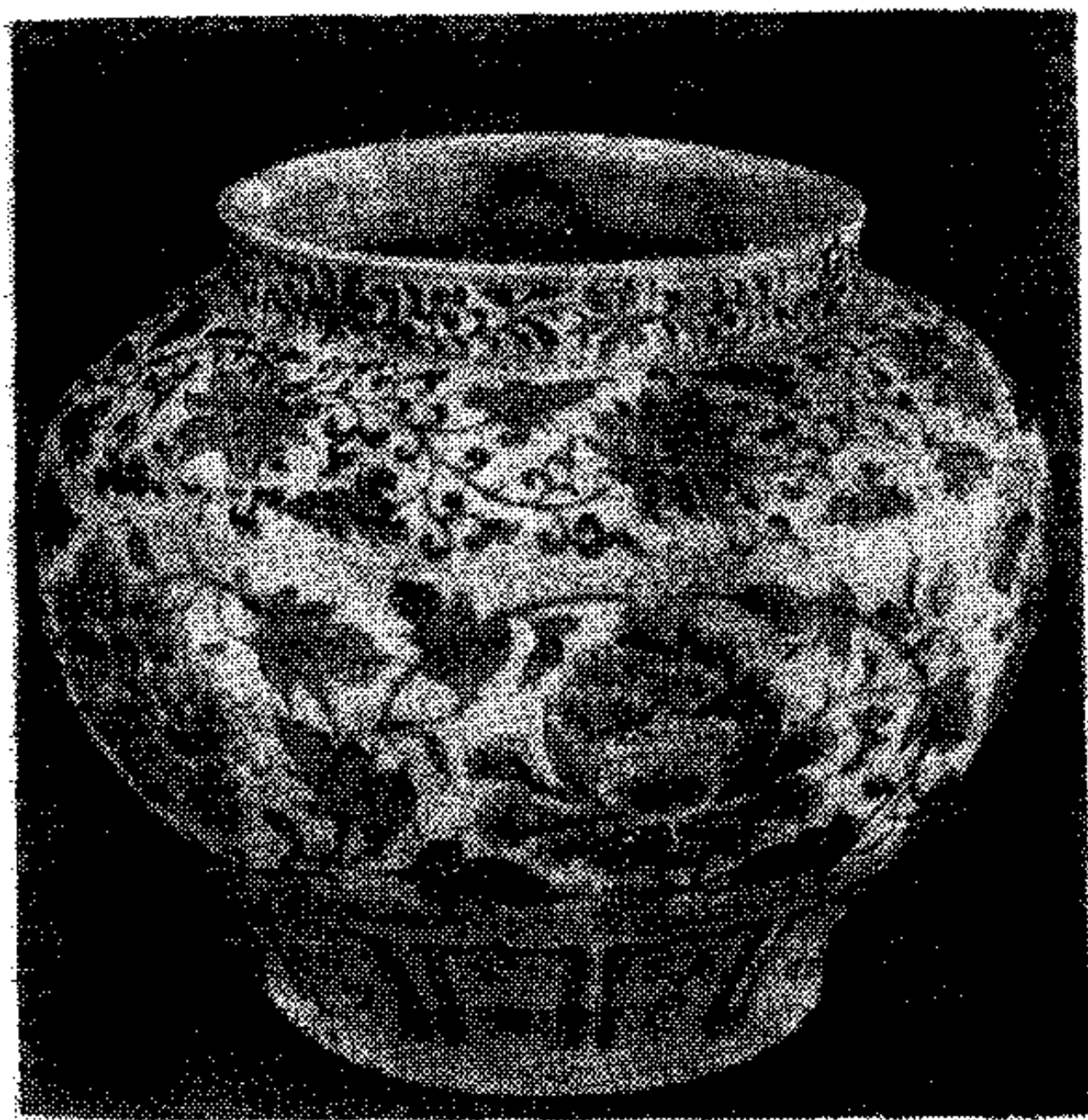
勘探水源 吕智豪 摄

尺左右，厚度在60至90公尺，其中含有多层粘土层。浅水自由水和深层承压水蓄水层之间，分布较广的湖相沉积的淤泥所隔离。其厚度为十至三十公尺。经过储量计算，山前平原浅层自由水之总天然储量约为0.57立方/秒，昆都仑河冲积扇深层之承压水固定储量约为29亿立方公尺。根据包钢在一九六二年计划用3.5立方/秒水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但要满足包钢在一九六二年以后长期用水需要，显然是不够的。故仍需考虑取用黄河水的规

划付诸实现。

一九五八年五月，包钢黄河水源地第一期借水工程正式开始建设。从此，黄河水滚滚地流向包钢厂区。

本文作者系包头地质勘察公司工程师，
昆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我市发掘出的元代青花缸

李雅冉 摄

回顾全国各地支援包钢的片断

阎克英

在昔日一无所有的昆都仑河畔，能够用比较快的速度，建设起包钢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除了几万名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外，也是全国各地在一盘棋思想指导下，大力协作支援的结果。今天在新的形势下，仍然需要我们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树立局部服从全局的思想，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本文打算就作者担任《包头日报》记者在包钢采访期间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简要回顾在包钢一号高炉投产前，全国各地和包头市各行各业支援的一些片断情况，也许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建设，有点益处吧！

包钢建设初期各方面的支援

包钢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从它一开始确定建设，就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各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怀和重视。早在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专门做出了“关于加强包头工作的决定”，动员华北地区特别是内蒙古和包头市的全党积极行动起来，把包头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基地。为了统一领导和统筹解决包头工业基地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当年12月23日华北局决定成立包头工业基地委员会，当时华北局书记刘澜涛任主任，刘秀峰、乌兰夫、苏谦益任副主任。

在华北局、自治区党委和包头市委的组织领导下，在国家计委、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铁道部、地质部、水利部等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地解决了包头工业基地的水源、城市规划、铁道运输等一系列问题，完成了矿山专用铁路线及直接为包钢服务的巨人调车枢纽的建设。为解决黄河水源地施工中的复杂技术问题，国家建委组织铁道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巨大的技术援助。为了保卫黄河水源地的安全，解放军炮兵部队帮助战胜了两次黄河冰凌的威胁。1955年夏，国家建委副主任孔祥祯、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曾率领工作组到包头，对包钢职工福利区的建设，亲自进行了考察，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了包头市新市区的城市规划，确定包钢职工福利区设在昆都仑河东（即今昆区），这样有利于城市管理，节省投资，对居民污染较小，且方便群众。

当包钢还在筹建时期，为了提供必需的设计资料，鞍钢、石钢等兄弟厂矿帮助进行了多种工作试验工作。包钢的建设项目，有一部分是国内配合设计的，得到了鞍山、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沈阳等十几个设计院的支援。在包钢开始建设的时候，根据冶金部的决定，鞍山和本溪钢铁公司抽出上万工人和干部、技术人员，组成了建设包钢的施工队伍。

华北局和自治区党委还从各地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包钢。1953年8月到年底，华北局和蒙绥分局给包钢选派干部五百多名（其中县级以上干部二百多名）。1954年初，华北局又调李超、陈守中等一批省地级干部到包钢，大大充实和加强了包钢的领导力量。同年4月下旬，华北局从保定、通县、定县、邢台等地调出二百多基层干部到包钢。8月10日由华北局机关和蒙绥分局调来干部一百四十四名，其中县级干部九十四名。1954年一年内，给包钢共调进地方转工业干部591名，其中地以上干部63人，县级干部141人，这些同志经过几年实际锻炼，都成了包钢各厂矿各

部门的骨干力量。

“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

1958年4月，包钢一号高炉破土动工后，正是当时全国“大跃进”的形势。这座高炉原计划1960年国庆建成，突然决定“跃进”提前一年建成，这就造成了材料设备供应等方面的极度紧张状况。一号高炉及其有关的焦化、水源、矿山等工程所需的设备总量达两万六千吨，其中除10%左右的重要设备由苏联等国外供给外，其余的需要全国二十二个省市的三百多家工厂协作解决，大约需要各种钢材四十万吨，品种五千多种，各种水泥四十万吨，混凝土一百二十万立方米，各种五金电器材料两万多种。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大跃进”，自己兴建不少中小型工厂企业，包钢的设备订货交货日期被拖延，材料供应不及时，一号高炉建设处于被迫停工待料状态。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乌兰夫同志向党中央汇报了包钢建设中出现的这一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困难。周恩来同志为此专门召见了包钢总经理核维，详细询问了包钢的困难。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国统一计划下，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全会决定把包头地区作为国家培植的重点。此后，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经委、冶金部、铁道部等单位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包钢的问题。19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根据六中全会精神，专门在一版发表《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提出了“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口号。社论指出，包钢是全国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是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一着。包钢的建成对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和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经济面貌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要求同包钢有协作关系的各地区、各企业、各部门本着过去支援重点企业的精神，给包钢以大力支援。1959年2月2日，华北协作区专门开会，讨论加强支援包钢建设工作的问題，要求华北区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和所属企业，必须把支援

包钢的任务，摆在首要位置，并规定了四条办法：1、对中央统一安排和调拨的物资、设备，必须按计划保证完成，对包钢所需的非标准设备，必须尽力优先加工承制。2、包钢所需的市场供应物资，内蒙特别是包头市应全力组织供应，其中非全国统一调度的市场物资，华北各省市特别是京津、太原等地商业部门应大力支援供应。3、包头应陆续建立一些为包钢生产建设服务的企业，华北各省市在技术设备上应尽力予以支援。4、计划部门应每季度检查一次支援包钢建设的工作。

党中央的号召很快在全国各地得到响应和落实。许多省市都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包钢的支援。北京、上海、鞍山、哈尔滨等地的党政负责同志，都亲自检查为包钢赶制设备的情况，发现问题，立即解决，想尽一切办法优先满足包钢建设的需要。哈尔滨市委还动员各工矿企业捐献废钢材，制作包钢急需的绞车设备。

1959年2月以后，全国各地支援的材料设备，源源不断运往包钢，平均每天约有十个车皮，这里有鞍山的钢材，沈阳的电缆、上海的电阻管、西安的轴承、广州的松香、兰州的石油、沥青、湖南的楠竹、大兴安岭的木材等，仅钢材、水泥和木材就有八千多车皮。一号高炉系统急待安装的设备有鞍山的风口套管、沈阳的闸阀、哈尔滨的配煤盘、大连的铁水车、上海和佳木斯的电动机、太原的卷扬机、合肥的皮带机等。

为了支援包钢，许多厂矿企业发扬高尚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涌现了许多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动人事迹。沈阳闸阀厂接到承制包钢高炉和焦炉需用的各种大型闸阀设备的紧急任务后，厂党总支立即召开车间干部会议，采取措施，安排生产，干部同工人一块劳动，昼夜不离现场，当完成一批后，厂运输组立即冒着大雨送到火车站，用快件发往包钢，解决了高炉和焦炉工程急需。大连起重机厂为了支援包钢，不仅提前完成了一号高炉需用

的70吨吊车的制作任务，还将自己吊车上用的60瓩的马达一起送给包钢。与包钢没有协作关系的哈尔滨锅炉厂在得知包钢急需一种轴承时，把本厂已经配套好的三十六套轴承主动支援给包钢。由上海“五一”等三个电机厂承制的二百多台电动机，按订货单规定要在1959年二、三、四季度分别交齐，他们为包钢早出铁，提前在七月份就全部交货。承制一号高炉鼓风机过滤器设备的营口机械厂，在厂小人少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提出“全力以赴、支援包钢”的口号，经工人刻苦钻研，改进操作方法，加快了生产进度，保证了高炉鼓风机提前试运转。吉林九台县耐火材料厂以超过自己生产能力三倍的数量，给包钢提供了隔热耐火材料。唐山钢厂和吉林二〇一厂在生产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接受了高炉所需高铝砖和碳砖的追加订货。北京航空学校的部分师生，自愿放弃暑假休息时间，给包钢赶制了二百多个三通阀，保证了焦化厂三号焦炉的急需。全国铁路部门对包钢急需的材料设备，都优先开绿灯，以快件运出。有一次，沈阳车站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求将二十三台大型闸阀共三百四十五吨在二十四小时全部装完，运往包钢。这时已经下班，工人们听说是支援包钢的紧急任务，自动加班连夜抢装，提前完成了装车任务。在一号高炉紧张施工期间，上海、北京、沈阳等地的民航部门用飞机为包钢运送了材料设备。在从北京到包头的火车因洪水灾害暂不能通车的几天里，中央军委曾数次派出军用飞机给包钢运送物资。北京军区某部派出一百五十辆汽车，为完成包钢建设的运输任务，同包钢职工一起奋战了近一年半时间。

包钢的同志特别感谢鞍钢、武钢、石钢（今首都钢铁公司）等兄弟钢铁企业，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包钢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这些兄弟厂矿不但为包钢培训了大批生产建设人员，还及时派出许多优秀工人和专家，帮助包钢解决生产建设难题。特别是鞍钢，要人给人，要材料给材料，包钢的同志亲切地称鞍钢为

“娘家”，他们说，“包钢缺什么，娘家就给什么”。几年来鞍钢调给包钢的干部达一千四百多人，技术工人两千五百多人。三号焦炉烘炉时，到处买不到热电锅，没有它就不能烘炉，最后还是从鞍钢得到四十支。鞍钢为换修自己焦化厂的裂化管，专门轧制出一批自用的合金管，正在这时，包钢提出要求支援这种合金管，鞍钢领导毫不犹豫地决定把这批合金管全部支援包钢。在一号高炉机械安装进入结尾阶段时，鞍钢主动用飞机把自己高炉的风口中小套运来包头，解决了包钢的急需。

在一号高炉紧张施工的决战时刻，全国各地十多个厂矿派来数百名优秀技术工人，赶来助战。他们有来自石钢的架工，武钢的筑炉工，鞍钢的电焊工，大连、青岛的化工工人，和包钢工人一起，日夜苦战，挥汗如雨，为包钢提前出铁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孟泰，在包钢出铁前夕，也带着鞍钢电钳技师苏贵勤、瓦斯技师胡福林，前来包钢，帮助献计献策。

“全市支援包钢，包钢带动全市”

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各族人民，更把支援包钢建设当作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的政治任务。1959年1月17日闭幕的自治区首届党代会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力争尽快把包头建设成为国家重点，是内蒙地方党的组织和各族人民的光荣任务，地方应当全力以赴支援包钢。自治区党委也作出关于加强包钢建设的领导和支援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支援包钢建设委员会，经常派人深入包钢建设现场，了解包钢需要，对各种非标准设备、职工需要的日用物资、劳保用品，尽量优先供应。几年来，自治区每年以上万名劳动力支援包钢。出铁前急需装卸和破碎工人。劳动部门从呼市乌盟包头调集了六千多各族青壮年，满足了需要。从1959年1月到8月，自治区各地支援包钢的生猪、菜牛、菜羊达十四万五千头。

为了加速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中共包头市委提出了“全市

支援包钢，包钢带动全市”的口号，1959年2月26日，中共包头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全市各方面的工作都以支援包钢建设为中心，开展以建设包钢为中心的群众运动。3月21日市三届二次人代会也通过决议，动员全市各族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包钢建设。全市地方工业、交通运输、煤炭、财贸、农村、文教等各行各业都召开了支援包钢誓师大会，许多单位党组织作出了支援包钢的决议，建立支援包钢的办事机构，并对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使“全力以赴支援包钢”的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煤炭、电力等部门以优质煤炭和充足的电力供应了包钢的需要。全市地方工业供应了包钢建设需要的大批砖、瓦、砂石、石灰、耐火保温材料、施工工业和劳保用品。仅1958年就供应砖5720万块，瓦157万块，耐火砖2347万块，水泥管5860米，氧气65万立方米。第二砖瓦厂根据包钢建设需要，想法试制出各种空心砖、异型砖、焦砖等新产品。耐火厂战胜原材料困难，以木代铁做砖模，生产出包钢需要的耐火砖。地方机械工业承担了包钢一号高炉、三号焦炉非标准设备的制作任务，1959年即完成两千多吨，各厂都把为包钢加工设备的任务，列在首位，千方百计保质保量完成。地方机械工业设备差，技术力量薄弱，为包钢加工大型设备，困难很多，广大职工大搞技术革新，自制机床三百多台，自己武装自己，过了设备不足的难关。包头机械厂开展了为支援包钢办三件好事的活动：一、星期日作为支援包钢活动日；二、每人提三件合理化建议；三、比计划提高生产效率20%。这个厂加工一号高炉电除尘器长达四米五长的沉淀机管时，厂里所有机床都无法加工，工人们春节不休息，想出了把小车床改装成万能积木式无限大车床，解决了小床子加工大部件的问题。

市政建设部门在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用五个月时间建成了通往包钢厂区的公路要道——长202米、宽24米的昆都仑河中桥，为

包钢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上下班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保卫包钢生产建设免受洪水灾害，市里决定兴建昆都仑水库。全市各单位大力支援，集结在水库的劳动大军共一千四百名。为加快工程进度，市三建等单位赶制了八十多公里的轻铁轨，赶制出一千多辆翻斗车，共完成砌筑石方三十万立方米，回填、砌土方一百七十多万立方米，完成混凝土三万四千立方米。从设计到施工，短短一年时间，就基本建成水库工程。铁路职工对包钢的设备材料做到快装快卸，交通运输部门在短途运输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抽出四、五十辆汽车，四、五百辆马车，组织二百多辆人力车，为包钢运送各种建筑材料。

郊区农民为包钢建设者生产了数量充足的蔬菜、肉蛋和牛奶，1959年1到9月供应包钢各种蔬菜六千多万斤，历来不种菜的固阳县也扩大种菜面积一万亩，供应包钢在固阳附近的矿山三十多万斤。商业部门经常登门拜访，了解包钢的需要，积极组织货源，把职工需要的生活用品送到生产建设第一线。生产资料批发部门做到不分昼夜和节假日，包钢什么时候提货，什么时候付货，包钢所需的器材做到入库快、验货快、配货快、付货快。昆区商业部门组织了不少流动货车，坚持送货上门。乌兰道综合商店团支部组织一个四十多人的流动售货组，挨门逐户将副食品送到包钢职工家中。昆百售货员聂俊保为给包钢解决用布问题，在昆区到东河区之间来回跑了十二趟，搬运布匹冻坏了手都不肯休息。卫生部门派有经验的医务人员深入工地为工人看病。文化部门组织专业和业余剧团到现场为工人进行慰问演出。市总工会和团市委发动广大职工和青年，到高炉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为包钢建设添砖加瓦。广大妇女也以捡废钢铁、为单身职工缝补拆洗衣服等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为支援包钢出力。总之，在党的号召之下，全市各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真正行动起来，汇成了一股全市支援包钢的洪流。

包头钢铁公司与军事工业

于俊

钢铁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往往能成为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日本当年年产400万吨钢，就敢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钢铁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包钢历年军工生产情况

包钢的军工生产，是在轧钢系统和稀土冶炼系统建成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军工系统有自己的冶炼厂，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特殊钢，也即是合金钢及高合金钢。但他们仍需要很大数量的普通碳素钢钢材来配套，这都要由普碳钢的生产企业供给。其次是包钢的稀土资源异常丰富，随着稀土资源的开发，必然要应用在军事工业和尖端技术上。同时由于包钢的设备比较先进，人才齐备，将必然承担一定数量的军工科研任务。

包钢1960年5月1日一号平炉出钢，1966年12月5日，初轧厂正式投产。

1968年12月，轨梁厂投产，1970年正常生产。
1971年7月，无缝钢管厂投产。

至此，包钢基本上建成了矿山、冶炼系统轧钢系统和稀土冶炼系统的钢铁和稀土生产体系。

包钢后来又陆续建成了线材厂、带钢厂等，现在所生产的钢材品种，有重型钢轨，大型工槽钢方元钢，大口径无缝钢管，线材、棒材、带钢和无缝钢管。稀土产品有高中低品位稀土精矿

粉、氯化稀土、氧化稀土、混合稀土金属、稀土金属和稀土中间合金等。此外还有焦炭和焦炭化学副产品，生铁、机电产品等。

军工产品的订货有个特点，即是任务急，批量小，对我们来讲，组织生产难度较大，但包钢几乎每年都百分之百的完成供货任务。有时采取保军工的原则，即在所生产钢材中，挑选最好的优先发运军工单位，其余才给民用部门。

包钢投产后，即开始有军工任务。但多年来，尤其十年动乱，各种报表等档案资料多已散失，现将找到的部分抄录如下，由于是普通钢材，不涉及保密内容。

1980年，供3121吨

其中：大型钢材 2761吨，
无缝钢管 360吨

1981年：供3355吨，

其中：大型钢材 3247吨，
无缝钢管 108吨，

1982年：供2967吨，

其中：大型钢材 2731吨，
无缝钢管 236吨，

1983年：供7009吨，

其中：大型钢材 2904吨，
无缝钢管 2671吨，

1984年：供15229吨，

其中：大型钢材 2602吨，
无缝钢管 2061吨，

1985年：供23390吨，

其中：大型钢材 3910吨，
无缝钢管 4161吨，

1986年：供25335吨，

其中：大型钢材 5032吨，
无缝钢管 3353吨，
1987年：供26420吨，
其中：大型钢材 5188吨，
无缝钢管 2626吨。

二、千方百计完成军工钢材生产

包钢是一个大型企业，在钢材生产过程中，有时也存在产品改型、订货数量太小难以组织生产等情况，尤其是军工生产，这类事情更多。为此，我们树立以军工为重的思想，遇到困难，研究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有时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以完成任务。

1981年，军工急需架设桥梁的工字钢，经双方协商，决定用40号普通工字钢，可有些方面性能达不到要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变形设计，使其断面尺寸变化，以增大强度，这就是特殊型40号工字钢。当公司接受任务后，科技处立刻同轨梁厂等有关厂开会研究。孔型设计工程师翁绳厚、张天绪二同志，立即准备方案，用最短的时间拿出了孔型设计方案，以及利用旧轧辊改制的方案，争取了时间，所以很快轧出了成品，保证了当时的急需。当时一次生产该规格工字钢5149吨，挑选出最好的几十吨发出。由于行动快，质量好，受到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及中央领导的好评。

还有一次，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上级又交来56a型工字钢的生产任务。这是修筑战备大桥用的，十分紧急。当时市场上56号工字钢无订货，为保证军工急需，我们将轻型56号工字钢的轧辊改制，一次生产了1558吨，及时运往前线，为反击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包钢于1979年轧制成B1V—500型钢板桩后，多次被军工单位用在军港的修建上，节省了进口钢材的外汇，受到好评。

此外，还轧制过导弹发射架用超长定尺的大号型钢，核潜艇用钢，东风五号工程等特殊用钢材，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任务。

三、军工科研

包钢由于设备规格比较大，人才多，所以也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1、1970年，由当时的军管会出面，下达给机总厂用电炉生产50B、40B钢的任务，铸成1.26吨、3.2吨小钢锭，共5000多吨，作为军工厂的原料。

2、1972年，机总厂曾试制一批0.72口径半自动步枪。试制成功后，改由包头钢铁学院进行批量生产。

3、1971年，机总厂由电炉试炼30CrMnMoTiA和30CrMnSi合金钢，生产成1.26吨钢锭200吨，作为军用钢。

4、机总厂和包头稀土院共同试炼34Cr₃MoWVA飞机大梁钢，先铸成1.26吨小钢锭，再经铸造加工，和稀土研究院共同研究其白点缺陷的产生及消除办法，提出了研究报告。

5、1975年，接受国家科委和冶金部下发的任务，和其他单位一起研制924钢潜望镜和舰艇桅杆用管，包钢承担轧管任务。

钢种：铬锰镍系高强度不锈钢。

1975年6月，试制 $\varnothing 160 \times 24 \times 3000$ mm潜望镜管3根。

1978年7月，试制 $\varnothing 154 \times 23$ mm潜望镜管5根。

1979年3月，试制 $\varnothing 325 \times 40 \times 8700$ mm舰艇用桅杆管3根。

1983年5月，此项科研成果在齐齐哈尔钢厂通过了验收技术鉴定，并分获冶金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奖的5人中，有包钢无缝厂技术科长郭志良高级工程师。

6、18镍无缝钢管

该钢种为马氏体时效钢，代号350，规格 $\varnothing 159 \times 10$ mm。

1978年7月31日试轧3根，主要用于制作军用高速离心分离

器转筒。

四、稀土在军工上的广泛应用

稀土工业是我国的新兴工业，在军事上也有极为广泛的用途。

1、轻稀土铈用于军工发火合金上。

2、用于常规兵器。

1962年，用于装甲铸钢601和装甲钢材603，

1970年，用于装甲铸钢621，

1971年，用于装甲铸钢622，

1975年，用于装甲铸钢623，

1978年，用于炮钢701和703。

3、稀土球墨铸铁用于迫击炮及大炮结构件。

4、稀土电工纯铁，生产大炮稳定器。

5、军用激光材料，如含钇钕的激光材料，镨钕双渗晶体，大功率钕玻璃等。

6、金属钐、金属镨等用于军事工业。

稀土在军工上应用的特点，是包钢的混合稀土、单一稀土及氧化物、氯化物的形式供应的，然后经过许多单位的再加工。

本文作者系包钢科技处工程师。

三 枚 金 桔

张 树 宽

也许三个桔子算不了什么大事，也许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人们已很少提起了。然而，这三枚金桔却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一九五九年，包钢正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祖国各地的英雄儿女，云集黄河之北，阴山之南，在为包钢建设做着贡献。

一月二十三日，包钢党委收到中建部第二工程局的一封贺信和三枚金桔。这三枚金桔子真是名不虚传，实为上等珍品，只见三枚桔子金黄透红，个头匀称，使人大饱眼福。包钢领导同志打开贺信一看，非常惊讶。原来这三枚金桔的来历确实不同凡响，让人思考再三。

贺信写道：正当祖国送走了充满奇迹的一九五八年，迈开胜利的步伐，跨入一九五九年之际，我们特向英雄的建设包钢的全体职工，致以崇高的敬礼和问候！

贺信说：这三枚金桔的来历不同寻常，它生长在遥远的边疆——云南。那里的人民把这三枚桔子精心挑选出来，赠给了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代表们又转赠给了英勇守卫在福建前线的解放军；解放军战士们没舍得吃，又把它敬献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又送给正在天安门日夜辛勤劳动的建筑工人；工地上的工人们又转赠给了正在工地上参加劳动的中国建筑歌舞团；歌舞团来包头慰问演出，又赠给了我们。我们高兴极

了，深感这是珍贵的礼物，于是决定赠给建设包钢的全体职工。

这是多么珍贵的礼品呀！它曾七次转赠，带着亿万人民的温暖和情谊，辗转万里，送到了包钢职工手中。这份礼品是全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互相支援的象征！

包钢职工深知这份礼物的重量和意义，他们没有自己留下来，而是经过商量，决定送给为包钢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鞍钢职工。

事情已经过去30年，但这三枚金桔的故事仍然留在包钢十万各族职工的心中。



建国前的包头教育简况

张曙辉

建国前的包头，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加上民族压迫，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凋敝，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发展速度极其缓慢。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包头地区共有7所公私立中学（绥远省立包头中学、私立正心中学、私立崇真中学、国立伊盟中学、固阳知行中学、萨拉齐县立中学、私立培英中学），170所公私立小学。在校中学生1230人，在校小学生13910人。此外，还有1所包头简易师范学校。按当时包头地区336856人口计算。平均每万人口中仅有中学生37人，小学生413人。

建国前的教育形式有私塾，也有宗教、团体办学和官府办的教育。

私塾教育

包头地区的教育发端于私塾（也称私书房）。而以土右旗起步最早。清朝乾隆年间，萨拉齐镇已有私塾教育，以后，包头镇才办起私塾。1937年，日本侵占时期，发展到10所。私塾兴盛时期，包头镇多达50所左右（有人估计74所）。包头镇私书房的私塾先生，多数是从内地来此谋生的不第秀才、举人。从清代光绪年间开始，郊区也有私塾教育。辛亥革命成功后，郊区东部的东园乡、沙尔沁乡由于村落较多，人口较集中，因而私塾教育的发展较快。从1912年至1937年10月，郊区境内共有私塾20多处。私

塾的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七言杂字》、《千字文》以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平民子弟一般只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富豪子弟则还要进一步读“四书”、“五经”。结业后，富豪子弟到官府学堂继续学习，平民子弟多数回家劳动。私书房的先生，一般一个教学处（所）只有一个，其教学法采用教管合一的学长制，即先生教个读书较多的大学长，由大学长再教二学长，由二学长再教学童。管理方法，先生不在由大学长管，大学长不在由二学长管。私书房的设备非常简单，开馆之前，先生接入学人数租赁一两间带有大炕的房子；馆中除备有一张高桌供奉孔子牌位，再就是一张先生用的方桌和文房四宝，一领戒尺，别无他物；学生各置一书柜（高一尺，宽一尺，面长约二尺），排列在炕上，每排四至六个书柜，学生盘腿坐柜前作课业。私塾先生对“四书”、“五经”的讲读方法，多依据《朱子集注》和他们授业老师所传授的大意，再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这样师传弟、弟传子，承师说而传授，没有新的论说，只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套儒家思想作为主要内容，代代相传，成为当时包头人民的正统思想。私塾先生的报酬，是按先生旧学根底深浅，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家境贫富等情况，由先生和家长协商议定，按年收费。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废科举，兴学堂。此风波及到包头地区，于是旧官府成立一个私塾改进会，想逐步改良私塾，使之纳入新学堂的轨道。但工作进展缓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全被新式学校所代替。包头的私书房约有150年以上的历史，对包头的文化教育影响很大。

私人办学

1914年（民国三年）。原清朝光绪己未科秀才张荃，在包头

镇园子巷自己院内创办私立女子学堂，开了包头镇女子上学的先例。随后，包头镇兴办的私立小学堂还有“新光小学堂”（今儿童图书馆）“万字会小学堂”（今久长城巷小学）、“新华小学堂”（今东门大街小学）、“纯慈小学堂”（今牛二小学）、“据德小学堂”（今永合成巷小学）。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兼包头市参议会议长赵焜昌，创办了“私立正心中学”（取《论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意）。学校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赵焜昌任董事长，牛申之任校长，秦邦楨任副校长。校址设在南门外原日本小学旧址（现包头一中礼堂）。

固阳地区清末民初属萨县管辖，是个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由于受教会学堂影响，农村一些较大村庄的殷实人家也合伙请先生办起“私书房”。“私书房”学制不定，根据农村忙闲分“冬书”或“月书”。当时的固阳，根本没有以教书为职业的先生，因此能教“四书”的先生就更少。每个私书房学生多者二十人，少者十来人，大家不分年龄，不分班次，同坐一堂，盘膝而学。

莎县地区，据县政府1948年统计，私立小学除教会办的外只有十几所。办得较好的有莎拉齐的崇德、启智、育英等小学，大古营子有养蒙小学。

石拐地区原属莎县管辖，直到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开始有了定点居民。但由于地区偏僻，经济落后，教育是空白。直到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才创立了第一所“石拐私立小学堂”。创建人是当时石拐知名人物——地主樊纲。学生20余名。

· 宗教、团体办学

团体办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这时包头已成为西北地区的商业重镇，商务交易频繁，内地商人纷纷来包设店经商。这些人的子弟及从事手工业的工人子弟，亟需要

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遂田工商业组织“公行”创办起四所义学，供工商业子弟入学。四所义学共有学生100多人。所谓义学，即指学生上学不收学费，由“公行”出钱聘请先生，历时十年。因“公行”领导不力，加上私塾渐增，各工商业者多送子弟入私塾读书，四所义学停办。

清朝末年，天主教传入包头地区。随着天主教在萨拉齐二十四顷地盖起总堂，办起了天主教会学校“明德小学”。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天主教在郊区小巴拉盖建天主教堂后，又办起“天主教学堂”一所。1911年（清宣统三年）改名为“公学院”。1930年（民国十九年）男校部称“培英中学”，女校部称“启秀女中”。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合称“培英中学”，解放后于1951年并入萨拉齐中学。天主教的教会办学目的在于为教会培养接班人，但不少青年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背叛了教会的宗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张焕之、张佩等先烈，就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民国初年，固阳的天主教，创立一所“天主教堂小学”，后改为“圣公小学”，由天主堂的修士和修女兼任教师。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耶稣教在包头镇吕祖庙兴办了一所教会小学。1911年（清宣统三年），耶稣教在包头镇创办了第二所教会小学，即“私立恩育小学”。1904年（清光绪卅年），萨拉齐耶稣教又在教堂办起婴儿院和学堂。1911年（宣统三年）男女分开，男的叫育英学校，女的叫三妙女校，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

1913年（民国二年）春，萨拉齐“回教促进会”，为促进回教青少年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在萨拉齐城里办起了“清真小学”一所。同年五月，包头镇回教促进会，也建立了“包头镇清真小学堂”一所。1947年包头城内成立了“包头私立崇真中学”，创建人是吴佑龙和吴懋功，主要招收回族子弟，1952年迁呼市与

土旗中学合并。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一贯道为了培植势力，扩大影响，在包头城内办了一所“忠恕小学”，1950年改校名为“求实小学”，教职工10~12人，有学生200人左右。

官府办学

清朝官府办学是为科举作准备。1869年（同治八年），莎拉齐厅同知文山，创办“育才书院”，这是包头地区官府办的第一所小学，校址在莎拉齐城关帝庙东面。首届招生80余名，所收学生均为乡镇富豪子弟，所授学科为“四书”、“五经”，修业年限四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废科举制度，便将“育才书院”改名为“蒙小两等合设学堂”（蒙小即初小，小学即高小）。校址移在莎拉齐镇大东街。这时招收学生的宗旨虽曰：“有教无类”，不分贫富，均可入学，但入学读书的大多数是商贾、富豪子弟，普通平民子弟上学的极少。学习课程：蒙小有国文、算术、修身、写字、体操等；小学有国文、算术、修身、史地、自然、唱歌、图画、格致、体操等。这所学校数次改校名，现名为“莎拉齐大东街小学”，校史120年。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莎拉齐厅同知余宝滋在包头镇马王庙内设立了“两等学堂”，这是官府在包头地区创办的第二所小学，学校经费由地方政府筹措。马王庙小学成立后，推动了初级小学的发展。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在包头镇的文昌庙、金龙王庙、瓦窑沟、南龙王庙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初等学堂。各校设校长兼教师一人，所上课目以国文、算术、修身（后改为自然）为主。体操是学生玩耍游戏，没体育设备，一个篮球为学生唯一的体育用具。这四所初级小学，每校学生约20名至40名。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绥远将军贻谷批准，在今东河区福徽寺成立“包头镇半日初级小学堂”。1909年（清宣统元年），根据副都统通谕，在莎拉齐玉皇庙成立“莎拉

齐半日初级小学堂”。这两所小学堂均招收蒙族子弟入学，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均停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从1912年到1937年日寇占领包头地区前，官府办学有所发展。1913年（民国二年），萨拉齐县创办了“吴坝小学堂”。1924年（民国十三年），包头镇成立了模范小学堂（现牛桥街小学）。1925年（民国十四年），在包头驻军的西北边督冯玉祥将军认为，救国之道根本在于发展“平民教育”，因此他专门设立“平民教育处”，创立“平民讲习所”，招收不识字的店员、学徒及街道失学青少年免费入学，并供给其课本和文具。同时，还在各街道成立平民小学。这样，包头镇的小学就发展到八、九所。1925年（民国十四年），乌拉特三公旗（西公旗、中公旗、东公旗），在包头镇成立了“三公旗小学堂”（蒙族小学）。三公旗的管辖范围在包头以西，直到五加河一带。学校成立时，三公旗合议，每旗拨地10顷，所收租谷作为办学经费。三公旗小学校址在马王庙街，学生近150名，其中汉族为多数，蒙族为少数。其原因是有权势的王公子弟才能进城读书，一般蒙古族牧民无力进城上学。虽说这所学校汉生为多数，但都要学习蒙文。这是包头镇第一个学习蒙文的小学校。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成立，三公旗小学将全部学生转入包头分校简易师范部和小学部，三公旗小学宣告结束。在这些小学毕业的学生中，胡尔查必力格（蒙古族）解放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陶德斯琴（蒙古族，汉名叫郝世凯）担任八路军乌兰察布盟副盟长。1927年（民国十六年），铁路部门在包头建立了扶轮小学一所，并逐步发展到六个班（1~6年级各一个班），这是企业在包头办的第一所小学，招收的学生是铁路职工子弟。当时包头镇，尽管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但入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的半数，其他地区就更为落后。

固阳县的教育事业，在冯玉祥将军的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

下，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设立了县教育局，自局长韩礼庭等人创建了固阳县立第一所小学，学校有两间教室，50多名学生。1926年（民国十五年）初，学生增加到100多人，并增设了高小班。高小班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史地、音乐、体操（还包括国术即武术）、英语。同年，还在银号、白灵淖等地区分别创建小学，经费皆由县政府拨款。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固阳县政府又筹建一所女子小学，起初只有学生30多名逐步增到90多人。民国建立后到日寇占领包头前，官府在郊区境内办的小学有12所，多数集中在东园乡和沙尔沁乡。

包头地区官府办中学，始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包头地处水旱码头，商业欣欣向荣，逐渐发展为引人瞩目的塞外中等规模的城市。当时正在包头驻军的冯玉祥将军，拟议在包头建立一所中等学校，委派部下孙则让筹建。孙工作认真，对学校的草创不遗余力，且能广为延聘人才任教，因此于当年6月26日（据《绥远省志》）正式成立，校名为“包头中学”（包头第一中学前身），校址在今东河区召拐街，学生两个班，共70余人，孙则让任校长。1927年（民国十六年）绥远省将“包头中学”改为绥远省立二中，任陈国英（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1973年病逝于台湾）为校长。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在反帝浪潮推动下，陈国英率领学生将吕祖庙耶稣堂的外国传教士赶走，学校迁入耶稣堂内。同年暑期招收了第三班学生，其中有四名女生，开包头中学男女合校之先例。在此期间，由于各派军伐倾轧，政局混乱，校长更换频繁。继陈国英之后，张文元、樊伯山曾任过校长。1928年（民国十七年）2月，绥远省教育厅委派督学贾武兼校长。贾系归绥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为人方正，热心教育。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包头，省立二中解散，部分教职员和学生流亡到河套的国立绥远中学。日本投降后，学校于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3月复课，改名为绥远省立

包头中学，由牛申之（现台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任校长。一年后，改派王佐兴继任。1948年秋冬之际，包头第一次解放，在包头城内成立了联合中学，吴平任教育长，每班设辅导员，由解放军担任。包头中学，作为旧中国绥远省为数甚少的学府之一，对塞外科学文化的开发做出了贡献。历届学生中都有人投身于革命，成为国家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兵器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彭达（原名马信），解放初包头县县长、后任内蒙政协秘书长的罗温如。1948年，包头第一次解放时参加革命的有20多名，如文革前为红旗杂志社编辑、文革后为光明日报副总编和党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张云声，还有包头市政协副主席兼包头市委统战部长李士炜，都是解放前包头中学的学生。也有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如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继祖等。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兼校长）派张镇临来包头筹建“中国国民党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其目的是通过这个学校培养服从和服务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奴才，巩固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这所学校于同年建成，首任校务主任是张镇临。包头分校设简易师范部、中学部、小学部。简易师范部学制四年，中学部三年。并规定小学部的学生毕业后，即升该校初中部；初中毕业后送南京校本部上高中，或包头分校增设高中班；简师生毕业，分配各蒙旗平民小学校去工作。达到推行义务教育，灌输国民党的所谓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精神国防的目的。包头分校招收对象规定为蒙古族子弟，由于蒙古族上学青少年人数不足，才兼收汉、满、回族学生。但不论哪个民族的学生报考该校，必须持有蒙旗的介绍信和证件，方准应试入学。学习内容与普通简师、初中、小学基本相同。所不同的，一是简师部、初中部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教育和管理；二是蒙古族语文为全校学生必修课；三是关门办学，不准学生参与社会

上举办的各种文体娱乐活动，以防外来影响对学生的渗透。学生全部住校，过集体生活。书籍、膳食、服装全由学校供给，生活待遇比较优厚。该校的工作人员，从主任到教职员，除个别人是聘请的外，都是南京校本部派来，或由校本部附设的蒙藏学校毕业生分配而来的。这些人中有蒙古族，也有汉族，多数是国民党员。1937年包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前夕，学校带领教职员20多人、学生60余名，迁到青海、甘肃，于1939年10月，包头分校停办，学生合并于肃州分校。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日寇占领包头后，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苦不堪言。这时的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城镇中小学校舍几乎全被侵略军占为兵营，一切教育设施均被破坏。当时，未能逃难的教育界人士，面对现实，出于爱国之心，为了使青少年不忘掉祖国，不忘掉祖国的语言文字，在日寇铁蹄下，忍辱办学，从而使遭受日本侵略军摧残的学校，少数的被恢复起来。如：包头城内的“牛桥街小学”、“瓦窑沟小学”、“火神庙小学”、“马王庙小学”、“铁路扶轮小学”，还有萨拉齐镇的“大东街小学”。固阳县将“县立第一小学”与天主教堂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当时的农村学校，由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再加上土匪横行霸道，几乎全部处于停办状态。

日本侵略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从思想上灌输“王道乐土”、“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一套奴化教育。所推行的反动教育方针是：“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发扬东方道义精华”。从而促使青少年效忠蒙疆日本，做侵略者的工具。学校设置课程有：日语、汉语、常识、数学、修身、音乐、美术、体育。学校每学期期中或期末，召开一次“恳亲会”对学生家长进行奴化教育。教育经费，公办的学校由日伪公署拨款，伪包头市公署在总务科（后改为行政科）下设教育股、弘报股，负责教育工作。

为了解决驻包的日本人子女入学，日伪公署在东河区南门外（即包一中礼堂）新建日本小学一所，直接由日本人管理任教。

为了长期侵略的需要，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月，日伪当局把原“三公旗小学堂”改为“巴彦塔拉盟立包头蒙古中学”（设有师范班）。校址在包头马王庙街，校长额宝斋。此人名义是校长，实际是个傀儡，学校的一切权力全部操在日本人甲斐主任手里。学生119名，其中一半学生是达拉旗蒙族子弟，另一半则是其他地区蒙族学生。所授课程，除蒙文用蒙语授课外，其余课程全部用日语讲授。蒙古中学内部，实行严酷的法西斯统治，即“阶衔相统治”：一年级的学生要绝对服从二年级的学生，二年级学生必须服从三年级学生，这就是所谓“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稍有不服，便遭毒打。1942年改校名为“厚和蒙古中学包头分校”。1943年又改成“包头兴蒙中学”。日寇法西斯的奴化教育，在“包头兴蒙中学”确实毒化了一少部分青年，但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是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民族的。在学生中反对日本法西斯，欲求民族解放的情绪，随着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加强而日益加剧。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这种情绪更加高涨，使得日本人在这所学校无法管理，于是在1945年初，便将这所中学解散了。

抗日胜利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包头地区，建立了教育管理机构，着手整顿学校。加上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事业的热心和资助，不仅使原有的公办学校逐步得到恢复，而且还兴办些公办教育事业。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10月，将再生召（现伊金霍洛）的“国立伊盟中学”迁来包头金龙王庙街沙王府，校长是经天禄（又名经革陈）。高、初中共六个班，学生203人，多数为汉族学生，但全校学生都学蒙文。1952年，将这所学校迁到伊盟东胜。另外，包头有正规的师范学校。最早可溯源到1946年

的河西师范，校址在伊盟东胜东门外，这是一所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绥远省教育厅决定将河西师范改名为“绥远省立包头师范”，招三年制简师班三个，补习班一个，学生150余名，享受公费待遇。1948年暑假，迁至包头东门外旧军营，校长李崇德，教导主任王季明。

总之，建国前的包头教育，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宗教团体办的教育，主要目的不外乎是维护其统治地位，或是传播宗教，培养宗教接班人。尽管如此，这些学校和宗教教育仍然培养出不少有知识的人才。解放后，经过进一步学习和锻炼，绝大多数都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张曙辉：原包头市教育局副局长



国共通邮史话

李文勋

1948年底，经过辽沈、淮海战役，全国最后解放的局势已经确定。当时在包头驻扎的傅作义部队还不到三个团的兵力。所以我华北野战军和绥蒙军区所属部队，发动了第一次绥包战役。1948年10月，解放大军进军包头，邓宝珊指挥国民党部队弃城而逃，我军未经战斗，就顺利地解放了包头。我军在包头虽然只驻了38天就主动撤出了，但却为翌年“九·一九”和平解放绥包和在此期间沟通国共通邮奠定了群众基础。

邮政自始至终本来是为民众服务的事业，但由于内战关系，国共区间几年断绝了通信。

1948年10月，解放军离包后，当时绥西只有包头——归绥一段通车，旗下营以东是大片解放区，北平至包头火车不通。国民党交通部北平邮政管理局管理不便，将绥西各局（包括包头局）拨归甘肃邮政管理局代管。1948年12月，国民党兰州局来电报，派兰州局一级邮务员梁翼龙任绥西邮务视察员，另任包头局二级邮务员周宝坪为局长。梁翼龙视察员常驻包头局，有时在归——陕各局间视察业务。

内战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的是封锁政策，禁止国共两区通邮，撤退战区邮政员工，置民众通信于不顾。

1948年冬，包头第一次解放时，当时国民党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凡解放地区，邮局局长必须携带票款及重要帐册“撤退”，

否则给予严厉处分；局内员工自愿“撤退”的，路费可报销。梁冀龙与包头局长周宝坪及主要业务员张宝祥、白云梯等坐邮政汽车逃往陕坝，又继逃宁夏兰州。11月中旬，梁、周等听说解放军主动撤离包头，宁夏邮政车站恢复宁——包邮班，梁旋即调用邮车一辆返回包头，仍然主持包头邮局业务。

梁、周逃离包头时，留下了少量邮票交邮务佐张鸿钧，并责成他与留局人员维持业务。解放军撤离包头后，梁、周返包路过陕坝，在陕坝局取得800余万金圆券带回包头。按邮政制度规定，余款局有责任拨款调剂缺款局。梁用这笔钱补发了50余名留局员工的一个多月的薪金。人民邮局后来接管包头局时，给大家发了工资，员工得了双份工资，都感满意。

国民党挑起长期内战期间，实行禁绝国共两区通邮、隔断解放区与国统区人民音讯的作法，给国统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正常往来带来诸多不便，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上海、北京、西安等地报纸不断呼吁停止交通封锁，恢复南北通邮。国民党交通部中华邮政总局中的有识之士，也撰文指出国共通邮是“应天顺人，任何方面无法阻挡”，应使“全国即日恢复通邮”。在各方人士的一再要求下，1949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上，讨论了“与共军占领地区通邮”问题，决议“准予试行”，并下令交通部及政府所属部门执行。2月3日，中华邮政总局命令所属各局：“设法与共区邮局接洽，实行通邮。”3月5日，国民党交通部中华邮政总局发布通令，要求各经转局对解放区发运的邮件“统应利用最速运输方法接运”，对“共方发来已贴邮票之邮件照予投递，不涂抹或撕毁其邮票”。3月9日，我华北人民政府邮电总局公布《关于与蒋管区通邮暂行办法》，指定北平、石家庄、归绥为华北进出口邮件交换局，可与华南、华东等地交换邮件。从此，江苏、安徽、甘宁青等省的国统区均逐步与解放区恢复通邮。

其时，归绥、包头尚处于国统区，而旗下营以东大片地方已为解放区。1949年5、6月间，甘管局电令包头局梁翼龙设法赴解放区联络通邮。梁接电后由包头坐火车前往归绥远省政府提出通邮。那时，归绥至旗下营民间来往频繁，传说正在酝酿起义，但反动政府仍不许国共邮电双方联络。梁赴伪绥远省民政厅晋见厅长王伯诚，此人说通邮时机尚不成熟，阻止前往。数日之内，梁连去三次，民政厅长总是百般推拖。

绥西邮务视察员梁翼龙虽为国民党甘宁青邮管局的高级邮务员，但他是一个高师毕业凭真才实学考入湖南邮管局的一级邮务员知识分子，富有良知正义感，在邮界无靠山裙带关系，治邮有方，对局员恩威并重，颇关心下属生活。在得到上司命令及时局感召下，他为包头邮局国共通邮奔走出力。在绥远省政府晋见民政厅长商议国共通邮碰壁后，梁不顾官方禁令，6月上旬率归绥邮局信差陈××搭乘商人运货马车前往旗下营，征询我方意见。受到旗下营我解放区人民邮局领导人的欢迎，答复同意进行通邮谈判，并欢迎梁翼龙作为包头局正式代表到丰镇谈判。6月25日，以邮务长视察员梁翼龙为组长的包头通邮代表团抵达丰镇人民邮局。6月28日，包头——丰镇国共通邮谈判开始，我丰镇邮局解放区特派员庞守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经平等协商，双方于7月1日达成《丰镇邮局包头邮局通邮协定》。会谈期间，我庞守吉特派员设宴热情招待了包头通邮代表团。

国共通邮会谈双方商定，所有东去邮件包裹，不需绕道兰州、西安，随即发火车运往平津；西来邮件同样交马车运回归绥。“协定”生效后几天，北平转几局由京绥铁路运回归绥、包头各类邮件109袋，包头发往平、津各类邮件217袋。从此以后，华北西部国共区邮路畅通，便利了民众通信。

国统区与解放区通邮成功，是一件大事。当时，包头商界人士一百余人敲锣燃放鞭炮来邮局大门前，感谢邮局办了一件顺乎

民心的大事。邮局上下也一片欢腾，工作热情高涨。

通邮成功后，梁组织归绥包头两局招揽大宗包裹，由归绥局雇马车运往旗下营局。此时，收入大增，绥包两局员工欠薪、米贴得以补发，还能接济附近各局发薪，归绥局员工同受其益。时值1949年7月，距“九·一九”起义两个多月，梁与周在包头局维持局务，等待起义。

1949年“九·一九”起义，包头和平解放后，包头局在梁、周维持下照常营业。10月间，丰镇人民邮局来电报：“请包头梁视察员来丰镇商谈邮务”。梁即日赶赴归绥会同马慕曾（归绥邮局局长）前往丰镇，商谈事项是关于共方派员接管事宜。梁、马表示欢迎。旋即我方李特派员率老区邮政人员数人接收归绥邮局，庞守吉特派员率领郝文寿、张玉峰等人接收包头局。李、庞二同志听取汇报后，得知绥西各邮局起义后，局务全部维持完好，人员照旧，财物无损，表示满意。在丰镇住了一天，迎接李、庞二特派员到归绥、包头两局接管。

庞特派员到包头后顺利接管了包头邮局，庞特派员命梁、周各任原职，并命梁协助管理局务兼任文书。1950年春夏，包头邮局副局长周宝坪久病亡故，北京邮管局委庞为局长、梁为副局长。同时，包头局升为一等乙级邮局，从此，包头邮局回到人民怀抱。

1951年春，庞局长积劳成疾，请假回河北老家休养（1952年病故），包头邮局业务，全由梁翼龙负责。

1951年冬审干运动后，邮电审干小组怀疑梁政治历史问题交代不清，梁被送往绥远省公安厅新生公学审查。不久，北京邮政总局派李世俊来包头邮局任局长。

李文勋：包头邮电局志史办

创刊《包头青年报》的回顾

王倚一 徐淑娟

《包头青年报》的前身，是《青年建设者》报。顾名思义，从小报的名称就能感嗅到新兴工业城市蓬勃建设的强烈气息。

1954年，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进入高潮。包头钢铁公司、包头冶金建设公司、一机厂、二机厂、华建、铁道部第三工程局、铁道兵团、铁建四处等中央、内蒙大中型企业各路人马云集包头。全国支援包钢，工人、干部、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真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

这个时期，包头市的建制已上升为准省级，青年团包头市委机关也相应得到充实和加强。从团中央机关和自治区团委机关，相继抽调了几批干部来包，他们和原来在包头开辟青年工作的团干部一道，远看祖国欣欣向荣，近看包钢建设重任在肩，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带领全市广大青年和团员在包头工业基地建设中奋力拼搏，大显身手。

五十年代青年工作比较活跃，团组织十分重视对青年和团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根据青年的特点，多方面进行宣传鼓动，用青年中现实的、形象的模范先进思想和事迹，教育鼓舞青年在建设包头中献出青春和智慧，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当时包头的新闻宣传舆论工具只有市委机关报《包头日报》和人民广播电台。团市委领导当即决定要充分利用党报的宣传，切实加强青年方面的新闻通讯报道工作，并抽调原包头一区团委副书记王倚一

同志负责为党报和电台组织采编稿件。1955年又进一步与《包头日报》编辑部商定，从5月24日开始在党报版面上开辟了《青年园地》专栏，每周一期，每期半个版，以后又扩大到每期一个版。

包头是个年轻的城市，建设包头的各路大军多数是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建设者，这个时期的青年工作又相当活跃，《包头日报》上的有限版面，已经不能满足对青年工作的宣传报道需要。因此，包头团市委党组决定创办一份包头青年自己的刊物。1956年5月1日《包头日报》编发的第40期《青年园地》专栏上，发表了这个专栏的结束语，同时透露了青年报即将面世的消息。

青年报经过几期试刊以后，从1956年7月1日正式出版了团市委机关报——《青年建设者》报。这张小报八开两个版，每周一期，由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团市委副书记李文义同志兼任总编辑，编辑人员除王倚一同志外，又把当时团市委基建部干部徐淑娟同志调入小报编辑部。两位当时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女同志，从此开始了小报的笔墨生涯。每期报纸除重要稿件送领导审阅外，其他具体工作从采访、编辑、安排版面到跑印刷厂校对、付印直至分发，都由两人承担，忙得团团转。当时，小报是由团内赠送，分发到各中央、内蒙驻包企业和地方企事业、机关、学校各系统团组织。工作虽然很累，但是两人的心情都很愉快，每当我们把通过自己辛勤劳动编印出来的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按各系统团委不同份数分别卷成大小不同的卷送交邮局邮寄时，我们都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青年建设者》报头的五个字，开始是请当时教育局的赵介枫老师写的，他的书法在包头颇有名气，赵老师欣然命笔，是对包头青年工作极大的支持。出了几期报以后，一次团市委领导人出差北京，专门拜访了谢觉哉同志，请谢老书写了“青年建设

者”五个字。谢老十分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用他的手笔作报头，小报又报道了谢老为我们写报头的消息，使全市团员和青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青年建设者》报是由包头日报印刷厂承印的。五十年代离现在不算久远，但几经周折，特别是“文革”浩劫，我们手头留存的一份比较完整的小报资料，经过几次抄家后也付之一炬了。回想起来，那时小报的面貌还有一些印象。记得第一期头版的右上角，是用一幅宣传画请丽生照相馆拍成照片后，由报社印刷厂制版印刷的。这幅宣传画的背景是一个正在施工的大厦，脚手架林立，前边的特写镜头是一位头戴安全帽、英姿飒爽的女青年建设者，下边一行字记不太清，大意是：青年们团结起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也体现了我们《青年建设者》报要教育团结全市青年和团员投身包头建设，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青春和智慧的办报宗旨。

《青年建设者》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各项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和自治区、包头市的大事，交流团组织的工作经验，报道各条战线青年的活动，宣扬他们的共产主义崇高精神，表彰先进。根据青年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特点，也适当宣传一些科学知识、文化体育，并为青年们提供一块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

随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发展，1957年3月，《青年建设者》报由旬刊改为周刊。1958年，经中共包头市委批准，小报改赠送为收费订阅，并把版面由原来的八开两个版扩大为四开四版。除头版为要闻版以外，其他三个版分别开设的栏目有：“热爱包头建设包头”、“学雷锋见行动”、“时事讲话”、“团的生活”、“体育”、“影剧窗”、“科学与卫生”、“小知识”和文艺副刊“摇篮”。

报纸版面扩大了，出版周期缩短了，不仅采访、编辑工作量

成倍增加，而且还要做通讯员的组织联络工作和报纸的发行，对采用的稿件付酬等工作，小报的编采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相应地增加。总编辑改由团市委副书记色音同志兼任，色音同志在自治区团委时，曾任《内蒙古青年报》总编，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这次由他兼任《青年建设者》总编，无疑是对小报工作的加强。副总编由新调来的原包头机械厂团委书记杜敬旺同志担任，但几个月后就调走了，又改由原团市委宣传部分部长张长炳同志担任。陆续调来的其他同志有：原《中国青年报》驻包记者荣莲香、原市级机关团委干部王志威、原团市委组织部干部宋秉恒等。

为了使《青年建设者》办得有特色，突出青年的特点，美化活跃报纸版面和引导青年提高文化素养，小报急需一名副刊兼美术的编辑。1958年初，经包头矿务局团委推荐，将在矿务局工作的上海青年许明杰调入小报编辑部，他就是现任包头市文联主任的许淇同志。当年许淇同志精谙美术、酷爱文学，他不仅较好地完成报纸的美化装帧插图和“摇篮”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而且经常挤出时间深入基层采访，写人物通讯、专访和报告文学。当时的著名劳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刘志祥、王凤昌、哈斯楚鲁、杜海、金山、宗玲芳等人的先进事迹和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拚搏的精神风貌，也都通过许淇之笔跃然纸上，为包头青年树立了学习榜样，激发他们为建设包头而献身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

许淇同志的散文作品开始在《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了，而这个时期许淇的刻苦采访，辛勤写作，为他以后在包头文坛崭露头角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

《青年建设者》报改名为《包头青年报》，是1959年元月的事了，这时的报纸已委托邮局在包头地区公开发行，发行量最多时达五千份。

由于《包头青年报》未向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正式申报登记，国家不予计划供应纸张，办报初期纸张由包头日报印刷厂解决，以后新闻纸日趋紧张，只好四处求援，当时中国青年报社曾支援过一部分凸版纸，但也只能维持一时，终有用完的时候。当时包头市委机关报《包头日报》的用纸也自身难保，经常用发黑的劣质纸代替新闻纸印报。至此，《包头青年报》遂不得已于1960年4月宣告停刊，终刊188期。至于二十年后复刊《包头青年报》，那是后话了。

本文作者之一徐淑娴，系包头日报社
前总编室副主任，昆区政协委员。

蒙古族敬老和待客礼节

蒙古族在日常生活中，是很讲究礼节的，最常见的有献“德吉”。

他们将每顿饭的第一箸，称为“德吉”（有圣洁之意）。吃菜、喝酒和饮茶等第一口，也被称为“德吉”。“德吉”有“献”和“要”两种：如家庭来客进餐时，不管是喝茶、饮酒或吃饭，都是这家的年轻人献给来客，然后很有礼貌地说：“请您用……”就是说这第一碗茶（或第一杯酒、第一碗饭）都是由来客首先享用，其他人才动碗筷。蒙古族称之为“法吉乌日根”即献“德吉”。假若来客是年轻人，当他接受“德吉”后，也不首先自己享用，而是忙于给这家的长者倒上茶或斟上酒。在这家长者的劝请下，才动碗筷。这就是要“德吉”，蒙古族称之为“德吉阿奔那”，体现了蒙古族尊重老人、长者的良好风尚。

（乌兰）

育才幼儿园

薛 斌

我市幼儿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在文革期间，幼儿教育又遭到严重的干扰破坏，造成停滞倒退。1973年以后，虽然逐渐恢复发展，但幼儿教育却改变不大，多数幼儿园所设备简陋，保教手段和教育内容比较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改革的逐步深化，包头市的幼儿教育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育才幼儿园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诞生的。

一、科学规范的办园方针

为了改变包头市幼儿教育的落后状况，市委、市政府为推动全市幼儿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决心办一所“教育质量第一流、管理第一流、卫生第一流、保教人员的责任心和服务质量第一流”的新型幼儿园。于是在1984年选择了昆区阿尔丁大街中段，市委大院西北侧的一块准备为市委领导盖住宅楼的地方，委托市教育局负责筹建育才幼儿园。1985年“六一”儿童节，“育才幼儿园”建成并开园。

育才幼儿园造型美观，结构新颖。建筑总面积2,252平方米，投资总额63万元。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与生活等方面设施齐全，场地比较宽敞明亮，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流的幼儿园。全园有教职工61名，其中保教人员41名，大专、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75%。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会计师、主治医师和二、三级教师等有技术职称的28人。园长白秀荣、副园长张桂芳、温桂芹等

同志具有丰富的办园经验。幼儿园内设大、中、小及学前幼儿班等九个教学班，收托3至6岁儿童，现园内幼儿363名。已从1985年至1988年7月毕业四届近300人。

二、严格的管理制度

育才幼儿园直属市妇联领导。为了办好这所幼儿园，市妇联的领导从建园开始，就十分关怀和支持，他们和幼儿园的领导、教职工经常进行研究，实行幼儿园的科学化管理。育才幼儿园从开园起就分别制定了七项园丁制度和七项工作人员职责，以考核检查幼儿园的各项工作，奖惩园长、教职工、后勤人员的工作优劣。与此同时，他们还制定了《幼儿工作者的师德标准》，公布于众，接受广大幼儿家长们的监督。开园几年来，他们通过组织精神文明竞赛，开展“做热爱孩子的好老师”等活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质量，在1987年已经达到了内蒙古示范幼儿园的管理标准。现在，他们已有一支配套比较整齐、专业结构合理、基本胜任幼儿保教工作的师资队伍。全园25名教养员都取得了教材、教法考试合格证，其中23人取得专业合格证。教师保育员都熟悉了业务，能尽心尽力搞好工作。其中有两人还取得教材、教法合格证，并取得了教师专业合格证书。（园内已拟提任教养员。）在1988年7月，全市幼儿园教师“四项全能赛”中他们获得第一名和第九名。

三、完善的保健措施

做好幼儿保健工作，是幼儿园的重要内容，而抓好营养膳食的安排，又是幼儿保健的根本。育才幼儿园自开园以来，十分注意抓好膳食。他们配备有专职的保健医生和保健员。幼儿园严格按营养学标准调配食物，每周换一次食谱。制定每周食谱，都由主管后勤的园长、保健员和伙食组成员一块商定，做到花样经常调换，配料恰当，营养合理。每学期进行一次营养与膳食调查，结合体验，掌握幼儿的营养与生长状况。科学管理要求每个日托

幼儿平均热量、蛋白质摄取量为70—80%以上，育才幼儿园平均日摄取蛋白质达97.18%，热量达88.16%。1988年9月下旬，她们对全园幼儿进行一次体格检查。标准化幼儿园规定达标体重均值为50%，身高达55%，而育才幼儿园体重均值已达82.32%，身高均值达74.75%，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1985年，他们曾荣获包头市“幼儿园膳食营养”评比第一名。

(附1989年6月中旬某周儿童食谱表)

儿 童 食 谱 表

班

1989年6月12日

星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时 间	早餐	主食	牛奶	馒头片	烤饼	炸油饼	糖酥饼	豆包
		付食	饼干	绿豆粥	小米粥	小米粥	红豆粥	小米粥
午 餐	主食	面条	千层饼	肉龙	花卷	卤面	发糕	
	付食		炒鸡蛋	紫菜汤	肉丝豆腐		肉杂拌	
晚 餐	主食	馒头	大米饭	炸油饼	大米饭	豆包	蒸饺	
	付食	肉杂拌	肉炒菜花	肉丝汤	过油肉	肉三样	黄瓜汤	
午 点		巧克力	小食品	桔子汁 加饼干	西红柿	山楂片	绿豆水 糖水	
晚 点								

管理员

大夫

保健员

炊事班长

育才幼儿园注意做好环境的美化工作，保证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他们除在园内植树、种草、养花，还摆设各种盆花、盆景；

设有动物、植物角，喂养幼儿喜爱的金鱼、鸟、家禽；种植一些玉米、豆角、葵花等。在室内还筑有假山、模拟的竹林、大熊猫、猴山、鱼池，为儿童提供优美舒适的环境和活动场所，以启迪儿童美好的心灵，激发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卫生保健工作方面，他们配备了专门医务工作人员，制定了严格检验制度。坚持幼儿入园和职工定期体格检查制度，利用浴室、紫外线消毒等设施，积极做好幼儿防病治病工作，有效地保持了卫生清洁、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奖励和好评。为了提高全体保教人员的保健水平，他们经常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举办“幼儿营养”、“幼儿进餐须知”、“如何把好饮食关”、“如何防治小儿常见疾病”等专题讲座。并通过检查评比，奖励先进，不断提高保健人员的保健知识和保健水平。

四、有效的教育方式

育才幼儿园的领导和教职工认识到幼儿教育对于提高全民思想文化的素质，促进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不断改进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努力克服当前幼儿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轻游戏、轻教育总目标、轻全面发展”的倾向，向着“教育质量第一流”的目标迈进，为培养创造性人才打基础。他们为收到保教质量的实效，采取几个有效方法：1、坚持每学期一次的汇报课制度，围绕教学研究中心，让教师人人讲课，大家评议，共同总结提高，互相取长补短。2、为了促进幼儿智力发展，他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3、根据“保教并重，保中有教、教中有保”的原则，在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同时，加强幼儿保育工作，使幼儿的饮食、起居、活动、休息，做到了规律化、科学化。4、开展了英语教学和学前班试验课，开发幼儿智力，为衔接上小学打下基础创造条件。5、加强家长工作，同心协力培养幼儿。

世俗的偏见，一般都喜欢文静的、服从型的孩子，讨厌不盲目服从和所谓不听话的孩子，造成教育上的偏见和压抑制。育才幼儿园十分注意对那些好动的和所谓不听话的孩子的教育，采取多种方式，把德育贯穿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去。在各种活动中，提出适当的纪律要求，既达到了德育的目的，又能培养出天真活泼、爱想好动的儿童，促进幼儿智力的发展。

她们为了有效达到教育的目的，特别注意结合幼儿的特点，进行创造性教学。她们把结构教学变为过程教学，在开发幼儿智力上下功夫，三年课程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第一年寓教育于游戏之中；第二年是如何培养儿童的发散性思维；第三年是如何开展创造性教学。她们组织孩子们进行建筑游戏、表演游戏、教学游戏、创造性游戏等活动。这些丰富、有趣的游戏活动，既吸引着孩子爱动的心理和喜欢集体的生活，又发展了幼儿的注意力、观察力、思维、想象、记忆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培养了幼儿活动的目的性，明确主动性和创造性强的行为，养成遵守一定的行政准则，陶冶良好的性格。她们还注意利用一切活动机会，训练幼儿动手动脑，使幼儿达到手勤脑灵，促进智力的发展。她们还开辟了第二课堂活动，组织各种兴趣小组，引导孩子为建立“动物角”、“植物角”、“小气象站”，制作动植物标本，提高孩子们自己亲自动手的制作能力。她们通过开设艺术班，丰富和扩大孩子们的知识、兴趣、爱好。艺术班分电子琴、手风琴、小提琴、舞蹈、绘画、书法、刺绣等几个专业，参加艺术班的幼儿有40名。艺术班制定了教学计划，专人管理。她们按教学要求，从基本练起，正规训练，严格要求：乐器从练习手形、节奏、视唱、练曲开始。采取单独训练和家长一齐陪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乐器班的幼儿已能演奏难度较大的《森吉德玛》等多首名曲。吉他班基本掌握了各弦指法、右手弹奏法，现已能演奏几首乐曲。小提琴班基本掌握了各弦指法。舞蹈班已训练完

腰、腿的软度和力度，学习了基本功的几个组合动作，并学会几个舞蹈。小提琴班开始基本功训练。通过多方开发幼儿智力，该园的幼儿智力因素都有大幅度地提高和发展。1988年5月，参加全市“苗苗艺术团”的小朋友赴呼和浩特市汇报演出中受到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好评及广大目睹者的赞扬。这套节目分别在内蒙电视台、包头电视台播出，受到广泛好评。1988年“六·一”儿童节，在全市学前儿童智力、体育大赛中，三名小朋友参赛，其中李杨获六岁组第一名；艾蒙获四岁组第二名。艺术班40多名小朋友除按时完成任务外，排练了六七个精彩节目参加全市“苗苗艺术团”演出。育才幼儿园艺术班许多小朋友虽然1988年夏天毕业了，但1989年“六·一”儿童节，仍然参加全市“苗苗艺术团”在包头市的汇报演出，并受到广大目睹者一致好评。1987年6月，她们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自编大、中、小班三套舞蹈操，经市教育局审定，确认适合幼儿特点，对幼儿健美很有益处，并在全市推广。1988年11月，她们向全市幼儿教师公开10节各科教学课。育才幼儿园的创造性教学，受到全市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普遍赞誉。

育才幼儿园还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经常有外宾参观的情况，增设了英语教学和学前班英语试验课，开发幼儿智力，也为做好上小学的衔接工作，以便孩子们顺利进入小学打基础创造条件。1986年以来，在学前班、大、中、小等九个班进行广泛地英语教学。现在幼儿们可以应用简单的礼貌用语会话，用英语向外宾简介幼儿园情况，还能用英语朗诵诗歌、唱英语歌曲。英语教学不仅扩大了幼儿的发音区域，而且使幼儿在听、说、记、用和思维等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育才幼儿园为了保证幼儿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十分重视保教人员的培养工作。她们采取几项措施：1、坚持每周一次业务学习，缺什么，学什么，学以致用。2、走出去虚心请教，回园

后组织讲模仿课、汇报课等；请进来传经送宝。她们先后聘请市教育局、市教育学院、包头师专等专家教师授课，还邀请鹿城大学初师班学生来园实习。3、利用假期，进行短期培训。每个假期都组织保教人员抽出7—10天时间集中学习。4、脱产培训。先后抽出24人（次）去内蒙古教育厅、教育学院、北师大、市妇联和市教育局组织各种幼儿教育培训班学习，并请包头师专代培。通过这些办法，使保教人员业务能力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现在育才幼儿园普遍利用电化教育的新手段，以充实教育内容，提高教育质量。

育才幼儿园开园以来，取得不少成绩。他们曾荣获昆区文明单位称号；1985年11月，获得全市幼儿园营养膳食调查评比第一名；1986年9月，获得内蒙西部地区对口种植劳动检查评比第一名；1986年5月，获得包头市首届幼儿体操比赛第一名；同年5月又获得全市幼儿文艺汇演二等奖；1987年5月，获得昆区幼儿文艺汇演一个一等奖、三个二等奖；1987年7月，她们的“家长学校”被评为内蒙全区的先进集体；1986—1987年两次全市幼儿教师大奖赛中，她们有九名教师的课被评为优质课；1988年6月，被评为市保教工作先进集体、9月被评为先进学校，受到表彰、奖励。1988年9月，包头市开展的“十项”表彰活动中，她们被评为先进集体，副园长张桂芳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受到奖励。1987年4月，经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验收团验收，被定为全市的示范性幼儿园。1988年，经包头市幼儿园分类检查验收团检查验收，又定为示范性幼儿园。

育才幼儿园先后接待了呼市民幼、白云铁矿幼儿园、伊盟幼儿园、鄂旗幼儿园、东河一、二幼儿园、巴盟、乌盟、乌审旗、郊区、糖厂等幼儿园、内蒙园长培训班、妇女代表团、大同幼儿园、内蒙爱委会、全市各团体代表500多人参观和听课及承担观摩教学135节。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葡萄牙、西德、荷兰等

外宾先后来园参观，受到外宾的广泛赞誉。她们不仅增进了国际友谊，也扩大了包头的影响。

现在育才幼儿园保教人员，正再接再厉，为争取达到市级文明单位和内蒙示范性幼儿园标准而继续努力。

“鹿原”的传说

寸 心

今日的昆区，古地名叫做“鹿原”。提起它的来历，民间有段传说。

很早以前，有个猎人沿昆都仑河谷寻猎。这天拂晓，他乘马来到阴山山口，忽见一群野鹿正在河边饮水。他躲在树后嗖地一箭，恰好射中了头鹿的一只后腿。

这是一只公鹿。当它发现受伤后，撒腿便朝着河的下游逃去。猎人随即策马紧追。当时河水暴涨，将要追上公鹿的时候，只见它一头栽进了滔滔激流……

猎人十分高兴，以为伤鹿已经筋疲力尽，便猛扑过去，想捉活鹿。可是，在他催马下水时，骏马却扬蹄不前了。转眼之间，公鹿游到了对岸。

昆河西岸，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树大林深，一望无际。伤鹿渡河之后，早已不知去处了。猎人感到非常口渴，掬起河水就喝。此刻，他觉得河水有股金属味，仔细一看，水中有公鹿的血迹。猎人想：难道这是宝山上那条金鹿？如果捕住它，那就再也不愁娶不到美丽的妻子了。

想到这里，猎手下马，独自淌过河去，沿着伤鹿的血印，去寻金鹿。他刚进入林中，只见鹿群往来，犹如羊圈；急拉弓弦，妄图一箭双获。不料用力过猛，弓背喀嚓一声断了！片刻间，一群长角公鹿将猎手团团围住，欲置他于死命。

从此，这里便有了地名——这就是“鹿原”的来历。

旧包头的妓院和性病传播

郭体绪

性病亦称花柳病，是梅毒、淋病、软性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病之总称。因多由不健康之性生活传染，故名性病。男女皆可患，妇女更易染。国家法定为乙类传染病。罹患后男女双方皆甚痛苦，且可贻害子孙后代，是危害民族健康和国家声誉的“大敌”，不能等闲视之。性病中的“祸首”梅毒本是“舶来病”。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和鸦片同时由国外传入的。先传到广州，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尚无此病，故曾起名为“广疮”。到梅毒第二期皮肤上出现蔷薇疹后，才定名为梅毒。

旧中国包头市历史上因有上捐税的公开妓院和暗娼传播性病，也曾是性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疾苦，果断地关闭了妓院，严禁暗娼卖淫，切断了传染源。在建国初期人力物力均极紧缺的条件下组成性病防治医疗队，市人民医院积极配合，共同进行了普查并免费治疗。到1964年包头和全国同时把危害人民健康的性病消灭了。这是包头市历史上值得庆幸的大事。包头人把舶来品加上洋字，把梅毒叫“洋梅”，把鸦片烟叫“洋烟”，这两种“舶来货”祸害了包头人百余年，家破人亡者有之，断子绝孙者有之。如若不是解放，谁能梦想把这种祸害彻底消灭呢？

据说，解放前包头市之平康里（今新兴大街）的头道胡同二

道胡同，各有六家妓院，每家院内有三个套院，各院内有許多香房间供妓女用。头二道胡同内的妓女分别定为头等、二等。丁单巷（今新生巷）内有七家妓院，院内为三等妓女寓所。三条胡同共计约有六百人之多。旧社会的历届政府都把妓女只看成是税收来源之一。警察局有专人管妓院。他们也取缔暗娼，但那是为了增多捐税收入。警察局卫生科还派人带领妓女轮流每两周到旧包头医院妇产科接受体检一次。体检结果登记在她们的体检证上。按规定凡是有性病的应接受治疗，痊愈后才允许营业。但是否按规定执行了谁也不知道。实际上体检也只是流于形式，故性病越传越广、越多，为害也越烈。

据说妓女中的大多数是家境贫苦、或遭遇天灾人祸后生活无着、借贷无门的良家女子，在饥寒交迫下万般无奈被逼卖入娼门的，有其悲痛的历史，是旧社会人剥削人的制度下之受害者。她们被有钱的老爷、阔少爷们玩弄、蹂躏。被传染上性病后也得不到休息和治疗，常忍着痛苦任人驱使。妓院中的老鸨子（老板）把妓女视为摇钱树，尽力压榨她们为其赚钱，不驯服不听话的则强迫、毒打。妓女是阶级社会中最受压迫、最痛苦的不幸者。被染上性病的嫖客们骂她们，染上性病不接客，不给老鸨子赚钱的，还要受皮鞭之苦，两头受气挨打挨骂。实在忍受不了痛苦，厌世自杀者常有耳闻。幸于1949年解放后，她们也和贫苦大众一起重见天日，翻身做了主人。

性病消灭也并非易事。建国之初，医务人员少得可怜，花柳病用药既少且贵，其中舶来品还需外汇；再加列强经济封锁，更增添了困难。但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人民健康为重，克服重重困难组成性病防治医疗队。队中以皮肤花柳科医师为主，缺少其他科人员，故须市人民医院积极配合协助，为消灭性病这一共同目标并肩战斗。如该队皮肤科大夫秦效勇同志，为诊疗继发于性病的眼科疾患，常请笔者会诊。在消灭死角工作中，到过劳改

队普查性病。如到西水泉沟沙石厂等处劳改队给犯人普查普治时，也约笔者去协助。其中确有些人患有梅毒性角膜炎、梅毒性视神经网膜炎、梅毒性色素膜炎……等三期梅毒继发眼病，帮助他们确诊，并制定治疗方案。性病防治队的工作人员认真负责，为消灭性病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也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具体事例之一。对劳改犯人的性病也不遗余力地彻底予以治疗，改造其思想，保护其健康，仁至义尽，不歧视。使他们刑满释放后具有健康的体格，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性病防治队的秦效勇大夫为了一专多能，也为了少给人民医院增加负担，曾亲身到市人民医院眼科实践进修三个月，掌握了性病并发眼病的诊疗技术，以利到较远地区去普查普治性病。消灭性病工作本是治病救人的好事，但是做起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说妓女吧，她们本是受剥削受压榨的人，可是当游民教导大队集中收容她们为之医疗性病、教她们学习生产技术、以便日后成为健康的自食其力的新人时，她们因多数有吸毒嗜好，故不甘心老实地接受治病、戒毒、学习。万余人的游教队中百分之五的妓女更难管理，有的甚至得机钻空逃跑出走，所以游民教导大队不得已曾于1951年“七·一”、1952年“七·一”两次进行再清查收容她们归队。待她们的性病痊愈、烟瘾戒除、一门手工业技术学成后，才允许她们逐渐地找对象或找工作离开游教队自谋生活。

文中地名、数字等历史资料来源于旧包头医院妇产科老大夫陈继遵同志，游民教导大队负责人之一的老干部王云龙同志，游教队戒烟所管教人员姜秀珍同志，特向三位同志致谢。

郭体绪：区政协委员

对“五一”反扫荡的片断回忆

苏 中

一、“扫荡”前的玉蓟宝十区

地处冀东西部的玉田县南、宝坻县东、宁河县北三角地带的玉蓟宝十区是一个边缘区。这个区共有64个自然村，我党于1939年10月间深入到那里，1940年开始建立“三三制”村政权。那时全区共有干部12人，多数是新参加革命的同志。当时虽然已有区政府，但无固定的地点，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政府，所以敌人讥笑我们是背包政府。当时地下党的基础更是薄弱，到了1945年，我才知道在“五一”扫荡前，多数村庄还没有党的组织，少数村庄虽然有了党的组织，但党员为数很少，都是单线进行活动。那时经常与我们取得联系的是村办事员，也就是我们的关系人，他们多数是非党群众。

在“五一”扫荡前，这个地区也是异常残酷的，敌人的据点象钉子一样一个个插在区的中心，日伪军频繁出来扫荡。地下党领导人常风、化民、余生同志带领我们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经常是白天隐蔽，夜晚出动。有时进不了村，吃不上饭，就得忍饥挨饿，爬冰卧雪，风餐露宿。

这个区有两个闻名的大洼，一是玉田县南、蓟运河北的南大洼，四周约有四十余里，那里靠双城河西有一个很大的芦苇荡，是我们最理想的隐蔽和宿营地。一是宝坻县的北大洼，四周也有四十余里，据老年人讲，这个洼从清朝光绪年间到抗战初期约40年的漫长岁月里，“碌碌”没有翻过身，意思是连年水患，地不

打粮。每年春季一滩草，夏、秋一片海，出入要坐船，冬季一滩冰，出入乘冰爬。因此多数人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要饭，留下一些老年人看守空房，过着糠菜充饥、一腹肠子半副空的生活。在“五一”扫荡前，我们利用这里交通不便和人少房多、三面环河的有利条件，作为后方基地，炸弹厂、被服厂、印刷厂、织布厂和后方医院都设在这里。

从开辟地区开始，我们就注意组织这里的人们搞生产自救，因地制宜地贷款，组织他们编席、纺线、织布，织网捕鱼，打芦苇簿子，纺麻绳等手工业生产。对有条件的，组织他们到工厂劳动，给一定的报酬。对孤寡老人，定期给予救济。同时发动邻区的群众帮助他们调河打坝，挖河治水。到1942年“五一”扫荡，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内，使一部分长年淹没在水里的土地得到了耕种，从而使过去饱受饥饿的人民逐渐摆脱了贫困。这里的人们曾高兴地唱着，大意是：

共产党来了大变样，四十年的大水归了海，四十年的“碌碡”翻了身，四十年的烟囱冒了烟，四十年的空房变工厂，白发的老汉直起腰，幸福的生活在后头，大家齐心来抗战，来抗战。

正当人们渴望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早日到来的时候，“五一”扫荡，“三光”政策，灾难般地袭来。

二、“五一”扫荡开始

1942年4月28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扑灭我玉薊宝十区抗日军民的斗争烈火，在原有三个据点三百多日伪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团的治安军和一部分伪自卫团，并有以迷信一贯道组织的红枪会，总共约有两千人，向我区大举进攻。在我区南北不满30里路的运河两岸的中心地带，象钉子一样又增设了三个据点，有两个是我们军民基础较好的村庄，各驻伪治安军一个营。他们用铁壁合围，对角清剿，拉网捕鱼，沟壕、堡垒囚笼的战术和“三光”政策，反复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残酷扫荡。形势对我们极

其不利。

当时由于我党的敌工工作做得较深入，在敌人向我大举进攻前，就掌握了敌人要把我区作为进攻重点的计划。所以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敌进我退”的战略方针，决定把人力、物力都迅速转入敌后准备反攻。因此就把在北大洼所有的地下工厂和后方医院以及在那里存放的一切物资和一部分部队都迅速转入山区。工作人员也暂时离开本地区，转入敌后，到山区去，只留下地下党领导人余生、化民同志和我三个人暂时坚守。当时我也要求到山区去，但因工作需要没有被批准。由于当时的形势敌强我弱，根本不能开展工作，和老乡一起住也有困难，因此我们就在距村庄较远的南大洼的田地里挖了一个小洞子，那里是平原地，又距河流较近，挖两米多深就要出水。为了防止潮湿，在底下铺上一些芦草，我们就在那小洞里隐藏了二十多天。白天藏在里面，夜晚到基础较好的村庄里找地下党员和关系人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当然还要搞一些饭吃和准备一些干粮。因为那个地区盛产高粮，老乡习惯吃高粮面饼子，所以每天都要带上两个，以备进不了村时饿了充饥。后来在情况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有时连村子也不敢进了，这样找关系人也更难了，时而忍饥挨饿。

当时这里还有一支部队约一百余人，孤军被困在运河北岸。他们隐藏在地沟里，敌人还没发现，但必须趁进驻英固村的伪治安军还没站稳和北部大股敌人还没进驻的时机，设法迅速突围过去奔向山区，否则一旦被敌人发觉，就要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同时也要使那一带的人民群众遭受更加惨重的“三光”政策的灾难。因此在战术上必须采取既快又稳的措施，迅速侦察清楚阻碍我军奔向山区距我隐蔽地约十里路的驻英固村敌人的封锁线和奔向山区沿途的敌情，轻装便衣，高速行动，夜晚突过去。

三、入虎穴探敌情

因为我对英固村一带的人情地理比较熟悉，所以组织决定我和一名有经验的侦察员深入到敌人驻地，侦察敌情。当时正是五月间农民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扮作种地的农民，架着耢子并在毛驴背上搭了一个种子口袋，背着播种的农具，毫无恐惧地进了敌人的驻地，直奔地下党员兴国同志家里。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学校里的校役，那时他已50多岁了。兴国同志很有斗争经验，也很有胆量，识别问题的能力较强。有一次，敌人妄想通过他了解我们的情况，用叫他自己挖坑要活埋他的手段威胁他。他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就毫不畏惧面不改色地把坑挖好后躺在里面，高声喊着请快埋吧！鬼子看他如此英雄的神态，就连声说：“好的好的，玩笑了，玩笑了！”叫他上来了，他泰然自若地回到了学校。在“七·七”事变开始后，他还不是党员，就借那一带遭水灾的机会，组织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搞借粮斗争，搞得很成功。他年轻时在饭馆学过徒，有一手很好的做菜技术，因此地主、富农办婚丧事宜都要请他帮忙。我们与他一见面，还没等我们说话，他就说我早就把情报准备好了，因为不知道你们在哪里，送不出去。当时那里是两面政权，敌人一进驻，他就被请进了维持会。敌人进村时，他就以迎接的身份，暗自数了敌人的大概数目和武器装备。敌人是很空虚的，每天夜晚只在村子的附近出一个班的游动哨，还得老乡在前面带他们走（这些人都是经他派的），走一段就要停下来，爬在地上听一会儿再往前走。有一次，走到兔子跟前，兔子一跑就吓得打起枪来，村里的敌人也吓得一夜不敢睡觉。向北几里路的村庄扫荡过两次也是太阳刚上来才出动的。根据侦察的情况，经过分析，因驻英固村东南方向约八里靠双城河西岸的边村也进驻一个营的治安军，所以决定由驻英固村的敌军以西突过去有利，一是那里约有十里路的开阔地，二是有运河大堤的有利地形，我们夜晚从堤里边过去敌人不易发现，而我们却容易发现敌人。河西虽有敌人，但距我们要走的路

线还有七八里路，隔着河不易发现我们。一旦发现了我们，他们也不敢轻易过河。另一方面，如果遇上东面的敌人，借助大堤的有利地形可以进行抵抗；同时沿着河堤，可以往西北方向突击，边打边走。

据1943年秋季见到回来的同志们说，那天夜里行军真象飞一样，从地里纵横穿行，既快又静，不细听根本听不得声音，一路只是过蓝泉河前卫部队侦察情况时休息了一下，然后一口气又走了四十多里路，到了山区，天还没有亮，就宿营休息了。

四、隐蔽在药铺里

在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要坚持下去确有困难，敌人每天四面出击“扫荡”，并以行政村为基础强迫青壮年进行所谓“自卫”训练，整个地区基本上都被敌人控制了，不但不能开展工作，就连夜间找关系人也不容易了，而且吃饭也困难了。因此，一天太阳即将西下，天阴得很黑，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打算往北转移到九区去。出了洞口，四处望了一下，只有一些种地的农民架着耢子收工回家，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我们打算按预定计划沿着运河东岸往北走，因为那里的大股敌人还没有进驻，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比十区好一些。不料将要接近河堤时，突然发现不少的老乡奔东南方向跑来。一问，他们说河西的敌人过河了。在天色愈阴愈黑、闪电雷鸣、风雨交加的情况下，我们跑得失散了。我跑了一阵停下来，只见隐隐糊糊有的老乡往回走了。当时我想，他们可能回到洞子去了。我便独自一人也奔洞子的方向走去。进去一摸，空无一人，只是在洞角上放着一个水罐子，拿起来摇了摇还有一些水，我很渴，真想大大地喝上几口。又一想，常听人说渴急了多喝水或猛喝水要炸肺子，再说他们如果回来必然也很渴，得留一点给他们喝，我就躺在里边休息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喝了几口。

我边等边想，他二人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心里焦急不安。这

时天已很晚了，一会儿钻出洞口听听，毫无动静，连续听了几次，寂静无声。在又累又困的情况下，我迷迷糊糊地靠着又潮又凉的洞边睡着了。醒来探头朝洞口外一看，不远处已有农民扶着耢子种地，知道没有敌情。这时肚子已经很饿了，摸摸口袋里还有两个高粱面饼子，掏出来拿了一块就冷水吃下去。从当时受饿的程度看，都吃了也不中用。但不敢都吃了，以防万一不能进村时饿急了再吃。在洞里一面盼他们尽快回来，一面擦擦枪上的土，并把二十发子弹看来看去，把一颗甜瓜似的手榴弹也拿出来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朋友，有朝一口可能要与你同归于尽了！”想到一个人在这里久藏下去不行，看看太阳已近中午，远处种地的农民开始在地里吃午饭了。于是我朝他们走去，想搞一点饭吃，同时也问一问情况。当我走近他们时，他们却表现出疑惑的神情。我对他们说明了情况，疑惑解除了，并问我吃饭了没有，我如实说了。我们一面一起吃饭，一面谈起昨晚奔跑的情形。他们说河西的敌人向河东打望远镜，人们以为他们要过河，就吓得跑开了。一位老人咬牙切齿地说：“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赶走过安心日子啊！”吃罢饭休息了一会儿，我就架起耢子给他们耢起地来。老人看我耢得很直，高兴地问我：“你也种过地吧？”我笑着说干过三年。太阳已经偏西了，农民开始收工回家。看看没有敌情，我也趁农民回家的机会往河堤的方向走去。老人嘱咐我要小心。过了不沾路，天还不太黑，这里距英固村的驻敌约有六、七里路，望了望没有什么情况，便沿着运河大堤走了一段，天已黑下来，然后沿田间小道直奔预定好的联络点。我边走边想，如遇上敌人能躲便躲，否则就与“朋友”（手榴弹）同归于尽。可是一路没有碰上敌人，顺利地到了目的地杨柳村的一个小药铺里。那是个既偏僻又小的村子，过去敌人“清乡扫荡”也到过那里。当时药铺的老先生还没有睡觉，他的医术很高，在那一带很有威望，对我党抗日打鬼子非常拥护，在我们缺少外伤西药

的情况下，他曾主动地给配制过治外伤的中药，治愈了不少伤员。

老先生见我毫无惊惶的神色，对我说化民、余生昨夜曾来过这里，吃了一顿饭趁北面的敌情还不紧，连夜走了。留下一封信，拆开一看，写了“预定计划不变”几个字，末了写了“民生”二字，并划了一个三角，意思是上山了。原来我们在洞子里就决定了，用社会学徒关系的身份在药铺隐藏下来，把那里作为联络点，老先生当时是不知道的。到1942年7月间那一带的村子已被洪水淹没了，出入必须坐船。距那里约七里路东南方向据点里的敌人在洪水包围的情况下，活动不太疯狂了。在已过了霜降的冀东地区的气候早晚已经很凉了，有时水边上也结有冰凌。

一天夜里，地下党的领导人常风、化民同志突然来了。我还没有睡觉，听见三轻三重的敲门声，与平时夜晚请先生敲门的声音不同，忙开门一看，是领导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不知怎样高兴了。到屋里一看，他们还穿着单衣，老太太和她女儿连夜给他们做起棉衣来，第二天夜晚我就用船把他们送走了。他们来的任务，一是告诉我敌人在10月间可能要进行一次大清乡，设法通知地下党员要作好思想准备，又反复向我交待一定要搞好隐蔽斗争，迎接反攻。另一方面，伤员较多，药物发生了困难，因此请老先生给配制一些治外伤的中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从此这里也就成了地下制药厂。老先生对我说，来了清乡的，你哪也不要去，咱们药匣子后边是夹皮墙，如果敌人来了，你就藏到里面不会被发现。他说老奉军（即东北军）住了几天也没有发现这地方。

他们走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来了一个修理筐箩、簸箕的人，担着工具打着唤头，来到老先生门前放下担子。常风、化民他们走时就告诉我这个同志的特征，他小时候有病头发脱光了，一直没长出来，参加革命后人们开玩笑叫他“无法（发）”，慢慢地

“无法”便成了他的名字。他以修理筐箩、簸箕为职业掩盖身份。当时我出去一看，意识到这一定是那位无法同志了，便把他请进院里来，给他找了一些晾药的筐箩修理。这时他有意地把帽子摘下来，我明白了这是叫我看的，就这样接上了头。他把包好的药藏在担子底下，就搭船走了。

五、摧毁顽敌，粉碎“扫荡”，恢复地区

1942年，是这个地区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是军民爬山沟、钻地洞的一年，是村村有哭声有带孝的人的一年。整个地区基本上都被敌人控制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反攻，我们被迫暂时放弃地区，转入山地和地下坚持斗争。到1943年2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军队33万人，于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德、日法西斯的军事优势丧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日益壮大，在欧洲、太平洋都开始转入反攻。

经过1941、1942年那艰苦岁月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已经百炼成钢，学会了战胜一切敌人和反动派的本领。从1943年开始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我冀东玉蓟宝联合县地区的形势也和各个解放区一样，对敌人展开了反攻。当时驻在这个地区境内有两股较顽固的敌人，在玉田县城内驻守的顽敌有以王秉孝（王瞎子）为首的反动自卫团，因几次吃败仗，已成了惊弓之鸟，不敢出城了。其它一些据点的敌人也处于被动自守的状态，不敢出动。唯有玉田县南部靠近冀东日伪自治政府唐山和宁河县卖国贼齐解元老窝驻守窝络沽镇的以王绍武（王二狗庇）为首的伪警备队和一部分伪自卫团、红枪会3百余人较顽固，尚经常窜动出来扫荡，抓人，抢粮。因此我们集中了一部分主力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战术，将其彻底消灭了，三百多名敌人全部被我俘掳。一日之内我军浩浩荡荡乘胜又攻打下了这个地区境内的两个据点。从而吓得驻守靠箭杆河边八门城的治安军一个连似惊弓

之鸟，惶恐万状，丢盔卸甲，扔粮弃草，狼狈逃窜。驻守在运河西岸鲁沽村一个营的伪治安军已成了孤军，吓得惊慌失措，死守在乌龟壳里不敢妄动。我军白天围困，夜晚喊话，搅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在围困中，我们发现敌据点壕沟外的西南方向约五十米处有一个很大的麦根子垛，趁一天夜晚刮起西南大风的时机，我们借助风势将麦根子垛烧着，冲天大火猛烈地扑向敌人的据点，而敌人出入的吊桥又被我军封锁，3百多名敌伪军走投无路，被迫放下武器投降，从而把进犯该地区的敌人一举消灭干净。至此，抗日战争在这个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被敌人控制的地区又重新恢复起来，开始建立新政权。村村敲锣打鼓，跳舞演戏，唱驴皮影，欢庆胜利。

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战略方针和转移到敌后山区坚持地下斗争，从而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因此取得了抗日战争的重大胜利。除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被敌人吓倒外，绝大多数同志经过1942年艰苦岁月的锻炼而成为坚强战士重返十区工作，与那里的人民团结一致，医治“三光”政策的创伤，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继续战斗。

（责任编辑 张清）

本文作者：苏中，建区初期曾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系昆区县级待遇离休老干部。

从当童养媳到走向革命

孙岐珍

我的家乡山西河曲县紧靠黄河边，是黄土高原上雁北地区一个人口不到五万的小县城。从我记事起，河曲就是土皇上阎锡山统治的地方。人们常年累月辛苦劳作，总是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我从小就听人们常说这样一首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的跑口外，女的挖野菜”。

我的父亲就是跑口外的拉船工人，每年春出冬回，拚命干一年挣得一点钱，也难以养活全家几口人。因此，现在每当我一听到人们唱《走西口》，就不由的掉眼泪。后来由于父亲去世，生活所迫，我十一岁进了河曲一家纺纱厂做童工。卢沟桥事变后，我做工的纱厂被鬼子飞机炸毁。生活无着落，我只好当了童养媳。在我们家乡，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十三、四岁就出嫁了，六、七岁的童养媳处处可见，我也同样不能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

日本鬼子侵入山西之后，他们所到之处奉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在河曲近半月，就枪杀近百人，那时我家的亲朋好友就被杀害十儿人。他们强奸妇女就更无法计数了，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太婆，下至十来岁的小姑娘，只要被这些野兽们抢去，就很难逃脱魔爪。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山西大地。当时在山西最有影响的是牺盟会，这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反日同盟。他们宣传抗战要人们

组织起来保家救国。

记得有一次在离我家很近的老爷庙集会，一个二十多岁，模样长得很俊的女人登上土台子大声讲话，她讲了妇女也要象男人一样，走出家门抗日救国，反对虐待妇女，反对童媳和一夫多妻。她的话对我震动很大。在场的人们纷纷议论，当场有人就说，这是牺盟会的宣传队，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家院里住的两个人也是牺盟会的会员。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吸引着我，激发起我强烈的革命热情。在哥哥（当时已参加了牺盟会）和其他牺盟会人士的影响下，1940年我15岁那年，毅然从婆家偷跑出来，参加了村里的工作，当时婆家是极力反对的，后来由于县、区干部给公婆做了工作，他们也就同意了。

村里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使我精神振奋，我们建立村政权；组织民兵、儿童团、妇救会；动员青年参军；组织妇女做军鞋，男女青年上夜校。这时我担任了村里的调解委员，经常到夜校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但是当时我们的红色政权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加之阎锡山统治多年，长期的反动宣传，什么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共产党共产共妻呀等等。有些人受这些反动宣传的灌输，不敢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妇女就更不敢抛头露面了。即使有的想出来，也被父母公婆管着，不能如愿。记得我家有个远方弟媳，婆婆怕她和我们在一起，就把她关起来。我动员她和婆婆做斗争，她婆婆对我又怕又恨，常说：“男不男，女不女的，象什么样子，国民党来了非杀你的头不可”。

为了和封建礼教做斗争，唤醒姐妹们起来革命，我顶着各种流言蜚语，动员村里许多妇女参加革命工作，有的在村里参加斗争，有的送到军工被服厂工作。记得一个叫吕瑞芹的童养媳，公婆怕她出去，总把她反锁在家里，她很苦恼，偷偷托人给我捎话，我得知这个情况后，反复去给她公婆做工作，终于打通了老

人的思想，把她从家里解放出来，后来她成为边区的劳动模范。

那时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样，担任领导职务。建立村政权时，坪泉村群众经过讨论，选出了河曲地区第一个女村长，叫张东花。她当了村长后，积极肯干，为妇女参加社会运动树立了榜样。以后相继涌现出了好多女村长、女区长，还有女县长。巾帼不让须眉，打破了男子的一统天下，有力的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1941年我从村里调到区上，担任了区妇救会副主任，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影响下，丈夫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就在这一年我送他参了军。那时他在前方英勇作战，我在后方努力支前，我们互相勉励，虽然生活在危难之中，但却从心里感到充实、自豪和幸福。

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参加了区上的工作团，到五区搞减租减息，征收公粮。我们住在井峪沟，当时有县委宣传部长乔英怀同志，女同志有我和钟进国、赵景荣。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十二月份了还没发棉衣。有的同志有棉衣也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我们几个女同志没有棉衣穿，只好借了乔英怀同志一件破大衣轮换着穿，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过春节了，区抗联给我们吃了一顿小米饭，烩豆腐菜（平时是根本吃不上豆腐的），大家高兴的又唱又跳，奔走相告：“改善生活喽！”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脱了衣服睡过觉，因为经常要提防顽固军和日本兵的包抄和袭击。

虽然生活苦一些，但我们的工作劲头一点儿也不减。减租减息一开始，群众顾虑很大，主要是怕共产党走，敌人再回来，地主反攻倒算。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走村串户向群众讲明，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那里有人民那里就有共产党。在打消顾虑的基础上，我们让广大农民知道，我们成年累

月的辛勤劳累，却吃不饱穿不暖，连自己最基本填饱肚子的要求也不能达到，而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反而倒存的有放的有，出门还让我们抬着走。这难道合理吗！是这个不合理是封建制度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我们要铲除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减租减息。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各村建立起农会组织，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经过减租减息，过去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农户，既有了房住，又有土地种了。沙果村有个刘二唐，过去成年给地主扛长工，经过减租减息后，不仅有了房子和土地，还娶了媳妇成了家。

那时我们县的干部大多是年轻人，县长、县委书记最大二十三、四岁。我们一区从区委书记、区长到下面干部百分之九十都是年青人。老百姓叫我们娃娃区。区委书记王景义、区长金照英他们才二十上下，领导一个区，干起来生龙活虎，从不知疲倦。每到一村，背包一放就和村干部、群众一边劳动，一边工作和宣传。那时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是生活在群众中的，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同县长韩容鲁同志一块劳动，他身体不好，大家让他干点轻便活，他硬是撑着身子和大家一起挑大粪。那时候的干群关系是那么融洽，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大家只有一个心眼，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

那时我们每到一处，都要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编写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诗词或快板。记得有这样一首诗：晋西北呀好地方，家家户户收秋忙，人人都说收成好，快收快打快入仓。交公粮呀交公粮，男女老少喜洋洋，抗日的军队吃得饱，打得鬼子回东洋。男女老少走到那里唱到那里。

在敌人的封锁下，1942年解放区军民遇到了暂时困难，党中央向边区军民发出了“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边区军民积极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定出了

单位和个人计划。要求粮食除留足自给外，全部上缴政府。妇女纺线织布交政府土布一个（三丈二）。当时织布的原料来源很困难。由于河曲县不种棉花，只得向外地购买原料。而敌人封锁原料进不来，我党发动群众自己种棉花，经过广大人民的积极努力，基本解决了纺线织布的原料问题。

当时的纺织运动，主要由县、区妇联组织开展。我那时在区里搞妇女工作，加之在纺织厂当过童工，会一点纺织技术，就当起了技术指导。我们又找了几名过去学过纺织的妇女当老师，办起了纺训班。参加培训的学员一开始大多是各区、村的妇女干部和积极分子，以后逐渐发展到一般群众。经过学习，培养了一批纺织能手和技术骨干。学习结束后，这些骨干又分别在各村办起了纺训班。我在二区的万解村、上养全村，也先后又办了两期纺训班。就这样，纺织运动在全县推广开来了。过去有些男人看不起妇女，认为女人只要看好孩子做做饭也就成了，不让她们来学纺织，现在看到了纺织的好处。自己种点棉花、织点布，就解决了全家的穿衣问题，还能为政府分忧解难。这样群众纺织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人还翻山越岭，用驴驮着织布机来学习。通过开展纺织运动，还发现和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涌现出了许多劳动模范。有的担任了县、区的妇联主任及村长，大大壮大了我们的队伍，增强了革命力量，而且又把一批妇女从封建家庭中解放出来。

到1945年河曲县的纺织已普及到村村户户，家家有纺车，村村有织布机。有的村不但妇女会纺织，连男人也能纺能织。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段快板：“人凭毛主席，虎凭山，妇女进了纺织班，脚一蹬，手一扳，又有吃来又有穿”。表达了解放区人民对党的赞颂和丰衣足食的喜悦。就这样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同心协力辛勤劳动，在两三年内基本解决了边区军民的吃穿问题，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那时候解放区的对敌斗争是很残酷的，也要经受血与火的考验。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1946年，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与河曲隔河相望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非常猖狂，他们趁我军不在河曲之机，偷渡黄河，白天抢，晚上抢，有时一天抢几次。尤其是阎锡山、朱玉英的土匪军，他们一边委任伪村长、伪区长、伪县长，一边到处杀害和搜捕我党干部和民兵。仅1946年11月一次就杀害了我党干部几十人。其中我认识的有县长韩容鲁的岳父乔甫小，农会主席鲁高小，复员军人侯高清。还有许多民兵也都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就连老爷庙的和尚黄三敌人也不放过，惨遭杀害。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刚从六区回到城关探家，一区的区委书记张林成同志匆匆跑来，推门就说：“岐珍，快走！敌人来了！”我俩刚跑出东门外，就听到敌人进了城。我们赶紧上山，给部队报信去了。那次敌人进城后，复员军人阎××率领部分民兵奋力阻击敌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光荣牺牲了。敌人放火烧了河曲的古楼和玉皇阁。我晋绥军区得知敌人偷袭河曲后，马上调绥远五团连夜赶到河曲，在民兵的配合下，我军连夜发起攻击，不到几个小时，阎锡山豢养的朱玉英顽固军就被我军击败了。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人，并活捉匪军团长黄万雄，取得了河曲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张秀莲 协助整理）

本文作者：孙岐珍，曾任昆区妇联副主任、区企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系县级待遇离休老干部。

对通辽以北地区一次战斗的回忆

〔蒙古族〕 郑林台

一九四七年阴历腊月，在哲盟通辽地区，我党与国民党形成“拉锯”之势。我当时是内蒙骑兵二师王师长的警卫员。腊月二十三日，我骑兵一师、二师开始袭击通辽千家店、大岭站等敌占区。其主要目的是趁敌人过年，放松警惕之机，袭击敌占区，摧毁国民党的各级政权，消灭敌人的零散武装力量。我们于腊月二十九日撤离战场，驻扎在通辽正北约一百二十华里的要忙哈、布敦毛都、塔本扎兰等村，准备过年。

由于战斗连续进行了七昼夜，人未合眼，马没歇鞍，战士们都疲劳至极，到达驻地，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呼呼入睡了。当天晚上，约十点钟左右，有一位老乡骑驴走近路，从通辽北四十华里的莲花泡子来我师部报告：国民党军队约有三千多人，从通辽出发，向我骑兵师驻地扑来，要袭击我们。师部立即向联合司令部报告了这个消息，并通知驻扎在要忙哈北三十多华里舍百吐的东北保安二旅。联合司令部命令我师向东布敦毛都撤军。师部紧急集合队伍，号声已响，可战士们仍困乏得起不来，只好你拉我拽，集合费了好大的劲儿。

我骑兵二师撤至布敦毛都一师的驻地时，发生了一个小误会：尖兵排先进村，报告说“情况正常，一师在睡觉。”于是，师部就率队进村。村西头有个大院，十一团的陈政委先进了院。我和王师长随后走到大门口。这时，陈政委跑出来紧张地对我们

说：“这里全是国民党兵！”我一听，心里很急，因为门洞两边全是高墙，转身撤出很危险。于是，我先扶王师长跳过西墙。我一手牵着两匹马，一手提着枪，不能跳墙，就持枪隐蔽在一扇关着的门板后，以便自卫。约过了二十分钟后，警卫连包围了这个大院，我才撤离，可手已完全冻伤。后来才搞清，是国民党的一个重机排投降了一师后住在这里。

敌人在我们撤出的几个村扑了空，气急败坏地继续追击。第二天上午九点来钟，敌人到了东北保安二旅的驻地舍百吐。保安二旅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早有准备，因此异常镇定，正在搞庆新春的娱乐活动——画装扭秧歌。敌人还立足未稳，就遭到保安二旅强火力的迎击。这时，我骑兵一、二两师也从敌军东侧和右后方近距离围攻，两个师的重机枪集中火力射击。一师炮兵营的两门日本九〇野炮发射的炮弹，在敌阵中开了花，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可惜炮弹仅有五发。战斗进行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敌军由于受到我军夹攻，又跑了许多路，一夜未歇，已疲惫不堪，便从原路撤回要忙哈等四个村，负隅顽抗。从下午三点钟开始，指挥部连续组织了两次冲锋，但均因敌人火力太强而未成功。据说这支敌军是国民党当局刚从缅甸调回来的新五军，装备精良。指挥部又下达命令：天黑以后再次冲锋。这时，我二师十一团的联络员报告：东要忙哈已被我军占领。我二师师部便决定进村设指挥所。离村约有一百米时，突然遭到重机枪、六〇炮等火器的射击，我们便迅速撤到村东的土山后。当时牺牲了副师长的一位警卫员，有几人负伤。撤出后才知晓，我骑二师十一团的一个排确实占领了这个村，但敌人集中几个连的兵力进攻，排长负重伤，伤亡严重，不得不撤出，还未来得及报告师部，师部险些陷入绝境。大家非常气愤，同仇敌忾围攻敌军。敌人顶不住了，敌指挥部便在天黑前下命令“各个前进，目标通辽”，实质是让分散逃跑，到通辽集中。敌人立即溃不成军，除被消灭的外，大部分被

俘，仅有少部分脱逃。

大年三十整整一天的战斗，附近的老乡不顾枪林弹雨，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鸡蛋、饺子、肉、馒头等，把过年的好吃的都给我们送来了。当时，战士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至今回想起来，仍使我激动不已。这种军民鱼水深情，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所以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鲁玉华 整理）

本文口述人郑林台，曾任昆区革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已离休。



回忆点勒素之战

任福才

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的一天，我军从呼市东边猪海村出发，部队向西南方向行进，途经呼市托克托县管辖的一个村庄——点勒素村，当时正值中午十二时左右。

我军先遣部队的尖兵发现村内有敌人，可是对详细敌情还无法了解。尖兵正在深入侦察时，遇到了村里跑出的当地老乡，经打听才知道村里住的敌人是还乡团，兵力有一个营。还乡团的营长原是我方的游击队长，后来叛变到敌军，因有一只手残废，所以给他送了个外号“一把手”。

为了迅速消灭这股敌人，我军下令将敌占村迅速包围。这个村庄很大，住户也不少，村内有一个教堂，教堂四周设有围墙，围子内的东北角有一个高大的炮楼，站在炮楼上可将全村和村外四周望得清清楚楚。敌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围子里。

我军所处的地势是一片开阔地，很不利于隐蔽，而敌人在暗处，既有围墙又有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这一天，我所在的团既是先遣部队又是执行团，当然尖兵班、排、连都应该是我们了。由于当时敌人兵力只有一个营，因为我军也没必要动用更多兵力，一团、二团在附近村里休息待命，并防备别处敌人增援。司令部命令我们把顽敌拿下，一个不准跑掉。

团部给我所在的一连和五连下达了攻打小围子的任务，其他

连队攻打村外的守敌。敌人把各要道口都把守的十分严密，他们边打边退，想退到围子里顽固抵抗。

在这时，连部命令我们一排堵截敌人退路，二排、三排在东南的开阔地为我一排作掩护，由于我们在明处，而敌人在暗处，所以部队在战斗中有十几名战士流血牺牲。我们排首先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又向着敌人火力凶猛的封锁线攻击。这时，突然间从我们的背后打来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在来连部传令的通信兵的肩膀上，棉衣上雪白的棉花被打得飞扬起来，可巧没有打在肉体上。我忙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们班的一名新编入不久的解放战士——王锁小，他趁我们向敌人全力攻击时隐蔽在坟墓后边打黑枪。我当时在五班任班长，发现这种情况时我又气又急，照着王锁小的头顶用铁把冲锋枪就打了一锁子。这是为了命令他随队伍向前冲，并不是想往死打他。这时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因为战斗异常紧张，所以也顾不上详细追问王锁小打黑枪的事（战斗结束后才发现王锁小是敌方的特务，后来被送到军法处判罪）。我们已顺利地占领了敌人把守的围子外边的板打墙下边。离围子大约有三百多米的入口，敌人用两挺机枪封锁的很严密，我就命令王锁小必须将敌人的射击口封住，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并命令副班长和战士侯润年与王锁小一道封住敌人的射击口，而且要防止敌人占领这里的要道。我随即带领全班的其他同志攻打小围子的北边，这时五连也正巧运动来了。因为当时的仗打得很激烈，没有来得及准备云梯，只好用手榴弹往围子里扔，很难往里攻。后来团参谋命令我们先撤下来，让五连先用迫击炮平射，有两炮从北面将围墙打开了两个大口，同时在西边也打开了两个口。炮兵停止射击后，紧接着一连、二连、三连、四连都同时往上冲，我们班16岁的小吕玉民第一个从围墙口冲了进去，我带领着全班也随后冲进院内。院内的敌人惊恐万状，东钻西藏，乱作一团。敌人有的钻到柜里，有的爬到瓮里只顾逃命，我们大声喊

着：“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可敌人都不出来缴枪，我们只好分头四处搜寻和敌人展开了近战，院内的敌人已失去了反攻能力，只是抱头鼠窜。东北角的炮楼上死守着二十多名顽敌，他们用机枪拚命向我们扫射。我们先是向他们发起政治攻势，但他们根本不听，更加疯狂地向我们射击。为了迅速消灭这股顽敌，我们五班、六班和一连的三个排向炮楼展开了强攻，这时已经有五、六名战士光荣牺牲。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战士，同志们的心中燃起了怒火，个个就象猛虎一样向炮楼扑去，终于有几名战士攻上了炮楼，紧接着又冲上了几名，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这座炮楼，全歼了里边的敌人，同时院内躲藏的敌人也被全部俘虏。这场战斗共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打死敌方100余人，俘虏100余名，有愿意回家的就给他们拿了路费让他们回家，有愿意随我军走的就补充我军的各连中去。

这次战斗的善后工作由团部负责，我们随后开赴内蒙凉城进行整训。



激战态基庙

任福才

一九四八年秋后的一天，我所在的骑一师三团奉命开赴张北县，配合兄弟军区攻打敌伪军的一个粮站。当时，守粮站的敌伪军大约有400余人，另外有一个汽车运输团正准备拉运从各地抢来的粮食（多数是小麦）。当天晚上，敌人嘈嘈嚷嚷地指挥着一些民工抢着往车上装粮。这时我军已经悄悄赶到了。我们团的任务是拦截张北县东的公路，第一防止敌人逃跑，第二堵击敌方增援。开头的一仗打得非常利落，共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歼灭。这场战斗北业军区出动了多少兵力我们也不太清楚，据说是一个师（因为当时是夜行军，又是各走各的路线）。初战告捷后，各部队下令每个步兵背三十斤小麦、骑兵带五十斤从张北运到态基庙交给我军粮站，再统一运走。

当我们交完粮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六点钟了。由于我军当时的一部分汽车被敌人破坏，另一部分在战斗中又被敌机炸坏，因此只好用人背运粮食。待北业军区的重武器营的战士们把粮食背到目的地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司令部让他们在态基庙休息。我们团在距态基庙西北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子落脚。由于村子较小，战士们只好分散到周围的各村去住，二、三连距我们二、三里地，四连和机炮连以及团部离我们大约一里多路。

我们正准备吃饭，忽然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号声，战士们非常迅速地集合到一起待命。不一会儿，团部雷作战参谋带领通讯班

急速赶到我连，向我们布置了战斗任务。

这时我们才知道，敌人的骑兵四师包围了住在态基庙的我军北业军区重武器营。我们的战斗任务是迅速打退敌人，将被围攻的重武器营接出来。我连奉命从态基庙西北方向出击，二连和三连向西南方向攻打。

敌人所占的地形是个小山坡，距态基庙大约三、四里地，距离我们却很近。

我们连的二排靠近敌人南面进入隐蔽地，三排向敌人的正面进攻，一排转到敌人的背后打袭击。战斗打响之后，我们开始并不知道所攻打的前方正是敌伪军的总指挥部，战士们猛打猛冲，敌人发现了我连的重火力点后，又配备了一个特务连、一个执法连向二连疯狂地扑去。二排是个机枪排，因来不及上马冲杀，只好压住阵地用机枪猛烈扫射。这时，敌人就象疯狗一样向二排阵地猛扑，前边的被打倒了，后边的紧接着扑上来。敌人使用的是铁把冲锋枪，一锁子就是五十发。敌人越逼越近，我军的机枪已无法灵活地发挥效力了。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士们都临危不惧，个个操起了手榴弹向敌群中扔去，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可战士们也有的受了伤，有的壮烈牺牲在阵地上。熊熊的怒火在每个战士的心中燃烧着，大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着阵地，抓住时机向敌人发起强攻。这时，战士们手中的手榴弹也用光了，就拣起石头和土块向敌群中猛砸。二排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处境十分危险。

我们的两个排（一排和三排）将敌人打得东跑西窜，节节败退。我们英勇冲杀，乘胜追击，而且已经抓住了几个俘虏送回我军指挥部。这时，我们得到二排被敌人包围的消息后，立即停止追击，奉命火速营救二排。

在我们赶来增援时，六班长宗小堂同志所骑的战马被敌人打伤，他又换上了另一匹战马，但没有顾得上取下带在伤马身上的

战刀。战士们身跨战马，手挥战刀，向敌人猛冲猛砍，一场肉搏战开始了。

宗小堂同志因没有战刀，就取下身后背着的小铁锹冲向敌群，而且冲杀在队伍的前列，敌人看清了他手里拿的是小铁锹时，三个敌人就一起向他射击，宗小堂同志不幸壮烈牺牲。

三个敌军又扑向随宗小堂冲上来的一名新战士——刘占元同志。因这名新战士骑马的技术还不够过硬，就只好跳下马向敌人开枪。他用自己的大枪打倒了一个敌人，并在另一个敌人换子弹的时候，顺势拣起了扔在死敌身边的冲锋枪。小刘当时并不知道铁把冲锋枪如何使用，因此扳了一下枪机没有发射，他就手急眼快用枪把向敌人的头部砸去，把那个家伙砸得昏了过去。另一个敌人又向刘占元猛扑过来，这时我们全班都赶上来了，这个敌人见势转身奔逃，拒不交枪，被我军连连几刀砍死了，为宗小堂同志报了仇。

我们排和一排又继续向敌人冲击，一路猛砍猛杀。为了堵住二排阵地东边的那股敌军，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拚杀，而且越杀越勇。在追击中又俘虏了三十多个敌人。

我们奉命停止追击，赶回二排战前阵地打扫战场。这时，团部和我们连都已赶到这里，一看，二排大部分的同志壮烈牺牲在阵地上。我们的副连长和二排长也将一腔热血洒在阵地上。在英勇烈士面前我们都低头默哀，心中更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态基庙一战，虽然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我们将北业军区重武器营无一损失地接了出来，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敌人妄想阻止我们运粮的阴谋也遭到了破产。这场战斗，我们打死了敌人100多名，抓了一批俘虏，缴获了大批武器、马匹和弹药。

作者任福才，曾任昆区人民政府前进道办事处副主任，县级待遇离休老干部。

从西北卫校到朝鲜战场

李士昌

一九五〇年初，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任军部卫生所长时，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东北坚持到辽沈战役的结束。进关后又连续频繁作战，经过冀东转战，南保石门（石家庄），强攻保定，横扫平绥，西进大同，参加平津大会战，解放北平、太原，又经西安解放兰州，最后解放宁夏市（今银川），宣告西北地区的全部解放，开始由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时期。在意料之外，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到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创建的西北公共卫生学校去学习。接到这个命令的当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实有说不出的喜悦和高兴！许多领导和战友们，都为我有这次学习提高、难能可贵的深造机会而庆幸，并鼓励我好好学习，努力完成作业，取得较好理想的好成绩，不要辜负上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培养与期望。我很感激上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热情关怀，所以我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圆满地完成这次学习任务。

这次入学，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在过去艰苦环境的战斗生活中，那有现在这样的学习条件？自己原来的文化水平很低，虽然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抓住时机学到一些星星点点的技术与知识，从当卫生护理员、调剂员、司药、看护长、医助、医生、团卫生队长、军部卫生所长的职务过程中，也经受过一些实际的锻炼与提高，但毕竟是一知半解，勉强能够应付那时的环境，缺乏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医务技术上不能适应今后工作的要求，与职

务对自己的要求也有差距。因此，使我深刻体会到学习提高医务知识迫在眉睫。

系统地学习医务知识，对我来说，已经是梦寐以求了。那还是一九四八年，我在东北热辽军分区独立团任卫生队长时，军分区卫生部已决定并通知我去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深造，但因部队调整，改变从属关系，我团由东北调到华北，编入华北部队。上级下达整编命令，规定着武器装备、全班人马一齐交，不准自行调动。也由于保密的原因，我团以执行任务为名，突击过关来到华北地区，迅速地进行了整编，同热辽军分区脱离了关系，我因此也就失去了那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深感遗憾与可惜。而这次又给了我学习提高的机会，确实是可喜可庆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我从宁夏（指银川市）去兰州赴校入学的时候，因为刚刚解放不久，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火车可乘，交通极为不便。而更严重的问题是，那时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特别是远郊和重要交通道的两侧，武装土匪甚多，他们作恶多端，时常有可怕的不幸事件发生：过往的路人常常被卡住，抢劫财物；稍有不从，就有被杀伤人命的危险。把人们闹得愁苦不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虽心急切切，但无法前往，只有等待时机了。过了不久，恰好我军政治委员王道邦同志去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开会。在他乘车前往时，部队派有一个全付武装的小分队警戒保护。借用这个机会，领导让我随同王政委一同出发，这才安全地到达我们亲身参加解放了不久的西北重镇——兰州市。随即，我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进了军区公共卫生学校。

这所学校，座落在兰州西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地名叫做“下西园”。东西两面是山，南北是宽阔的田野，是利用一家弃用多年的旧厂房创办起来的。这里，除了占地面积大，校园四周宽敞，便于建设的发展。实际当时只有一个小院约一百多间房

舍，且多是陈旧不堪、长年失修停用的。环境很脏，几乎到处是垃圾废物，遍地野草丛生，条件非常简陋。学校的教职员和知识技术人员，多系解放后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从延安来的一批同志也充实到这里来，形成各种思想意识、工作方式并存的局面。那时，校党政领导以事业为重，办校的决心很大，号召我们这些军队带职学员要尊重团结党外的教职员和社会上新招收的青年同学，鼓励他们发挥技术才能，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忠心为人民服务，共同搞好教学工作；还要我们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发扬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自己动手建设、修缮、改造我们的学校，创造较为实用的教学与生活条件，为学校的正规建设和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我们这些从部队来的学生，积极响应号召，以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风尚，严格的要求自己，发扬模范带头作用，除团结同学尊重教师、保障自己的学习之外，都自觉自愿的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参加各项体力劳动，打扫校舍、清除垃圾，搬砖弄瓦，泥水水，干这干那，经常是满头大汗、一身泥土。尽管那里的活多，劳动量大，人们都很疲劳，但都情绪好、干劲大、没有怨言。因我们那时年纪轻，思想单纯，身体素质好，精力充沛，有上进心服从领导、齐心协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干，改变了校园的模样，人人笑逐颜开！

我们这些老一点的白衣战士，都是来自第一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所属各军、师、团的营连级干部，由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以及山西等省远道而来。其中有一位同学，是红军时期王震将军任连长时，他在该连当卫生员的“老资格”。来校前，他是团的卫生队长，我们都很尊敬他。见到这样老的同志也来学习、深造，很受激励。可是，因为他过惯了战斗生活，乍来时坐不住，仿佛小鸟入笼一般，总想回部队。校领导便从多方面对他加以照顾。在学习上，经常个别辅导、重点施教；在生活上，安排他吃小

灶。这位老红军，终于坚持下来，在学习上成为大家的楷模。可惜，时隔已久，忘记了他的姓名。

我们在学校学习，免不了要买点东西。在我们学校门口，有个摆摊设点、卖杂货的老头儿。他可不平常，王震将军在红军时期当营长时，他是那个营的营部管理员，他们俩是亲密战友。后来他年纪大了，离开了部队，在兰州安了家，据说，王震和他有书信往来，还来看望过老人。人们都知道他的历史，尊敬地称他为“老革命”。我们买东西或者是路过他的小摊时，总要喊他一声“老革命”；他为人和气，笑脸可亲，学校的学生，教职员工都同他相处得很好。

我在校学习期间，家乡的亲人给我来信告知：家乡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能否寄钱帮助渡过难关？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校领导递交了一份申请困难补助的报告。出乎我的意料，经校领导研究决定，给我补助800斤小米，折款付给。我又将自己平时积攒的一些钱，一并寄到家乡亲人手中，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发补助金时，学校政治委员苏克菲同志亲自同我谈话，他和蔼地说，同志们有困难，我们应该尽力帮助，这次给你的补助数量不多，但表达了组织上的心意，他又鼓励我安心学习。学校党组织和领导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学校聘请过一位非常特殊的老师，他是一位没有职称、没有固定工作的专家，他虽然学识渊博、技术超群，在偌大的兰州市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奔波于荒野郊乡过着流浪生活。他原是解放前兰州市规模宏大、赫赫有名的中央医院的医师，是兰州城乡遐迩闻名的和医学界公认的唯一的热病专家。当时的国民党强制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加入国民党，可他已经看出国民党反动腐朽的本质和日趋没落的末日，硬是不买账，坚决拒绝

参加国民党组织，公开声称靠技术凭本事吃饭。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虽然技术高超、工作出色，但受到严重的排斥摧残和刁难打击，在实施技术的过程中，时有发生事故和严重恶果的可能性，使他无法正常地发挥其技术才能和顺利安稳地进行工作，他的自尊心深深受到伤害，他屈辱、愤恨，终于，他决定与广大劳动人民相依为命，毅然走出医院，离开城市，背着药包，以走村串乡、自由游动的形式为广大劳动人民解除病痛。他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欢迎和爱戴，人们都称他为救命恩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兰州中央医院，在黑热病的诊断、处置上束手无策的时候，千方百计地请他回医院，解决疑难问题。他这个人有请必来，一来就解决问题，问题处理完就立即回乡下去。因此，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许多地方都流传着他的佳话。直到兰州解放以后，西北地区的卫生部门发现了这个人才，就把他请回城市。妥善安排了他的工作，使他得到彻底的解放，踏上了光明大道。

我们的校长胡克诚同志，那时还是党外人士，但他是曾在美国留学的著名专家，学术强度很高，曾在上海一所大学里任过教，有很高的声誉，在那时的西北地区，他是独一无二的公共卫生学的专门人才，他对传染病学，特别是流行病学有较深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他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重视，得到广大教职员工和同学们的尊重。

胡克诚同志和从延安来的一位政治委员，一位付校长，按照上级的意图和指示，在西北地区的中心区域——兰州市创办全国第一所公共卫生的专业学校。这是在刚刚解放不久的不平静时期，而且又没有办学校的经验，但是，办好这所学校，将会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急需的专门人才，还会为办学积累经验。他们几位领导信心十足，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学校的工作中，合作很协调。胡克诚同志待遇最高，居全校之首，具体工资是十八袋精粉，按市场价格付给现金。他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但是和同学

的关系很融洽。他讲课全面、深刻、细致、耐心透彻，方式方法灵活多样，不仅讲课本上的，还讲课本以外的中外资料，同学们都觉得好领会，学到的东西多。可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不知为什么，几位校领导意见不一致，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学校，被上海一所大学聘请为教授上了班，这可把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急坏了，派人到上海做他的工作，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周折，终于请回了胡克诚同志，我们好多人都去迎接他，胡克诚同志仍然担任校长工作。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和学校领导一起，参加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任弼时同志追悼会，是在西北长官公署大礼堂进行的。彭德怀、习仲勋、李真、张宗逊、张治中等党政军领导，高级将领参加了追悼会。和这么多的高级领导一起参加大场面的会议，这还是第一次。甘泗淇同志致悼词时，悲痛地泣不成声，会场沉寂在一片悲哀之中，当我听到任弼时同志忠心耿耿、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以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高尚的道德规范影响着年轻一代时，我流出了热泪，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这次会议使我难以忘怀。

正当我们学校的条件逐渐好转，教学工作趋向正规，同学们学习劲头十足并取得一定成绩时，我们突然接到我们所在的第十九兵团的通知，命令我们各军师团在校学习的全部卫生干部，立即停止学习，办妥手续，服从大局，做好一切准备，跟随部队一起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学校向我们宣读了命令后，同学们轰动起来。因为我们来校后，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学校的建设劳动，主要课程和重点课刚刚开始，没有完成教学计划，更没有达到教学目的。鉴于这种情况，学校领导通过大军区与第十九兵团联系协商，决定我们几个学生，把赴朝时间推迟六个月，学校在这段时间里，突击教学，争取把几门主要课程全部授完学好，提前毕业，然后再执行抗美援朝的任务。轰动的校园终于平

静下来。学校调动了所有的力量，除校长、教导主任和一些骨干教师亲自给我们授课外，还聘请了兰州大学的教授、兰州中央医院的主治医师、兰州电化馆的高级技术人员，给我们讲学授课，提供优越的实验、实习、参观的条件。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多方面无私的援助、支持，广大教职员工与同学们的密切配合，我们终于按计划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学校给我们办妥了一切毕业手续，举行了毕业典礼，照了师生合影的纪念像，发给了纪念品，最后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那天，人们的心情是激动的，到处洋溢着同志间的深厚的感情和友谊，无处不是良好的祝愿和依依惜别之意，我们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在校学习的同学们，准备迎接伟大的新的任务。

在我即将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的时刻，由于受到多种情况的影响，我想了一些问题：我们刚刚结束了战争，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不久，又要投入战争，过艰苦的生活；美帝国主义的军队装备精良，环境残酷，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在异国他乡思念家人。但在全中国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影响下，我想：革命军人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我是个共产党员，应忠诚党的事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挺身而出，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已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革命的继续，我一定要参加最后的战争，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尽到自己的义务。我克服了私心杂念，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以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华儿女的气魄，坚决执行命令，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奔赴前线，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去。

（编辑：凌玲）

本文作者：李士昌，建区初期昆区政府文教卫生科科长，后任区卫生局局长等职。系县级待遇离休老干部。

难忘的战地摄影生涯

杜守恒

抗美援朝时期，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的一名摄影干部，曾随军在朝鲜战地工作达五年之久。从战火滚滚的“三八线”，到停战后的“阿妈尼”新居，我的足迹踏遍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如今，虽然几十年已经过去，每逢翻阅那时留下的一些“镜头”，我的心魂总是久久地萦绕在上甘岭的坑道、西方山的猫耳洞、斗流峰的射击台、三九一高地的交通沟，以及许许多多最可爱的勇士们的面庞上。

触景生情，终身难忘。就让我把在战地采访中，尚能记得的几个片断，写在下面吧——

刘新民，你在哪里？

现在，我的手里，还有一张变得发了黄的照片。照片上的战士，名字叫刘新民，是我当时所在部队中著名的神枪手。就在我为他拍照时，敌炮打了过来，他用身体掩护我的安全而负伤，以后再无见面。刘新民同志，现在你在哪里？

这是1952年9月下旬的事。上甘岭战役还没有爆发之前，实际上美国强盗的锐气就已经被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挫伤了。这一时期，我们在整个“三八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冷枪杀敌运动。运动开展不久，就把拥有“尼龙避弹衣”的

侵略兵打得低下头来。拖死尸的敌人整天得不到休息，吓得丢魂丧胆，总怕挨上和平正义弹头的惩罚。

就在这个时候，志愿军前沿部队里，到处出现了冷枪杀敌的能手。我所在的部队某团三连，有一位名叫刘新民的战士，仅仅用了49天和百余发步枪子弹的代价，就射死99个美国强盗，眼看就要当上“百名射手”了。这时，师政治部专门为他制作了一面“杀敌能手”的锦旗。因我要去为他照相，部队党委便委派我去前沿阵地给他赠旗。

9月25日，天刚蒙蒙亮，我带着锦旗和照相机，穿过了十几道敌机、敌炮封锁线，来到了刘新民同志防守的阵地——斗流峰。钻进坑道工事以后，我把来意向连队领导讲明，指导员连忙派通信兵把刘新民同志喊了来。

刘新民同志魁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黑里透红的脸庞上长着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乍看上去，他见了生人还有点淳朴农民特有的羞涩呢。

指导员作了介绍之后，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恭喜你啦，领导上派我来给你献旗、照相，并且还决定让你参加国庆节的归

国观礼。这回你可要看到敬爱的毛主席了。”

刘新民坐在炮弹箱上，稍低着头想了片刻说：“党和首长对我太关心，自己对祖国并没有多大贡献，哪能享受这么高的荣誉。同志，请你转告上



级首长，我要以冷枪杀敌一百名的实际行动，给国庆节献礼。”

黎明，和煦的阳光透过朝霞，这正是冷枪射杀敌人的时机。刘新民愉快而有信心地走出了坑道，和观察员一同走上了射击台。为了拍摄刘新民同志冷枪杀敌的照片，随后我也来到了射击台。

射击台距离敌军阵地只有150公尺左右，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走进射击台时，他正双手托枪向对面的敌人瞄准。就在这时，嚓啦一声，我按了照相机的快门，他也扣动了步枪的扳机。

“命中！”观察员向我们报告了战果。

一声枪响，刘新民同志的计划实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向他招手告别后，便沿着通往连部坑道的交通壕走去。

走出不远，可能是因为我隐蔽不慎，被敌人发现了目标，只听嗖嗖的炮弹出膛的尖叫声划空而来。顿时，在我的四周迸起了炮弹爆炸的火光。

一阵急促的炮弹袭击过后，我在昏迷中觉得身上沉甸甸的，好象压着什么东西似的。睁开眼睛一看，啊！原来是刘新民同志。

停了好几分钟，他才慢慢苏醒过来。还算侥幸，除了被炮弹炸开的石头打伤几处以外，并没有受重伤。我松了一口气。很快，观察员将他搀回了坑道。

事后我才知道，当他看到我遇险时，飞奔过来，一把将我拽倒壕下，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我。可以肯定，如果当时没有刘新民同志的保护，我在这次战地采访中就“光荣”了！

一个英雄，他的灵魂是多么的崇高，他的品质是多么的优良啊！他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战友，这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吗？

许多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湮灭，然而

刘新民同志的形象，却永远矗立在我的心中……

一口有弹痕的锅

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是怎样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呢？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口有弹痕的锅。

这是1954年“清明”节的一天，我来到停战后留在“军事分界线”北缘，守卫和平大门的一个志愿军连队。

早饭以后，大家抬着自制的花圈，大都上山给战友们扫墓去了。三班班长明道坤告诉我说：他们准备去给重新安家的“阿妈尼”（朝鲜话：妈妈）送锅去。并建议我也跟随他们一同前往。我欣然答应了。

原来，这个班在战斗的空隙，从被美国飞机轰炸后的废墟上，捡回一口有弹孔的朝鲜民族式的铁锅。历经几次换防，一直保存到停战。这些日子，他们听说后方的朝鲜老大娘回来安家了，班里作了决定：把锅补好，给阿妈尼送回去。班长还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他修补、擦拭这口铁锅时，新战士小段掏出平时积蓄的五元津贴费，要班长给阿妈尼买口新的。明道坤说：你买的新锅怎么能代替这口有弹痕的旧锅呢？小段以为这仅仅是让原物归主。老战士们又问他：“你知道这口锅是谁的子弹给射穿的，是谁毁灭了朝鲜人民的和平生活？”虽然小段刚入伍，仍肯定地回答：“美国侵略兵！”接着，老同志又问：“是谁把这口锅修好，再送回阿妈尼手里，让她们重过战后安生日子？”小段高兴地咧起大嘴笑了。

我听完班长的这段话，深为我们祖国有这样知理明义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送锅是班长明道坤、新战士小段（他的名字我一直叫不来）

和我一同去的。这天早上，山谷里晨雾如烟，布谷鸟声声啼叫。我们踏着战时抢修的小公路，不大功夫便走出了山地。在一片小平原上，老人、妇女和儿童们，自由地走来走去。几年未从见到的和平景象，梦幻般地展现在眼前。

在一座青石打基，黄泥抹墙的小平房边，我们停住了脚步。就在这时，一位约摸五十岁上下的朝鲜老大爷，背着半袋粮食走来。他见我们有的携着铁锅，有的背着相机，不要再问也就猜个大概。于是，便用似通非通的汉话说：

“志愿军同志，你们……对，我也是来慰问烈士家属的。这……就是崔大嫂的家。也是中国同志帮她建的。走，我们一同……”

阿妈尼是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访问中知道，她曾有过两个爱子：长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年代，牺牲在金日成所部的长白山麓；次子是朝鲜人民军的中尉，1950年秋，在汉城附近的仁川守备战中以身殉国。她的儿媳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孙女，也在美军登陆后被炸死了……

说到这里，崔妈妈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紧闭着嘴，再也不言语了。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再安慰阿妈尼。她擦去泪花，叹口气说：“孩子们啊，当妈妈的都是这样；我不只是为自己两个儿子流泪，更为牺牲在我们朝鲜国土上的中国儿女难过！不，我这是为有你们这些好孩子，把两国人民的感情连得这么紧，流的喜泪啊！”

这时，一直没开口的朝鲜老大爷，向我们介绍了阿妈尼的事迹。他说：自从志愿军来到朝鲜，她一直在后方医院看护伤员。有一次，一位重伤的战士，被卡在喉咙里的粘痰憋得喘不出气，喂不进水，眼看生命要出危险。在这紧要关头，是她用嘴吸出了伤员的痰块，救活了志愿军同志。她还经常给伤员献血，在许多

中国战士的血管里，也流过这位朝鲜妈妈输送的热血。

当我们用敬佩的语言感谢这位阿妈尼时，她说：“这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吗！”

“妈妈，”我们同时这样喊着，“您老人家现在还有什么困难？”

她说：“政府对军烈属照顾得很好。如今，你们又把战火摧毁的铁锅修好，亲手给我送上门来，真比亲生儿女想得还要周到啊……”

小段见班长把那口有弹痕的锅交给了阿妈尼，心里总感到不够踏实。他捅捅班长，又把五块钱掏出来了。阿妈尼不解其意，明道坤随即把出发前向我讲的故事，给阿妈尼说了一遍。阿妈尼听后，抿着嘴笑了，她说：“还是你大哥哥说得对，这口锅不是用钱能买到的……将来，朝鲜修起博物馆，我还要献给国家，教



育后代。”

临走，我要给阿妈尼和战士们拍照合影，崔妈妈说：“不用啦，现在美国豺狼还门外，你们赶快回去，以后把守卫和平大门的相片捎给我，当妈妈的就放心了。”

遵照阿妈尼的嘱咐，新战士小段站岗巡逻特别积极。我也不负老人的期望，就在班长明道坤带领小段，配合人民军战友一同放哨时，我给拍了这个“镜头”（见图）。相信他们一定会送给阿妈尼的。

和平的眼睛

来到上甘岭，这座著名的英雄阵地已经浸沉在茫茫的暮色中了。我站在山顶上，迎着徐徐晚风休息，就象溶化在浓雾里的水珠似地轻松。

带路的战士把我引进一个地下室模样的小房间。这里四壁全是用碗口粗的木柱排立起来的，房门接连着坑道口，相当隐蔽。这就是前沿观察所。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监视敌方动静，没有发觉我们进来。带路的战士走到一个正伏在潜望镜上工作的同志身后，喊道：“宋先群副班长！”

宋先群转过脸来，看到我这不速之客，赶紧站起来说：“请到寝室里坐吧。我们只顾观察外面的动静，没……”

我望着他那腼腆的表情，望着他那双挂满红丝的眼球，想起昨天团政委向我讲过的“和平的眼睛”。

寝室里，战士们还没有睡，正围着用美军钢盔制成的火盆聊天。一见我进来，大伙都站起来了，很有礼貌地让座位、倒开水。当他们发现我带有照相器材的时候，屋子里马上活跃起来。

在朝鲜战场，在勇士们中间，摄影记者历来是鼓舞斗志的

人；作战的时候如此，停战后也是这样。大概他们知道了我的来意，还没等我询问，在座的战士就说话了：“同志，我们副班长宋先群立了二等功了，给他照一片吧。”

我笑了，说：“师党委给你们这个观察所命名为‘和平的眼睛’，这是集体荣誉，应该照观察所才对呀！”

战士们高兴着拍手。半晌，有个大耳朵的战士说道：“这份光荣是俺副班长带领大家创造的，照观察所应当在宋先群值班的时候才好。”

“这还用说。”坐在我身旁的一个“小鬼”也发言了：“宋副班长对俺新同志，就跟亲哥哥爱护小弟弟一样，我刚来的那会儿，对观察器材一窍不通，他不分白天黑夜把着手教。他还说：‘潜望镜是祖国的财产，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可是，他自己却没这样做……”

“怎么？”我忙问。

“他呀，要求别人和要求自己不一样：宋先群同志爱护自己的眼睛不如爱护器材重要。冬天冷，他怕镜子冻坏，亲手给潜望镜做了棉衣；夏天雨多，他怕镜子生锈，天天擦拭，如今镜子还和新的一样。可是他自己的眼睛呢，由于冷风吹，太阳蒸，熬夜……早就布满了红丝，有时肿得象个桃，也顾不上去医治。自从班长复了员，没有他，观察所的任务哇，够呛！”“小鬼”象连珠炮一般讲了这么多。最后他好象问我：“这样的好同志，难道不能上一上祖国的画报？”

我为英雄照相多年，很少遇到这样认真负责的推荐。我更觉得战士们可爱，也感到肩上小小照相机份量越来越重。

大家正谈论着，宋先群同志换班回来了。他见“大耳朵”为我安排了睡处，自己也就寝了。“小鬼”给副班长用药水点眼。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宋先群的眼睛确实红得厉害。便说：“你的眼睛是监视敌人的武器，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潜望镜，希望

你很好地保护
才是。”

他听了我的话，沉默一阵说：“这有什么，人家黄继光身负重伤还能扑向敌堡枪眼，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我们熬点眼又算得了什



么！祖国人民不分昼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回国参加，在这里好好看住敌人，也等于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大楼加砖添瓦……

夜深了，宋先群同志发自肺腑的语言，不时在我耳畔回响。好象我又来到三年前炮火迷漫的上甘岭坑道，心情无法平静，使我想到许许多多，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上午吃完早饭，宋先群和他的小战上去换班了，我按照同志们的意愿，拍下了这张历史性的“镜头”。也和所有老战士一样，重游了我曾经在战斗时住过的几条坑道。

战友们一再留我多住几天，但有发稿任务。他们象送贵宾一样送我。刚踏上归途，便听到不远的南方传来阵阵沉重的炮声，隐隐地还能听见飞机、坦克的马达声。显然，又是敌人在搞联合兵种进攻演习。

听到这令人愤怒的声音，我们停住了脚步。“大耳朵”用手打起眼罩儿，朝南方俯视片刻说：“美国鬼子的坦克进入非军事区南缘了！”

“怎么，敌人违反停战协定了？”我惊讶地问。

战士们冷笑着说：“这在前沿阵地并不是新鲜事；帝国主义侵略者，本性不会改变。”

啊，难怪宋先群的眼睛熬红了！我用钦佩的目光凝视着战友，许久不忍离去。

本文作者，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部摄影记者。县级待遇离休老干部。

秦皇岛度夏

胡海如

1988年暑假，呼和浩特铁路局组织中、小学老年教师到秦皇岛度夏以示关怀。喜占顺口溜三首，志所见所感。

“避暑庄”

东游秦皇岛，
下榻“避暑庄”。
翠色染衣绿，
山花扑鼻香。
蝉奏迎宾曲，
泉吟敬师章。
清风望碧树，
喜看蜂蝶忙。

登山海关城楼

老龙头上观大海，
又登“天下第一关”。
千山竞秀看龙舞，
万岭争幽锁云烟。

雄关内外风光好，
海滨上下瓜果甜。
神州大地皆锦绣，
台湾回归把景添。

北戴河海滨

极目远眺襟怀宽，
碣石沧海碧连天。
点点渔舟撒捕网，
密密游人击浪尖，
老人余勇犹自有，
少年豪情岂等闲？
躬逢盛世心神悦，
陌生对面笑逐颜。

塞外文豪——荣祥

狄生云

荣祥世居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村，姓云硕布氏，排行老四，字耀宸。早年笔名塞翁，晚年自号大青山人等。蒙古族，出生于1894年农历十月廿八日，1978年1月19日病逝，享年84岁。人称“塞北文豪”。

一、求学

荣祥孩提时期记忆力就极强。六岁时即入本村私塾启蒙，十二岁到归化城杨家巫李景沆私人学馆学习，旋即转入土默特旗第一小学堂、土默特高等小学堂就读，当时聪明伶俐，即以诗文见长。除学习规定课程外，以诵读《诗经》、《左传》、唐宋人诗歌为重点，练习平仄、四声和三字、四字对仗，为以后作诗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0年，荣祥转入归绥中学生预备班，次年入归绥中学堂丙班学习，并被推选为班长。

武昌起义的动人消息，使人们欢欣鼓舞，兴高彩烈；但也使当时的归绥政局动荡不安，因为阎锡山意欲攻取归绥。时道台衙门无理提出要占用学堂教育基金白银五万两。筹建治安维持会。学堂师生获悉，群情激愤，一致反对。荣祥自告奋勇，起草呈文。义正词严，说理透彻，慑服了将军衙门，未敢动用分毫。

民国元年冬，归绥学监、革命党西北总指挥王定坪组建国民

党归绥支部时，作为蒙古族进步青年的荣祥被荐为该支部文书股股长，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王在办学同时，兼任《归绥日报》社长。荣祥发挥所长，积极投稿，除写一些即兴诗文外，曾发表连载小说《天国革命记》，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为素材，巧妙安排，写成孙悟空在天国发动革命，推翻玉皇大帝统治的神话故事。故事一发，颇受人们青睐，但更遭到清朝的遗老遗少们的反对。消息传到其父耳里，其父怕招事惹非，出面阻止。而其文自然中断，但却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

1913年，不学无术的教师李笑天和董伟然，教学过程中每露马脚，多次被学生驳问而无言对答，学生郭勋尤甚。校方竟以“不守校规”为由，将郭开除。此事发生后，学生议论纷纷而不平，进而攻击校方的错误作法。荣祥慷慨重义，热情帮助同学，被当作闹学潮的主要人物。于是以“鼓动同学闹学潮”为由，被开除学籍而告别中学生活。

这一年秋，血气方刚的荣祥辗转到了北京，意欲求学深造，不期错过招生日期，但结识了京城“浣花书局”的牛宝璋先生。牛对其年青好学，深表钦佩，遂以所需书籍借之阅读，用毕归还，不可破费购买而许诺。荣祥得此赞助，遂能博览群书，深求研讨。日久甚熟，牛又介绍其与河北故城王荫南先生订半师半友之交。王系当时国务卿徐世昌的家塾教师，学识渊博。荣祥得益非浅。

1914年春，荣祥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政法专门学校法律本科。攻读之暇，继续汉学、诗赋的学习与写作，经常以“塞翁”之笔名撰写诗文在北京多种报刊上发表，从此蜚声文坛。缘此而得与遍及江南、华北等地的文坛诸名人广为结识，互为补益。

特别是1915年秋，土默特旗闲散勋爵辅国公包一锋赴京履行公务，荣祥代撰一文呈递，当即被报馆记者抄录，次日披露报

端，深得人们赞许。后经人介绍，被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的嫡裔姚叔节接纳为学生，攻习古文。这对于荣祥后来的诗文写作，奠定了更深厚的功底，同时加深了他汉语文学的造诣，扩大了学术领域的视野。

1916年秋，荣祥参加全国高等法官的文场考试。报考者7000人，仅录取500人，荣祥为文宏丽而敏速，交卷第一，名列第八。次年冬，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精心钻研、锲而不舍的荣祥，结束了北京四年的求学生活，以优异成绩毕业。

二、参政

1918年春，荣祥返回归绥。时归绥道尹周登泉组织“吟边诗社”，常于报刊赋诗唱和。一日，报上登出征约诗稿题目：一为“过苏武祠”，七律，限二萧韵；二是“吊明妃墓”，七律，限三者韵；三曰“九边第一泉歌”，限柏梁合体。要求怀古咏今兼收并蓄。数天过后，应征者寥寥无几。荣祥乃诗兴大发，欣然命笔，作三诗见于当时报端，且名列第一。此后遂成为其社主要成员。

时值绥远被列为山西省议会第二届会议之第十选区，筹办选举省议员事宜，荣祥积极拥护共和体制，赞成民主主义革命，投身于国家的宪政运动，乃被推为候选人。七月，当选为山西省议会第二届议员，此为荣祥由学生而入仕途之始。

此后，屡往太原出席例会，故又与山西文人名士多有交往，尤以诗文见长者为多。并曾多次在阎锡山所设“洗心社”发表演说，博得当地人士的好评。在晋绥统治者中也逐渐享有盛名。

初入仕途，当然朝气蓬勃，颇有为桑梓干一番事业的抱负。就在荣祥当议员的1920年，绥远都统蔡成勋受伊盟准格尔旗东协理那森达赖之贿，允准准格尔旗地面种植大烟以广财源。荣祥本着为了人民，联合本籍五名议员，呈辞国务院。几经周折，取得

胜利。此举对镇慑绥远政局的歪风邪气起了一定作用。

1921年，荣祥被聘任为垦务督办公署秘书兼筹饷局议员。此项工作较轻闲，故更有空读书论文著文，仍不失学人本色。

1923年春，被绥远学务局聘请任第二科科长，旋即着手创办师范学校、兼任该校国文教员。次年赴萨拉齐县城任土默特旗清源局（即秘书局）局长，在公务之余，着手校订古书多本。

1925年秋，荣祥以绥远特别区蒙旗国民代表的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代表会议，此后在京逗留多时。

直奉战争结束后，国民军驻防绥远，后奉晋联合驱走国民军，占领归绥。此时，荣祥进入军界，随满泰任晋军骑兵第五师中校参谋长之职。不久，奉晋决裂，晋军大败。满泰之师被扩编为奉系所属三十一军，仍驻包头，荣祥改任绥西镇守使署少将参谋长。

1927年9月，随绥远护印都统满泰入都统署，主管政务厅事。不到一年，满泰调任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为效力乡邦，遂请改任土默特旗总管公署之秘书长，恭敬桑梓。

三、修志

退出军界，当上秘书长，公务之余，荣祥又有充足时间能和诸友谈诗论文，潜心文史，精审考证，溯源探本。1930年拣留有手稿的诗词，在众友人的帮助下，辑《瑞芝堂诗钞》付梓，共印五百册。由郭象汲、张玉成、安兆麟、孟继春等先生为之作序。但荣祥所作诗词，多系即兴之作，留稿甚少，故所辑不是所作总数的十分之一。

由于他的深厚的汉学基础，且精于诗词，被当时誉为塞北文豪而蜚声内蒙古大草原。

1931年初，荣祥以土默特旗驻蒙藏委员会代表的身份赴南京任职。不到半年，听到绥远修志著史，为乡里大计，毅然返回。

同郭象汲筹建绥远通志馆，编修《绥远通志稿》。七月初开始筹备，八月间正式建馆办公。此后六年来，荣祥一直任编纂主任。

编写《通志稿》真是困难万千：一要重新认真学习；二要反复详细调查；三要亲手辛勤编纂；四要细心校对稿本。荣、郭二人分兵把口，各自负责若干卷的修辑任务，加强了编纂工作。

二年的集中采访，积累了一大批素材；同时也查阅了许多史志书稿，辑录了数量可观的史料。这为编纂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近四年的辛勤笔耕，终于在1936年冬完成初稿。

其间，荣祥兼任过蒙边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特别是1934年满泰病故，南京国民政府改总管公署为旗政府，任荣祥为旗政府总管。公务尤忙，每日必分上、下午分赴两处办公，一面处理土旗公务，一面到通志馆上班。据当时在通志馆工作过的赵国鼎先生讲：“郭荣二人在里外屋办公，有时工作了半天，两人竟连一句话都顾不得说。”

荣祥除在编撰方面总其成外，还负责亲自撰写历史沿革、稽古考证方面的文章。辛勤的不倦笔耕，一百二十册的《绥远通志稿》终于脱颖而出。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火，很快由津京燃烧到绥远，人各自危，何谈刊印，故被搁置下来。

四、抗日

“七·七”事变后的那年10月，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归绥。日本侵略者为推行其“满蒙政策”，在归绥公开设置特务机关；德王打着蒙古自治旗号，极力为日帝效劳。荣祥坚决拒绝了日伪的多次拉拢和诱惑，毅然离开故乡——土默特旗，辗转到了伊克昭盟，参加到了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战的洪流里，进行抗日斗争。

第二年，国民党在陕北榆林设立蒙旗宣慰使公署，荣祥任公署秘书长。宣慰使一直未到职，一切公务均由荣祥主持。主要工作是在伊盟各旗进行救国宣传，安抚策反，联络抗日等。此外，

更加发愤博览文史，考证典籍，并多次发表诗作，广为流传。

此间，在伊克昭盟和榆林等地，荣祥曾多次与邓宝珊、高双城、赵通儒、高岗、王震等国共两党负责人频频交往。特别是王震同志，多次赠予他延安出版的各种新书，并按期从延安给其转递《解放日报》，使荣祥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同年5月，荣祥出任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汉口会议期间，受蒋介石单独接见。北返时，荣祥有意路经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会见。这是荣祥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事后，荣祥说道：“共产党人的热情使我受了极深的感动。”

是年冬，荣祥担任蒙古抗日游击军第三军区司令部中将司令。

次年初，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曾约他洽谈抗日问题。

1942年底，荣祥赴重庆出席边疆教育会议，路经延安小住几天，谒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等同志，受到热情接待。使其更清楚了共产党的伟大。

五、起义

抗战胜利前夕，荣祥任蒙旗宣慰使。胜利后，回归绥任土默特旗总管。次年，兼任绥远省政府委员。同时积极组织抗日蒙旗庆祝胜利还乡请愿代表团，到南京进行自治活动，联合旅京蒙古族人士，要求南京政府实践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抗战胜利后，“允许边疆各民族实行自治”的承诺，但未能如愿。

其时，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迎战，全面内战爆发。二、三年间，国民党溃不成军，不堪一击；共产党、解放军节节胜利。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荣祥团结蒙旗人士，即和许多志士

名人成立和平促进会，周旋于呼和浩特军政军民之间，力主和谈，支持董其武将军的起义行动。后参加了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在起义通电上签名。使绥远省完全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荣祥本人也真正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

同年底，荣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年3月，土默特旗人民政府成立，荣祥出任旗长。

1954年，荣祥出任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兼市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这时，他目睹了国家百废俱兴的景象，特别是党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力，他深为感动，发表了不少诗文著作，激情满怀地歌颂了共产党，歌颂了新中国，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六、校志

1957年，荣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改任内蒙古文史馆馆长。此后，着手编写《包头市简志·疆域和建置沿革》篇。

六十年代，集中精力校勘《绥远通志稿》。

现《通志稿》的第一、二两卷讲得是疆域，这正是荣祥老先生数年终日伏案审阅校改、增益减损、修订撰写而成的。第一卷叙述疆域的历史沿革，分为省的疆域沿革、县局的疆域沿革和盟旗的疆域沿革等三部分，各自单独成册；第二卷是省、县、旗疆域现状。在文字方面，不是仅仅摘录史籍，而是以他对疆域史地的深湛研究，充分进行了发挥，并且根据史书旁证博引，详细地进行了论述。卷后附有“绥远省历代疆域沿革表”，读后使人一目了然。

荣祥勤奋读书一生，著作甚多。其荦荦大端者，除上述外，

还有《蒙古族起源问题浅探》、《呼和浩特历史沿革》、《包头市修志》初稿等。

1961年9月，内蒙古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终于摘掉了荣祥的右派分子帽子。

晚年自号“大青山人”，发愤著书立说，撰有《大青山人自序稿》，可惜仅成其半而与世长辞。

在其病逝后的1980年8月，内蒙古党委统战部作出了《关于改正荣祥右派问题的批复》，给荣祥彻底恢复了名誉。次年将其生前所著《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铅印成书，内部发行。

荣祥的一生，虽出身于满清王朝时期的蒙古族官僚家庭，历经清王朝末年，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各个不同阶段，沉浮于宦途，但清正廉洁，勤奋自励，爱国爱乡，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坚持正确立场，确实难能可贵；尤其是多年勤奋学习，坚持上进，著有多种堪称有水平、有创见之作，当称之“塞外文豪”而无愧。



马海德同志在昆区

李士昌

马海德同志出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1933年从美国来华，参加中国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他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曾任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会长、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62年，马海德同志以中央卫生部顾问、医学专家的身份，亲率国家性病防治工作队来我区远郊哈业胡同公社（当时属昆区管辖）梅力更一带，对蒙古族牧民进行性病治疗后的复查防治工作。

包头市副市长云世英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热情接待了马海德一行。市公安局派给一名警卫，由市卫生局副局长潘秉恒同志和我陪同，并从市里抽调了几十名技术行政人员一同前往牧区。在当地公社领导的热情支持下，我们一同住在梅力更大庙里，昼夜进行复查医治工作。四十来天的牧区生活，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特别是马海德同志朴实、乐观、平易近人、积极热忱、高度负责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他同工作队的几位大夫在路边的一个小屋子里谈话，无意中看到远处走来一位蒙古族妇女，当即认定这位妇女患有二期性病。经检查，果然不错。惊讶之中，给这位妇女进行了医治。

平时，他总喜欢人们称他“马大夫”、“老马同志”，总以为大夫是他的本职，是他至高无上的光荣职责。

哈业胡同公社有个蒙古族牧民得知他是外国籍转入中国籍人时，几次热情地邀请他到家中作客。盛情难却，终于在一天傍晚到了那位牧民家，主人特别高兴。经过简短的寒暄，按照当地蒙古族牧民的风俗习惯，宾主盘腿大坐，以奶茶、手抓羊肉为主餐，频频敬让，开怀畅饮，吃喝不停，热闹非常。过后，马海德说：“奶茶太香了，手抓肉太好吃了，我吃得太多太饱了，肚子都疼了。”逗得大家都笑了。

马海德的记忆力是很强的。在梅力更召开第一次有关负责人会议时，他一一问过姓名，并用外语记到日记本上。过了些日子当第二次开会时，他就能依次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大家却非常钦佩。

梅力更工作结束后，他又去伊盟工作了一个多月，回来后在市里整理材料，分析比较了解到的情况，总结了工作队的工作情况。

在他回北京前，包头市委、市政府在市交际处六楼大会议室专门为他组织了欢送会，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这次欢送会，我也参加了，当他看见了我时，亲切地握住我的手，和我交谈起来，当时我很受感动。

马海德同志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特写此文，以表哀思。

老 一 团 抗 战 人 物

高志昌

“老一团”是民国初年组织起来的一支以土默特旗蒙古族农牧民为主的地方骑兵武装。此后，这支部队虽多次改编，频繁调防，但由于民族感、自强心，加之当时军队中的封建隶属关系，这班人马形成了一个“团伙”，总是聚而不散，人们便习惯地称其为“老一团”。

1912年，直系军阀张绍曾任绥远都统时，驻防归化（今呼和浩特）的土默特陆军第二营势力日逐壮大，强烈反对他提取土默特旗税收，并经常与他的混成营官兵发生摩擦。是年冬，张绍曾设计解散了这支部队。当时，驻守归化城北武川县的该营第三连连长玉禄（字鼎臣，蒙族，土默特旗毕克齐人）闻讯即率部起义。但不久，该部又被张绍曾收编为绥远骑兵游击队。后又被改编为绥远第三路警备队，总队部驻防包头城（今包头市东河区），除负责防城外，还担负城外剿匪任务。

玉禄任总队长，满泰（字子舒，蒙族，土默特旗鄂尔格逊村人）任总队副。警备队下设四个中队（相当于连队），队长分别为：多才、李根车、松友三、荣松亭。参谋长荣祥，副官长耿子荣，军需官瑞辑五。

1926年初，总队长玉禄在剿匪中阵亡，老一团由绥远第三路警备队扩编为“绥远骑兵第一旅”，原总队副满泰任旅长。部队由原来的三百多人发展到八百多人。旅下设两个团，一团团长李根

车，连长分别是晋梅五、松友三、荣松亭；二团团长耿子荣，连长有耿子义、广林、广义。这支骑兵部队主要负责绥西一带的治安任务。

1930年，阎锡山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调任满泰为乌伊两盟十三旗边区司令兼土默特旗总管，所部被缩编为一个团，李根车任团长。编余官兵借口粮饷困难而予以解散。团部驻包头城。防区范围主要是：包头、五原、临河、托县、萨县、东胜、武川、固阳等地。

李根车（1888——1959），字子麟，蒙族，土默特毕克齐人。少时家贫，未能上学。十几岁便给人家撵牛放马、扛长工，受尽折磨。为了糊口度日便到老一团当兵。他身材高大，长脸型，练得一手好枪法，作战勇猛顽强，临危而不惧，有时竟甩去上衣，袒露胸怀与敌拼杀。在他的率领下，该团官兵大都英勇、强悍，能骑善射，战斗力颇强。素有“胆头子、枪头子”之称。什么“鞍马落轿”、“蹬里藏身”样样精熟。即使在飞马急驰中，将缰绳挂在马鞍上，双手举枪射击命中率也很高。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由于各派军阀混战不休，土匪也乘机纷纷组织“独立队”横行乡里。为了剿灭为非作歹的土匪，老一团往来驰骋，奋勇作战。内蒙西部地区的股匪，每闻“老一团”三字，就如惊弓之鸟，不打自溃。因李根车率部剿匪保境有功，包头地方由商会出面，授予李根车一块刻有“保境安民”的匾额。这块匾当时挂在李根车住家包头九长城巷八号院的大门上方。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我东北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千里江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也在潜滋暗长。东北军民组织抗日武装同日军开展了英勇的斗

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率部抗日。

全国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绥远地区也掀起了抵制日货，断绝对日经济的抗日浪潮。当时，包头民众抗日救国激情也十分高涨。省立二中的学生自治会创办了《炸弹》刊物。温泽普、席俊（席子杰）、罗温如（罗增玉）等热血青年撰写抗日反蒋文章。这年11月上旬的一天，包头国民党党部在马王庙学校（即包头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大操场集会。会上，县党部委员韩仲明讲了话。会后，十多所学校的师生三千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与此同时，包头广恒西皮毛店经理董五三，复盛公钱行经理乔晋德等商界人士，还为东北义勇军马占山部捐献了白毡皮衣及钱财，并组织慰问团送往前线。各界的声援与支持活动，使驻防于包头的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教育的老一团广大官兵更为群情激奋，义愤填膺。

老一团的多数官兵来自土默特旗贫苦农牧民，经受了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之苦，有较强的反抗意识；老一团的官兵大都为土默特蒙古族同乡，多有亲戚关系，官兵团结，上下协调。民族感、自强心把这支部队紧紧系在一起。又由于阶级出身与民族因素，使他们较早地接触了土默特蒙古族革命者，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蒙古族共产党员就注重在这支部队中做教育争取工作。包头工委书记李裕智，绥远工委书记吉雅泰同志于1925年就通过拉亲戚、交朋友等方式，结识了老一团中的部分进步官兵，有意识地开展民族工作，启发其革命觉悟。1928年，经吉雅泰介绍老一团排长李森（小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森同志以排长身份长期隐蔽于老一团中，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如王若飞、乌兰夫、吉雅泰、奎璧、贾力更、李森、吉合、刘仁、梁一鸣、佛鼎、赵诚、曾涌泉、勇夫、高布泽博、朱实夫、王逸伦等同志先后在包头地区开展工作，曾在老一团进步官兵的掩护下进行革命活动。有的还

任职挂衔，隐蔽于老一团中，长期坚持绥远西部地区的斗争。在一大批共产党人特别是蒙古族党员的教育影响下，老一团的官兵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十分仇恨，而对我党的革命活动却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资助。此后，老一团中的一批有识之士还走上了革命道路。仅1929年冬至1930年，由云泽（乌兰夫）、贾力更、佛鼎、奎璧、李森等同志分期带队先后选送进步官兵二十多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

1933年3月，热河失守。日军继而向察哈尔进犯。日本侵略者铁骑紧逼，民众抗日的呼声日甚。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也表现了极大的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驻守包头的老一团官兵纷纷请缨赴察北抗战。可是，这年老一团已被驻防包头的山西骑兵司令赵承绶缩编为晋绥骑兵独立营，营长李根车。实际上老一团当时仅有两个连（当时人们称之为“黑马队”）。一连长赵锡明（萨拉齐美岱召人），二连长卜子甲（呼和浩特市人）。缩编后的老一团被调防五原西槐木村驻守。不久，赵承绶调老一团到包头，为老一团新增两个连，编为赵承绶的第七团，共计五百余人，随赵部开赴察哈尔参加抗战。当时，总司令赵承绶在大同集结部队。在老一团出发的那天（约三月中旬），李根车团长号令全团人马在今东河区人民公园的空地上集合，李根车讲了话。主要内容是：我们支援东北军打日本军，保卫领土，夺回失地，吃点苦，受点罪，我们要挺得住！就是死了，也光荣。早已摩拳擦掌的老一团官兵表示：老汉打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有老汉在，我们什么也不怕！

在李根车团长的率领下，老一团从包头坐火车出发，经归绥、集宁、大同到张家口。后又改乘坐骑沿山路经丰宁县、围场县，星夜向多伦一带进发。约三月底，部队驻防于多伦县东南约五十里的滦河西岸二马山。此时，当地的老百姓大都转移于山里居住。老一团的官兵有的住在老乡的木板房里，有的则住在山上

的帐篷里。为了轻装上阵，官兵们并未驮运过多的行李衣物，仅穿一件白茬皮衣。察北坝上的夜晚，冷风阵阵，官兵们拾柴粪取暖。饿了，嚼几口干粮垫饥。当时，部队用骆驼驮米运面，根本没有蔬菜可吃，常常凑合着吃些二米稀饭。李团长对士兵们讲：我们不饿为原则，老百姓还不如咱们呢。这一带是旱田，加之兵荒马乱，蒙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白天，日军飞机经常狂轰乱炸，士兵与群众都有伤亡，老乡还给部队伤病员送汤送粥。老一团官兵严正以待，与敌周旋于喜峰口、赤峰口一带。半月余，日伪军占领了滦河一线，老一团掩护东北义勇军撤退到多伦城驻防。赵承绶司令部驻扎于“山西会馆”，老一团驻在“义和殿”。

四月末，日军小柳匀部千余人和李寿山、崔兴武等伪军近万人，大举进犯多伦。

多伦，原名多伦诺尔（蒙古语译音，意为七个湖泊），后人简称为“多伦”。多伦，位于滦河上游，内兴安岭之西口，是热（河）、察（哈尔）二省之孔道。民国二年，多伦县已是一个拥有十余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故有口外“小上海”之称。自然，多伦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扼守多伦的部队有：晋军赵承绶骑兵三千多人，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部两个军约二万余人，邓文部七千人，李忠义和刘震东部七千人，加之四十一军孙殿英等部，力量本不算薄弱，但粮草、弹药等给养奇缺，又无统一的指挥。

5月1日夜，日伪军突袭多伦城。老一团和赵承绶部主要任务是配合东北军夹击日伪军。日伪军动用飞机、大炮、坦克疯狂进攻，多伦城里炮弹飞炸，土石飞扬。赵承绶部车上的洋钱箱被炸落，日伪军纷乱抬箱取钱。大街上的拴马桩也被炸为几节。激战二个多小时后，孙殿英部与冯占海等部败退下来。老一团为赵承绶部的先遣队，奋勇反击日伪军。

老一团官兵单独作战能力很强，多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善于奇袭追击，即使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凭自身的“胆头子、枪头子”，加之精纯的马术刀技，亦能各自为阵，各自为战。这次战斗中，老一团二连连长卜子甲的一个班曾两次攻入城内，在班长云元世（蒙族，托县五申乡人，现年83岁）的带领下，全班战士从多伦南城门冲入城中，与日伪军展开巷战。后闻赵承绶已坐小车撤退，老一团官兵才撤出战斗，掩护赵部高级军官后撤。在突围时，巴三红等老一团战士阵亡于抗日疆场。

多伦城被日伪军占领了。老一团退到南壕堑、大营盘、乌兰大坝一带驻防一月余。六月初，老一团驻守于河北省庄北县西北之大青沟镇（现属尚义县管辖）。

大青沟镇当时是商都县东区所在地。大青沟镇是张家口至乌兰巴托台道必经之地，也是通往山西雁北及内蒙古商都、集宁的交通要道。这个察北的坝上山镇亦是一个兵家过往征战之地。

据当时任商都县第二区南书计乡乡长郝在杰（现河北省康保县忠义乡三顺元村，现年82岁）和商都县东区政府文书宋炳祥（现住河北省尚义县大清沟镇，现年86岁）两位老人回忆：六月初，赵承绶部共五个团的人马退到这里驻防。赵承绶司令部驻南壕堑（今尚义县所在地），一、三、五、七、九团，分别驻在元钱厂、大一带、南壕堑、大青沟镇、奎腾台。当时，人称“黑马队”的老一团属赵部第七团，团部开始驻在离大青沟镇不远的南海子村。二连连长卜子甲率队驻守在庄北县筛罕补拉，后来还收编了陈炳义部的一些散兵游勇。因那时大青沟镇被察哈尔省警卫军第二师师长胡文秀的人马占据。几天后，老一团团长李根车带领人马把胡部撵出大青沟镇，老一团官兵才进驻大青沟镇。团部设三胜泉酒厂。不几日，李根车打发排长李森（小才，蒙族，共产党员，原内蒙民委副主任，1988年去世）回包头接妻子崔秀珍（现住包头市东河区九长城巷）。李森与轿夫运来日夜兼程接崔

氏到大青沟镇。李根车同妻子住到老乡家里。团部每吃一顿顺口饭，李团长总要打发士兵送些给邻居。老一团的官兵从不扰民，也不向地方征要粮草，只是用现金到镇上的店铺里购买。每日操练，站岗放哨，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好评。

一天，李根车团长召集乡长、商店经理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近二十名在团部开会。郝在杰也去参加了会议。会上，李团长说：我们是山西骑兵第七团，奉中央军委命令，驻守庄北一线以阻挡日伪军继续推进，增援察东防地，支援攻打多伦，维持社会治安。从现在起，大青沟出了什么事都由我李根车负责，望乡亲们支持。并让乡长回去向老百姓讲讲国家形势，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伪军。

这时，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已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援，积极对日作战，七月收复了察北坝上多伦等四县。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冯玉祥将军于八月十四日被迫下野。八月下旬，赵承绶奉命率部撤出大青沟镇。

老一团开拔的那天上午，大青沟镇各界人士、村民聚集街头欢送。会上，区长刘仪亭讲了话：我们没有招待好。团长鞍马劳累、为国为民。战士们不辞劳累，风餐宿露，我们表示谢意。李根车团长端起一碗酒，一饮而尽。也表示：望同胞们团结努力，一致抗日。会后，李团长乘坐骡子轿车率队离开大青沟镇，经商都、集宁旋即返回包头。

1936年秋天，老一团在丰镇驻防。此时，傅作义决心解散这支经编编的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部队。于是，以该部不适应正规操练，沾染上鸦片嗜好为理由，协同赵承绶、王靖国部及宁夏的马鸿逵部，以调防整编为名，当老一团官兵行至大同孤山时，两面山头伏兵四起，用武力缴了老一团的械。枪刀归公，官兵发饷遣散。至此，二十余年戎马生涯的老一团被强行解散。

马占山将军轶事

易
磐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东北，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马占山领导的一支义勇军活跃在长白山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全国人民闻讯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声援。从此，马占山的威名几乎家喻户晓。后来，在华北一带又出了个冯占海，也带领军队举起抗日的旗帜，马、冯的事迹在内地广为流传，有人曾为他们写了一条上联：“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 山海关前龙虎将”，征求下联，但长期未得。

1949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占东北，在沈阳成立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后改为“剿总”），派杜聿明为司令长官，马占山为副司令长官。新官上任之际，报社记者纷往采访，见马占山着长袍马褂而十分不解。于是上前寒暄并发问：“今乃大喜之日，将军何以不着戎装以壮观瞻？”马占山苦笑了一声说：“诸位多有不知，我乃国军上将军衔，杜长官是中将，但他是司令长官，我是他的副手。我俩第一次见面，应该有个礼节。但若按军衔他比我低，应先向我敬礼，若按职务他却高于我，我应先向他敬礼，我琢磨这件事不好处理，所以我改换便衣，和杜长官见面时大家拱拱手，都能过得去，以免有失和气。”记者听后疑窦顿解，无不拍手称绝。

记者又问：“将军此次荣任国军高职，昔日将军所率抗日部队在剿共作战中定能大显身手，为国立功！”马占山哈哈一笑，连连摇头说：“诸君差矣，昔日我带领的一支抗日队伍，多年未得政府的半点支援，无法维持而不解自散，如果我再把这些游击战士集合起来，那不成了无编制的‘土匪’？我无力‘剿共’，国军就要来剿我了。”众人闻之无言以对。

解放初期，马占山在北京病逝，政府肯定了他抗日的功绩。

智勇双全的宋政委

郭体绪

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不禁想起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发扬顽强战斗精神，严惩顽敌的一次战斗情景。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冀中军区、献县游击大队政委兼大队长宋云波同志，是一位智勇兼备的指挥员。据说抗战前他是一位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教师。常读马列著作和孙子兵法，擅长游击战术。所以在冀中平原抗日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自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少胜多、屡挫顽敌。附近敌伪军听到献县游击大队，即惧怕三分。

笔者在原籍行医时曾目睹县大队的一次阻击战，真是名不虚传。

那是1939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县大队在卢官屯村小休整。宋政委借休整时叫我去给他诊病。此村南临老盐河，村西头有北洼向老盐河排水的南北向沟渠。敌伪据点在此村西南方十五里之外的富庄驿镇。大队岗哨重点设在村西头，瞭望西南方。宋政委患风湿病，当即给予阿司匹林内服药，还拟注射撒里沃碘，正要注射时，哨兵跑步来报告说，敌人先头骑兵已到张旺屯河北（距卢官屯西一华里），宋政委听完报告，立即手提驳克枪迅速奔向村西头，到达沟渠阵地指挥战斗。准备妥当后，敌人前队骑兵来到阵地前约30米，宋政委一声令下，我军步枪、轻机枪、手榴弹一齐射向

敌群。最前边的五个骑兵被击中落马，后边敌人背上的枪还没来得及拿下来，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射击吓得掉头向回溃逃。不到半小时结束战斗，打扫战场时毙敌五人、缴获枪五支、子弹数百发、马五匹。敌百余人掉头向西南方向跑去（据目击战斗的老乡说：敌有十余人被击伤用担架抬走）。这次漂亮的阻击战，我军大获全胜，无一人伤亡。

宋政委虽然打了胜仗，但警惕性很高，当即集合部队顺着渠道向北转移。笔者对宋政委说：和您一起转移到新驻地打针吧。宋政委说：“先吃药吧。你顺着老盐河向东走，部队人多目标大，行进速度快，你跟不上”。我照宋政委指示向东走，到了十五里之外的王官屯村表哥家。吃午饭时，听到张旺屯方向有枪声，此时距县大队转移后约两小时了，估计我军已到达20里之外。可能是敌人回据点后增加人力，又出来报复，虚张声势而已。

昆都仑河中桥

张清

位于昆都区仑钢铁大街西端的昆都仑河中桥，是城市规划要求中连结包钢厂区和市区而在昆都仑河上兴建的三座桥之一，此桥因居中而得名。

昆都仑河中桥于1956年5月21日开工兴建，由国家公路总局承担兴建任务，1957年建成，1958年秋季连降暴雨，山洪爆发，河水横溢。7月26日第一次洪水即漫过河面，使中桥受到严重威胁。8月7日第二次特大洪水以 $1,500\text{m}^3/\text{秒}$ 流量袭击包钢，昆都仑中桥遂被冲毁，只残留几个桥墩。傍昆都仑河西岸的4号，24号，81号街坊均漫水一尺余。

为了保证包钢工人上下班和材料的运输，洪水过后即开始筹划重建，于1959年建成通车，现桥长199.8米，9孔，桥面宽24米，其中车行道宽19米，人行道宽 $2.5\text{米}\times 2$ 。桥上部构造为装配式钢筋混凝土T形梁，下部为高桩承台。泄洪能力 $1,050\text{m}^3/\text{秒}$ 。我们今天看到的便是重建后的昆都仑河中桥。后又于1979年按抗震烈度八度的要求进行了加固处理。

昆都仑河中桥每天均有数百万职工通过它上下班，有数百辆运输汽车穿梭于大桥之上。

内科专家康子铮

阎充英〔蒙古族〕乌云

康子铮，是我市著名的医学专家、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四十多年来，他以精湛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数以万计的病人解除了病痛；他培育的医务人员遍布自治区各地，许多是医疗战线的骨干；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先后发表论文近五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为包头市和自治区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受到林巧稚称赞的好学生

1918年4月，康子铮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县。父亲康小民曾任国民党县长。父亲年轻时酷爱中医，珍藏无数中医典籍。在这样书香门第熏陶下，康子铮从小就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协和医学院预科）。美国人在华办的燕京大学，除极少数中国教师外，其余均为外籍教师。学生上课、回答问题、答卷及做实验报告全部使用英语。此外，还要求学生掌握日语和德语。由于康子铮在高中时英语基础较好，到大学毕业时，已能熟练地掌握英、日、德、俄四种语言，为他以后在医学上的发展和深造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外文基础。

1941年，康子铮准备参加进入协和医学院的考试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同时被日伪当局关闭，康子铮被转到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在这里，他得到全国许多著名医

学专家的教诲，医学理论学得全面、扎实。

日伪当局严密控制下的北大医学院，不准学生聚会，谈论政治，可康子铮和同学们暗暗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当时有位日语教授，是个反战分子，经常在学生中发表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满的见解，深受同学欢迎。康子铮有时也与同学们在暗中聚会，谈论日本侵略暴行和必败的命运。

康子铮父亲在日本侵入山西后，坚持民族气节，拒不为日伪效劳，宁愿在家闲居，家境生活十分困难，康子铮继续求学也发生问题。于是，他就利用假期，帮一些教授搞科研、查找资料，抄抄写写，挣点零用钱。他在大学期间，勤奋刻苦，成绩优秀，每年可获160元左右的奖学金，弥补了生活费用之不足。

1945年7月，康子铮在北京大学医疗系毕业后，留校任该院附属医院外科医师。在这里，康子铮一踏上医疗岗位，就受到了极严格的训练。他在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外科专家吴阶平等严师的指导下，不仅学到了精湛的医术，更主要的是学到了他们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一次，联合国援华医疗队有位世界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应邀到北大附属医院为一患巨大卵巢囊肿的病人做手术，林巧稚和吴阶平等当助手。一年轻医生负责手术前的消毒。按要求，应用酒精棉球从患者脐部一圈一圈往外擦，但这个医生擦着擦着往回擦了一下，林巧稚看了马上制止，提出严厉批评，并让其重做。当时在一旁见习的康子铮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林巧稚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又一次，林巧稚让几个见习医生轮流为一孕妇进行检查。轮到康子铮时，他听听胎心，摸摸胎位，觉得都正常，就是摸不到胎儿头，他心里一阵紧张：摸胎头，是很普通的诊断技术，如果连这也不会，不是太丢人了吗？于是他又仔细地摸了一遍，还是没有摸到。他不愿说假话，只得老实地承认：“林主任，我

摸不到胎头。”林巧稚笑了，她欣赏这个年轻人的独立诊断技术，更欣赏他诚实的品质。林巧稚用英语给康子铮打了一个good（好），然后对在场的人说：“这的确是个无脑儿，很典型的无脑儿。”这件事在《林巧稚传》里有详细记载。

从此，康子铮在临床实践中养成了一种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认真细心、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半年后，康子铮考入北平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身）医师进修班学习，之后到北京中和医院进修内科。

1946年10月，康子铮进修期满后，经北京中和医院院长钟惠兰教授推荐，他到唐山开滦煤矿总医院任医师。不久，因顾及家庭生计，回到原籍，在山西省立大同医院任内科医师、医务主任。

1948年2月，康子铮受聘到兰州医学院工作。他携带家眷前往兰州途经包头时，因交通中断，滞留在包头亲戚家中。当时包头医院院长刘国藻闻讯再三挽留，康子铮遂在包头定居下来，担任了绥远省立包头医院内科医师、医务主任。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医术献给了包头的城乡人民。

时时处处想着患者

那时的包头市医院，医务人员十分匮乏，有了这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医生，内、外、妇、儿全拿得起来，很快名声大噪，找他求医的人络绎不绝，门诊、出诊应接不暇，他坐着人力车几乎踏遍当时包头市区的大街小巷，成百上千个病人传颂着一个名字：“康子铮大夫”。

1949年9月19日，包头和平解放，医院回到人民手里，康子铮高超的医术得到真正献给人民的机会。他担任了包头市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和副院长。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的医院是个破烂摊子，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病房，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专科医

生。为了患者，康子铮克服种种困难，不论哪个科的病人他都看，不论哪个科的手术他都做。白天看不完，下班后还要出诊，包头老市区许多人家的门前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四十多年来，康子铮为数以十万计的病人解除了病痛，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他的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受到了广大患者的赞扬。包头市第一任市长郑天翔的夫人宋汀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几经治疗未收到明显效果，经康子铮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终于痊愈，至今未犯。1987年，郑天翔同志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再次回到包头，还专门找康子铮表示谢意并同他合影留念。

对待医疗科学，康子铮始终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从不在下级医生面前轻易下未经科学验证结论的意见，更不在病人和家属面前随意夸口。他给病人看病，不论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症，总是耐心听病情介绍，仔细地进行多方面的检查，从不马虎草率，就连一些看似与内科疾病无关的部位也要详细检查。对不治之症，他也要向家属讲清治疗方法和预后，想尽办法减轻病人的精神负担和痛苦。他常说，医生治病不同于检修机器，修不好可以重来；人是有感情的，患者找大夫总是满怀希望。做一名医务工作者要时时处处想着患者，做到耐心、热心、细心，态度冷漠，甚至粗暴，只会使病人精神沮丧，失去信心，病情加重。

一次，包头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给一位患者做手术，打开腹腔后，发现肠道全是血泡，由于诊断不清准备行脾切除术。参加会诊的康子铮仔细检查后，替患者着想，认为做脾切除是草率的，果断提出，立即给病人输血。按照他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痊愈了。以后，这位病人逢人就说，要不是康大夫，我早成个废人了。一患者腹痛难忍，往墙上撞，在市内两个医院治疗，都没有诊断清，后患者家属请康子铮会诊，他详细询

问病史，作全身性检查，发现系急性前列腺炎所致，对症治疗后病情很快好转。

对农民患者康子铮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知道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不容易，因此格外精心。1964年，康子铮赴郊区乌兰计巡回医疗三个月，诊治两千人次，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一次，土黑麻淖村有个中年妇女，患软骨病、心脏病多年，经多次治疗无效，病人极度衰竭，家人已准备后事。康子铮听到后，立即赶到她家，为病人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检查，找出病因，中西医结合，经多次精心治疗，竟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现在这个妇女已60多岁了，身体还较好，她永远忘不了使自己重生的好大夫，不断远道来看望自己的救命恩人。

康子铮对内科专业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对内分泌代谢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几年前，一汽车司机年仅15岁的独生子患严重癫痫病，经外地几家大医院医治未见好转，后来康子铮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好了他的病。现在这个孩子已结婚，再未犯病，父母感激万分，永远忘不了康子铮的恩情，逢人就说，不是康大夫看好了孩子的病，我们这一家就断子绝孙了！。

康子铮注意总结临床经验，随时搜集和积累第一手资料，不论工作多忙，一迁到特殊病例就把它记载下来，作为对青年医生进行业务学习的活教材。经过不断地总结提高，他相继发表论文近五十余篇，在他妻子、医师吴宝瑜的帮助下，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成《发热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和《内科疾病症状诊断》两部专著，分别在1977年和197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同行专家认为该书“编写别具特色”，“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精湛，论证合乎逻辑和实际，内容适用，对提高临床医师和医学生内科疾病鉴别诊断水平甚有裨益”。

热心培育医学人才

长期担任医院领导工作的康子铮深深体会到，要搞好防病治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必须有一支技术过硬的医疗护理队伍。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养。解放初期，医院护理人员奇缺，不能开展正常的工作，他在一无校舍、二无教师的情况下，倡导办起护训班，他在看病之余，兼任教师，共办三期护士班和一期药剂班，这里培养出的第一批护士，后来都成为包头市护理战线的骨干。

后来，虽然国家每年给医院分配来一些医科大学生，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58年5月，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康子铮思想也解放起来，包头工业基地建设飞速发展，人口猛增，医务人员严重不足，我们何不自己办所医学院培养医生呢？在包头市第三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康子铮同七名医务界代表联合发言，提出学习徐水县，在包头办一所医学院，培养高级医务人才，以适应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现在看来，论包头市当时的条件，办一所高等医学院校是有点“跃进”的味道，但是从中不也映衬出康子铮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为人民健康事业操心的一颗红心吗？包头市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建议，责成市卫生局研究提出具体方案。经过一段筹备，包头医学院于同年9月1日正式开学，实现了康子铮多年来的夙愿。他后来兼任医学院医疗系主任，亲自为学生讲授内科、传染病学。

多年来，康子铮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给学生讲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经常结合临床实践给同学们讲授一些常见病例，并把国内外医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及时向学生传播，同学们都非常爱听他的课。1964年，在教学观摩评比中，康子铮名列第一。他先后给包头医学院学生讲课约800学时，给各护校、业余医学院学生讲课约1000学时。

康子铮重视结合临床实践培养提高青年医师的医疗水平。一次，一值班青年医生接诊了一位从别的医院以重感冒转来的高烧昏迷病人，经康子铮会诊，确诊为急性脑膜炎，数小时后，病人死亡，许多医师对疾病的诊断提出疑问，后经尸体解剖证实了康子铮的诊断。通过这个病例，他不仅详细为青年医师讲解，以后还利用业务学习时间给全院医务人员做学术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急性脑膜炎的诊治。

长期以来，康子铮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但他从未间断过到各科查房，参加重大手术，在院内外会诊。为培养青年医生独立诊断疾病的能力，他在会诊时总是先认真听取下级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些青年医师结合临床实践写的论文请他提意见，他从不推辞，总是耐心帮助，提出修改意见。

他还十分注重通过学术交流来提高广大医务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从1959年至1985年间，他先后担任包头市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包头分会副会长、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在此期间，他经常组织全市医务人员对疑难病症进行学术交流，定期举办讲座，其中他自己做的学术报告就达百余次，有力地促进了我市医疗科学事业的发展。

虚心学习中医，促进中西医结合

康子铮重视祖国传统医学，积极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数十年来，他倾心研究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多种疾病，取得显著成果。早在1953年，他就积极向医院领导建议开设中医科，并高薪聘请著名的老中医常松坡、钱问亭、白子炯等来院诊病。身为副院长的康子铮带头拜老中医钱问亭、安定山为师，虚心求教，共同探索对黑热病、消化性溃疡、神经衰弱、类风湿关节炎、痛经、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等15种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办法，

用科学理论加以总结，先后撰写多篇论文，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

康子铮为了向中医学习，放下副院长架子，不耻下问，亲自到中医门诊，给老中医当徒弟，细心琢磨他们的药方和诊脉经验。对他的这种学习方法，有人大为不解，说他真有失身份。对此，康子铮却不以为然，还把写好的300多个药方拿到钱问亭那里去求教。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康子铮已成为我市一位中西兼通的专家。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附属医院的许多西医也兼学中医，现在包头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好些中年骨干医生，都能用中西医结合方法给病人治病。

1987年，一附院妇产科接收了一妊娠五个月的妇女，诊断为妊娠中毒症，病人呕吐不止，不能进食，住院医生采取多种办法治疗都无效，病人出现严重的酸中毒，后来他想到老院长康子铮，请来给病人会诊，开了两副和胃安胎药，病人服后立即止吐，三付过后即能吃饭，一周后完全恢复正常。使这个医生对中医的疗效有了新认识。

可贵的“春蚕”精神

从1952年到1986年，康子铮一直担任着医院领导和许多社会工作，他是包头市一至七届人大代表、内蒙五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包头市一至五届政协委员、常委、五届政协副主席。他为医院建设呕心沥血，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停奔波。1953年，他刚担任包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就向当时医院主要领导同志提出医院应分科室、增加病床和医疗器械等建议。后来，他又找到包头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提出扩建医院，在当时南门外（现二院院址）另设门诊部的建议。包头市委书记高锦明、李质等同志采纳他的建议，并拨款购置了一些外科手术器械、X光机和化验室等仪器设备。

1956年，随着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的全面铺开，市委、市

人民政府迁往昆区，决定在昆区新建一所现代化医院——包头市第一医院（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前身）。康子铮又受命担起了该院筹备组的重担，他日夜谋划，周密设计，为使医院的设备、管理符合现代化医院的要求，他带队到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一、六人民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学习取经，拟定了一整套医院管理的规章制度，为医院后来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年动乱期间，康子铮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没有逃脱灾难的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嫌疑”等莫须有罪名，受尽折磨，左眼被打伤后失明。在长达四年多的隔离监禁、劳动改造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医院广大医务人员和许多患者同情康子铮的遭遇，关心着他的命运。在他被剥夺了看病的权利，从事打扫走廊、厕所等体力劳动的时候，仍有许多患者暗暗找他求医，一些医务人员关心着他的健康，悄悄给他送药，鼓励他心胸开阔些，坚持就是胜利。1972年恢复工作后，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带着伤残的身体，一面从事临床医疗和教学，一面担负着繁重的医院领导工作，并和其他领导一起，着手恢复和重新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在十年浩劫中被搞乱的医疗秩序，使医院重新迈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1981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从此，他更加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做则，生活艰苦朴素，最近手术后到北京做化疗，坚持不坐软卧，说能给公家省就省点吧！

1984年3月，机构改革中，66岁的康子铮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退而不休，始终没有放下听诊器，经常参加会诊，随叫随到，一切为了患者。康子铮患有多种疾病，颈部肿瘤已连续接受了数次手术，体力消耗很大，身体十分虚弱，即使这样，前去找他看病的人还几乎每天不断，他从不拒绝。就在他手术后躺在病床上，还要给别人诊病开药方。去年，棉纺厂一职工的孩子患

尿崩症，久治不愈，家里十分着急，到京津等地四处求医，花了近千元钱也未诊断清，经别人介绍，找到康子铮，当时他刚动手术不久在家休息，见小孩病得那样重，不顾自己尚未恢复的身体，仔细认真地进行了检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坚持治疗半年后，病人终于痊愈，活蹦乱跳地上了中学。一位老同志患肺炎合并急性心衰住院，病情十分危急，值班医生先后两次在半夜请康子铮会诊，他二话没说，立即起身赴医院，在他精心治疗下，这位老同志转危为安。

康子铮说，我年岁已高，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要争取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表达自己晚年的心境，以春蚕精神自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燃尽光始无，
鞠躬尽瘁为人民，报答党恩三春辉。

成吉思汗陵

苍穹野阔，在鄂尔多斯中部甘得利草原上，耸立着一座辉煌的宫殿，这就是成吉思汗陵。呼啸过草原，震撼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静默默的长眠在这里。七百年前，北方大漠，南北部族林立，混战不休，智慧的铁木真，云雀呼唤的“成吉思”，以铁一般意志，把草原各部统一在“蒙古”旗帜下，中国和世界有了“蒙古”这个“勇士”（蒙古意为勇士）。

几十匹战马拉着的帐车，跨过万水千山、平原沃野，而你选中鄂尔多斯做你的长眠之处，比之你走过的地方，这里并不甚美，也不富庶，你是喜爱这里的静僻么？要不，你是喜爱鄂尔多斯对你唱不完的深沉的颂歌？

药理学教授石山

朱企泰 阎充英

包头医学院药理学教授石山，1922年生于山东省潍县，十三岁开始在华东药房学徒，从“抓药”步入社会。1946年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翌年转到山东大学医学院。在以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为发端的反内战浪涛推动下，他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经友人、同学钟剑秉、刘冠文等指引，1948年毅然离开当时山东大学所在的国统区青岛，到山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入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后合并为山东医学院），1951年提前毕业留校，任药理教研室助教。1957年，石山同志积极响应党关于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号召，率先报名，与其妻、内科医师刘磊携子女到内蒙古医学院工作。1963年晋升为药理讲师，1974年调包头医学院（当时为“医专”）药理教研室任教，1978年晋升为药理学副教授，1983年晋升教授。1956年，石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民盟包头市委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六届政协委员，现任民盟包头市委顾问。

（一）

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石山在平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默默无闻地贡献着他的心血和智慧，他对这种单调而枯燥的生活心满意足，从中体会到无限乐趣。然而，一场大革命文化的浩劫从天而降，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把他推入另一个他所不熟

悉的世界，使他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不寻常的历程。

那是1971年10月，他这个搞了二十年医学基础课教学的讲师，突然接到通知，贯彻“六·二六”指示，要他携全家去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暖泉公社卫生院工作，并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不理解和沮丧的通知。石山想起十五年前，他在山东医学院时，听到地处边疆、文化比较落后的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起第一所高等医药院校需要教师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他兴冲冲地报了名，并向组织一再表示，要去就全家去！从地区讲，济南远胜呼和浩特，从工作环境讲，山东医学院比内蒙古医学院要强得多，但他还是毅然告别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千里迢迢来到塞外青城；他的血是沸腾的，情绪是亢奋的。然而，今天他没有那份激情。尽管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引起了一阵狂热的欢呼，可他的服从并不是从心眼里拥护，只是慑于“文化大革命”激烈而紧张的“革命气氛”，不得不挈妇将雏来到这个吃水都困难的“暖泉”。

从搞基础医学教学到从事临床治疗，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虽然军代表一再说：“你没看过病也比赤脚医生懂得多”，可是石山知道，横在他面前的困难绝不是几句空洞的革命口号可以解决的。然而，石山毕竟是“石山”，他巍巍峨峨，不惧任何风风雨雨的吹打，在那里，他就要为那里的人民挡狂飚、阻洪流，为人民造福。他一边看书学习，一边为患者看病，调动起从十三岁就开始积累的各种医药知识，内外妇儿各科均上。他接过生，当过麻醉师，甚至还给骡子做过脐疝。他忘我地工作，无论白天黑夜，也不管山高路远，沟沟坎坎，只要病人需要，随叫随到，从不计较个人劳累得失。一次，一位横位子宫破裂的产妇送到卫生院。患者因失血过多，血压已量不到。按医疗设备条件，这里根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但是要送县医院抢救，近百里的路显然来不及了。公社党委很重视这件事，决定就地抢救。手术小组、主

刀人选都有了，就是没有麻醉师。麻醉是手术的关键，稍一不慎，患者就下不了手术台。看看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只有石山在理论上给学生讲过麻醉课。他二话没说，硬着头皮承担了任务。为做好这次麻醉，他认真设计了几种方案，制定了万一出纰漏的补救措施。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精力高度集中，心里一直绷着根弦。等到手术结束，他浑身湿透，衣服都可攥出水。

另一件事也使石山终身难忘。一个还不到百天的女婴，因患支气管肺炎合并心衰来卫生院就医。石山把所有可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孩子仍呼吸困难，颜面发绀，张口喘息。孩子母亲急得团团转，啜泣不止。作为一名医生，石山感到心情沉重。他想起自己一参加革命进的白求恩医学院。白求恩是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抢救八路军伤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自己现在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不能解除病儿痛苦，怎么对得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老乡亲？他守在孩子身边仔细观察，突然发现孩子的小鼻孔堆满分泌物，又由于高烧，分泌物干结，连一点缝隙都没有。他大悟了。他用棉花蘸着生理盐水湿润干痂，慢慢把鼻塞取出，再用纸捻刺激鼻孔，患儿连打几个喷嚏，喷出许多分泌物，呼吸道很快通畅了。颜面绀紫等病状消失了，孩子睁开了眼。母亲流下热泪，攥着石山的手说：“你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石山思绪万千。他深深感到，做一个人民的医生，不仅医术要好，更重要的是要有为病人着想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细致观察病情，抓住疾病发生发展的主要矛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由于他的高度负责精神，使很多患者恢复了健康。为此，他被评为清水河县先进工作者，出席了乌盟“六·二六”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石山同志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他说：我不认为把一个从事多年医学基础课教学的教师下放到基层搞临床治疗是正确的。但是既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让你放下粉笔和课本，拿起听诊器

和手术刀，为农民治病，我就要好好工作。在清水河的三年我并没有虚度岁月。我踏踏实实工作，收获是很大的。临床实践使我对药理学教学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提高。它使我在以后的授课中，内容更丰富、更生动，理论与实际结合得更紧密，提高了教学效果。不计个人得失，处处考虑着教学和为人民解除病痛，这就是石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纯洁而高尚的心灵。

(二)

石山作为教师，大半生的精力都留在了讲台上。他从1951年站在这块神圣地方起，就从未有过贰心。他总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甚至对那呛人口鼻的粉笔屑都有着说不出的亲切。当他听到今天社会上新民谚说“傻得象博士，穷得象教授”时，只付之苦涩的一笑；因为确实在“知识贬值”的情势下，他这个建国前参加工作的“教授”，基本工资只有一百七十元。这菲薄的待遇，不用说跟国外的同类人员无法相比，就是同一些摆摊设点凭手艺吃饭和经商的个体户比，收入也低得可怜。但是，他没有计较这些。他懂得教师肩上责任之重、任务之大是很难用金钱计算的。他经常给学生们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医生是人民生命的保卫者。如果在校期间对医学基本理论学得不深不透，不精不通，毕业后在复杂的疾病面前，就会无所措手足，甚至贻误病人生命。机器不转动还可以修复，人死了是无法复生的。可见医生责任之重，更可见培养医生的教师责任之重。这怎么能用个人待遇厚薄斤斤计较呢？

1974年，上级决定调石山到当时包头医学专科学校任教。他在清水河县医院的一些学生都不愿让他离开清水河，怕他再挨整。他们说，现在的大学是工农兵上、管、改。管谁、改谁一清二楚，您何必去自投罗网？石山对此并非没有考虑。可是，多年培养树立起来的教师责任心使他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他说：我热爱教师职业，工农兵学员大都是劳动人民子弟，他们会通情达

理的。

到包头医专后第一堂课给石山的印象十分不好：教室里满地乱纸，黑板没擦，上课铃响了十几分钟，还里里拉拉有人来，课堂上象放蜂“嗡嗡”声不停。面对此情此景，他心凉了。当时正是“读书无用”、交白卷光荣的时候，看学生不看学习好坏，而是看手上有没有膘子，看批资产阶级批得如何。对这种现象，管还是不管？课后石山思想上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如果在学校就这样读书，将来怎么给人治病？他回忆起在清水河“下放”时的一件事：供销社一位采购员的妻子患风湿性心脏病合并心衰找石山求治。他用地高辛等药物进行治疗，不久他已能做饭喂猪。后来这位采购员不知听了哪个赤脚医生的话，说“心得安”好，可以使心脏得到安宁。于是他自作主张用了该药。结果他妻子心脏确实“安宁”了，永远停止了跳动。原来“心得安”的药理作用是使心脏收缩力减弱，心率减慢。患有潜在性心衰和充血性心衰的人绝对禁用。这种不懂药理的一半醋医生怎么会不坏事？石山猛然惊醒：对学医的青年不能这样放任自流，否则现在误人子弟，将来就会危害人民。他找来班干部开会，用自己二十多年的教学和临床实践的体会，向大家讲医生的崇高职责和对医科大学生的特殊要求，并向学生们提出“遵守纪律，讲究卫生，文明礼貌，刻苦学习”等方面的要求。他这种对学生负责的积极态度，深深感动了同学，得到大多数同学的赞同，课堂秩序和纪律改变了。十几年来，他对所教过的班级都这样要求，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石山对自己比对学生要求更严格。在讲大课时，他要求学生当堂理解率要达到100%，吸收率要达到80%，几十年来，他始终坚持这一“目标管理”，而且基本实现了。这固然有学生方面努力学习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教师要认真备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石山讲课时重点突出，难点深入，疑点清楚，把药理学的科

学性、系统性、逻辑性、条理性，寓于生动活泼的讲授之中。比如在讲麻醉药物的使用时，他结合临床经验告诉学生，患者一上手术台，白布单一罩，麻醉师看到的只是头部、眼睛和测量的血压。这就是麻醉药应当讲授的重点。同学们说，石老师的课讲活了。可他们怎么知道，为了讲好每堂课，石老师在灯下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写下多少整整齐齐的讲稿，为提高教学效果，达到他自己提出的使同学理解率达到100%的要求，他绞尽脑汁，凝结着他毕生的心血和经验。由于他教学效果显著，曾多次被评为学校和内蒙古自治区高教系统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1989年又荣获包头医学院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石山教授近年来培养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工作，也取得可喜成果，他除注意对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外，特别注意培养研究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选题到查阅文献、实验设计、开题报告、实验操作中所遇难题的分析解决，实验结果的统计处理，文章撰写等全过程，均培养研究生自己动手独立完成，从而充分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以及研究的浓厚兴趣。他所指导的84级研究生在设计BT87—2型实验性动脉血栓形成测定仪中就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论文具有较高水平，分别在中国药理学报等杂志发表后，有英、美、德、法、波、捷、委内瑞拉等七国十五位学者来函索取资料。石山1988年10月出席了自治区卫生厅召开的研究生工作会议并做了大会发言。

(三)

石山在多年教学工作中体会到，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对提高师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因此，他在1974年重返教学岗位后，即积极开展科研工作，结合自己事业，筹建心血管研究室。当时还是“文革”后期，在社会上和学校哪有科研的位置？要搞科研，真是困难重重，要房没房，要人

没人，没有设备仪器，可说是一无所有。石山和研究室的同志毫不气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处奔波，向兄弟单位求援。三中全会后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学校和有关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他们的研究室终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起一个较现代化的研究室。没有实验仪器，他们从291医院借到一台临床淘汰的心电图机，开始了最初的抗心肌缺血和抗心律失常的动物实验。没有实验室，就借用学生无课的实验室，作为临时研究用，有时一年需搬迁两次，也从未中止过实验研究工作。他们还修旧利废，解决实验急需的仪器，从附属医院借到一台因缺配件而不能使用的压力换能器和放大器，经修复后，用于血压和左室功能的测定。从中蒙医研究所借用一台电磁流量计，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正体动物左室功能和血液动力学的实验研究。为了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他们还自行设计制作成功BT87—2型实验型动脉血栓形成测定仪，该仪器设计合理，性能稳定，可重复性强，能自动计时报警，不仅减轻了科研人员的脑力劳动，而且减少了试验中的误差。该仪器属国内首创，受到同行好评。

他们研究室所主攻的心血管疾病，是人类生命的大敌。在世界上每年死于它的人数远远超过癌症，列第一位。为了治服人类这一凶恶敌人，石山领导的心血管研究室，除研讨西药外，更立足于我国实际，对中蒙药进行多方面探索，希图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

“活血化瘀”是中医的重要理论。在探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中，许多医药学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认为，心血管疾病的病因之一是由于血液受阻滞而变为瘀血造成的，必须除去瘀血才能使血脉流畅。沿着这条道路，人们探讨了丹参及其主要方剂。石山没有嚼这块别人嚼过的馍。他根据自己多年来对中西医结合的药理学研究，决心在“益气温阳”、“回阳救逆”上下功夫，设计了“附子及其主要方剂药理学研究”课题。但是，当他的初步

研究成果在华北地区心血管太原会议上宣布时，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他们说：“附子的研究日本人已经搞清楚，我国有关部门也承认了日方的成果，再搞是没有出路的。”

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令人瞩目的。可是，是不是这项研究就穷尽了呢？不，一位深知科研规律的学者说，不要怕红灯拦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么！鲁迅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石山带领研究室的同志决心沿着满布荆棘的小路坚定地走下去。1980年，这项取得多方面成果的研究，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由此而形成的论文“中药附子对麻醉犬急性心肌缺血、左室功能和血液动力学的影响”，为《中医杂志》所选用，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

石山教授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注意从实际出发，注意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把蒙药研究置于天平的重要一侧。他先后主持研究了“赞旦古日班”、蒙药沙棘及其有效成份总黄酮、蒙医经典古方“扎冲”、“桑帕拉”等重点研究课题。“赞旦古日班”是蒙药中的一个古老配方，在临床上用它治疗心血管疾患，有较好疗效。“可是，这个方剂中什么药在起主要作用呢？”自治区中蒙医研究所的医生提出了这个课题。石山同志立即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终于确定了方剂中“广枣”所含“总黄酮”为其主要有效成分。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注意，“广枣总黄酮抗实验性心律失常作用”论文在《中国药理学报》发表后，受到美、日、法、联邦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埃及和巴西等国学者注意，他们纷纷来函索取论文。

石山教授说：走自己的路，研究中蒙药就是我们的方向。这并非虚妄之言。只要查阅他发表在《中医杂志》、《中国药理学报》、《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药理学通报》等刊物上的论文，石山同志的话就得到了完全印证。他领导研究的课题，无不反映了他的这一志向，无不闪烁着独创性的光辉。

石山同志还十分注意使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为教学服务。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药厂完成了“去甲基乌药碱”的研究，为该药投产进一步提供了科学依据。他与中蒙医研究所和中蒙医院合作，对中蒙医院试制的止咳药复方复治片进行了大量实验，确定了其有效成分之一为蒙药“沙棘”，从而使这种对慢性气管炎有很好疗效的药物取得了科学依据。这项成果使他和中蒙医院共同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科研成果三等奖。石山在自治区专业会议上说：“我们的研究室面向实际，面向全区，决心以自己的辛勤工作，为开创内蒙古医药卫生事业的新局面而尽一份力量！”

现在，石山教授领导的研究室已经拥有近三十万元的仪器设备。他的研究从单一学科研究发展到血液动力学、血液流变学、心肌细胞培养学等多学科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科研到教学，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一位曾经在这里工作的副研究员说：“过去讲课全靠书本，现在讲课可以联系自己搞的实验，自己爱讲，学生爱听。这是石教授给我们铺的路！”

由于他在科研工作的艰苦劳动，曾多次参加区内外各种学术会议。1986年参加了首届国际“活血化瘀”学术讨论会，作了大会发言。1987年，他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传统医药和现代药理学讨论会。今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心血管药理研究与新药开发新思路研讨会，他又被邀请作大会发言。他担任着包头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药学会理事、全国心血管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委员。他在药理教学和科研中已经走过了近四十个年头。若是从他十三岁和药打交道算起，至今则已逾半个世纪。多年来，他和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他正和有关单位的同志一道承担着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攻关项目——防治急性心肌梗塞的实验药理学研究和蒙药萨木普勒珠尔布草治疗脑血栓形成的实验药理学研究，我们希望石教授的研究项目获得成功。

著名国画家白铭

王德恭

白铭，是我市高级工艺美术设计师，是载入名册的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白铭自1949年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毕业从事美术工作，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我作为白老师的弟子，仅就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及本人的见解，简要地回顾一下白老师四十年来的艺术生涯。

白铭，字旌堂，1926年出生于包头。考其家史，一百多年前，曾祖父带着祖父弟兄四人由山西崞县逃荒来到塞外古镇——萨拉齐，居住多年。后因祖父晚年经商，又迁居包头。祖父爱读四书五经，特别对博古丹青有较高水平。祖母擅长民间剪纸。白老师从小跟祖父母一起生活，受到这个具有艺术素养家庭的熏陶，自幼酷爱绘画，七、八岁时就筠管常操，临摹字画。祖父很喜欢他，每天都亲自指点和督促他作画、习字，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刻苦上进，这为他走上艺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前后，祖父祖母相继去世，白铭跟父母亲回到萨拉齐县生活。当时，家庭生活极端困难，但他仍然坚持自学绘画。十五岁那年，母亲去世，他又到了包头外祖母家寄居。在包头中学读书四年，因生活贫困而中途辍学，到包头清真小学当了教员。

19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在民族文化渊藪的古都，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艺术思想。经

过三年时间的刻苦钻研，他系统地学习了绘画理论，充实了花鸟画的创作经验。尤其是著名画家齐白石、陈半丁、于非闇等先生在美院任教，白铭遵循所诲，获益匪浅。

1949年，白铭从京华美院毕业，到包头一中任美术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怀着热爱新生活的炽热情感，开始了美术教育生涯。他是一位倾心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培养接班人的艺术园丁。他对学生充满热情而又严格要求，就连学生研墨时，怎样坐身、持墨，用多大气力，速度如何，都要求极严。对学生们拿去的画，总是耐心而幽默地指出缺点、毛病。他既教书又教人，坚持“画如其人，画品即人品”的观点。他态度和蔼谦逊，衣着整洁朴素，举止文明礼貌，学习刻苦认真，从来不以画家自居，在学生面前事事以身作则，为其表率。

白老师不仅在校任教具有高度责任感，从事社会美术活动，也具有献身精神。任教三十多年来，除“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年代被迫停顿外，他通过文化馆、文化站、文化宫等阵地，开办美术专业训练班及工艺美术学习班数十期，毕业学员数千人。还举办专题学术讲座数百次。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美术宣传干部和美术创作人才。现在，他的学生在包头的就有百人之多。还有不少学生分赴祖国各地，成为美术工作的骨干，有的已在绘画上成绩卓著。如中国工艺重彩学会秘书长贾克德，山西大同艺术陶瓷厂设计师王彤，我市美术协会秘书长郭才等等。称得上桃李满天下。

白老师是一位在工笔花鸟画创作上继承和发扬了优秀传统的高手。他的花鸟画，以描绘花卉、禽鸟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力见长，体现欣欣向荣的生气，从而给人以健康的艺术感受。他热爱自然界的花鸟鱼虫，养成了观察和写生的习惯。他记取白石老人的教诲，常常采来自己心爱的花朵，用镊子夹花瓣，一片一片地

数，细心观看花冠、花蕊、花萼等各部位的生长规律；并常到各处观赏花在风晴雨露之中的变化特点。观察禽鸟、鱼虫，同样是细致入微，留恋忘返。1983年秋，我比较认真地看了白老师创作工笔重彩画《花鱼图》。为了画好鱼，他在画桌上的水盂里养着十几尾鱼，每日细心观察；并多次跑到黄河边、鱼市场和养鱼之家观看鱼的生活习性和形神动态。数月之后，一花鱼图条幅诞生了，画中几朵睡莲、几片荷叶和那几丛水藻都活色生香别饶情趣；花藻下几尾鲤鱼摇头摆尾，活灵活现，跃然欲出。整幅画的构思独具匠心，画面意境深远，花鱼情景交融，形神皆到，生气盎然，使人如入画境。他作画，源于生活，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其手法确有独到之处。

在他创作的花鸟画中，有丰姿绰约的牡丹，有凌风傲雪的梅花，有玉树临风的玉兰，有婆娑起舞的孔雀……，画中没有炫奇弄巧的惊人之笔，而是充满了活泼的生机，洋溢着健康向上又真挚动人的感情。1954年，全国首届国画展中他的《和平之春》，画的是和平鸽与牡丹花，花须鸟毳细入毫芒，巧密精思以繁取胜。1955年，全国青年画展中他的《牡丹》，以精巧的构思，严谨的布局，鲜明的色彩，别致而耐人寻味的意境展示出牡丹繁荣昌盛，富丽堂皇的神韵，被评为二等奖。还有，1955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国画展，展出他的《玉兰枝头唱太平》；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把他的《天地皆春》作为礼品赠送给蒙古人民共和国；1958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展出他的《白孔雀》；1960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画展，展出他的《曼舞迎春》；1961年，白铭等四人画展，在内蒙古地区轮回展出他的数十幅国画作品；1964年，华北五省年画版画展，在北京等地轮回展出他的《牧鸭图》、《玉树临风》；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画展，展出他的《六鹤图》；1982年，在北京举办的草原风貌专题画展，展出他的《芦塘月色》，以及1962年国际巡

回画展，在英国、加纳、古巴、阿尔巴尼亚等国展出了他的《白梅》等等，一批为各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花鸟画作品，都显示出作者优美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表现手法。

在色彩的应用上，他善用重彩，但喜欢协调、素雅。他画了许多白牡丹、白梅花、白孔雀、白鸚鵡，在白宣纸上巧妙地利用正反两面着白粉的方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白艳夺目的花鸟形象，与画上其他绚烂多彩的颜色形成鲜明对比，但又和谐统一，清雅隽丽，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建国以来，除全国和自治区的画展都有白老师的作品外，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和内蒙古等全国较大的出版社历年来先后出版他的作品有《红杏屏》、《天鹅图》、《荷塘白鹭》、《四季花鸟屏》、《毫畫春华图》、《长春图》、《白头双凄》、《硕果屏》、《牡丹屏》、《玉兰》、《孔雀》、《雄鸡》、《白带红叶》、《翠竹白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一百多件。在全国和地方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和零星画片以及画册、挂历上采用的作品更多。1952年，他还编印了《绘画入门》画册。1958年，内蒙古博物馆收藏他的国画二幅；1982年，他的《芦塘月色》被国家收藏。白老师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绘画传统，为丰富祖国的绘画宝库，呕心沥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内蒙古颇负盛名的画家。

白老师的水墨写意画和书法也有独到之处。他的水墨写意，体现出清高雅逸的意境和情趣，得意之笔集中表现在梅兰竹菊上，其作品尤以竹、梅为最多。他画竹以墨华水润的画笔画出竹子的湿润和清翠感，旋以淡墨轻轻几笔勾画出后边的竹子为衬托，使前后层次分明，再用焦墨在一两处似不经意的一提，这一点睛之笔，令整幅画活跃起来。他画梅，老干横斜，新枝挺秀，冲寒怒放，一种清高的意趣溢于纸上。其水墨写意画具有遒劲、高雅的艺术特色。

在书法上，由于他从小跟着祖父写大字，并临过柳公权、欧阳询等名人字帖；在美院时，又受过几位书法名流的指点，对书法颇有研究，书体以行、草为主。他的字，研习各体博采旁揉，谨严挺劲味道醇厚，表现出他那独特的个性。包头市的书法展览和报纸上常有他的书法作品。人们在包头、固阳等地的街头也常能看到他写的匾额，并一望而知这是“白体”。可见其书法独具一格。

白老师的艺术是多方面的，他在攻中国画的同时，不顾那种把工艺美术排斥在艺术殿堂之外的偏见，还热心于工艺美术的探索和创造，为古老的传统工艺同现代的重大课题的结合作出努力。1959年，他应邀参加了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196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设计了《天鹅图》巨幅工艺挂毯，在内蒙厅绘制了大幅壁画《大兴安岭》，还为人民大会堂设计了沙发套、花盆套、茶几、地毯和窗帘等。显示出他在工艺美术创作上的才华。

为了填补包头市工艺美术生产上的空白，发展包头市的工艺美术事业，1972年，在市二轻局的领导下，他积极参与筹办包头市工艺美术厂，并担任了副厂长。任副厂长后，他不但兢兢业业地领导全厂的工艺生产，而且不辞劳苦地为工厂培养了一批工艺美术人才。

为促进生产，提高信誉，支援出口，多创外汇，白老师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还夜以继日地亲自设计了大量的工艺美术品。1972年，他应邀赴广州交易会现场表演设计了八种羽毛画作品，被日本国选中七种，进行了订购。同年，他设计的羽毛画作品《双喜》、《芍药》，在波兰参加了世界博览会；木镶嵌作品《玉兰》，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工艺美术展览会。1978年，他设计的牛角雕刻、骨雕、羽毛画、木雕、园雕台屏等七种作品，参加了全国第二届工艺美术展览会。其中，骨雕《碧潭映

锦》被选中，载入国家工艺美术史册。其余设计出口的雕刻、羽毛立体浮雕、陶瓷、搪瓷及瓷用花纸等工艺美术作品有数百件，这些工艺品，既玲珑剔透堂皇富丽，又清新隽永格调不俗，十分令人喜爱，国内外观众和用户无不交口称赞，白老师因此而被誉为“蒙古包里飞出的金凤凰”。

白老师在任教期间，历年被评为优秀教师；调到工业系统后，又连续被评为工交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劳模、标兵，多次出席包头市和自治区的先代会，受到表彰。他曾任包头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副经理、总工艺师、包头市广告艺术公司经理。他现任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陶瓷学会理事长、内蒙古文联常委、包头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参加了全国第三届、第四届文代会，被列入“当代画家”载入名录。

1980年，白老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生命的获得使他的艺术生命焕发了青春，他怀着一颗忠实于党的赤胆红心，更加忘我地工作着。他表示，“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一技之长，倾囊而出，全部贡献给社会主义。”

1985年，他又重返教育战线，到包头师专任教。

1988年，白铭进京举行个人画展，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大事。一年前，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时，乌兰夫副委员长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呼和浩特接见了白铭。应乌老的提议，白老师带着150多幅国画作品进京，在民族文化宫——这象征着民族团结、进步的高大殿堂里向首都人民展示了一位画家的情怀。

5月19日早晨，阳光明媚，中央、内蒙和包头的党政领导及著名艺术家排列于乌老为画展题写的匾额前。包头文联副主席于富主持了开幕式，乌杰市长致开幕词，乌兰夫副委员长为开幕式剪彩——内蒙古第一位进京个人国画展的序幕拉开了。

这次展出的131件作品，多为白老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力作。每幅作品都精心构思，落笔严谨，刻意求真，极尽物象之美，表现出一个生机盎然的葳蕤世界。这是画家四十多年来挥笔赋彩，孜孜追求，凝聚了美好心灵的无私奉献。

全国声名显赫的艺术大家刘开渠、叶浅予、周怀民、俞致贞、徐北汀、刘力上、陈法正等对白铭的国画给以高度评价，称他的作品“笔墨精妙，艺坛生光”。5月19日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白铭画展实况，称他是“为生活造美的花神”。首都几十家新闻单位作了报道。画展结束后，民族文化宫收藏了《白天鹅》等六幅作品，并向白铭签发了国家收藏证书。作为绘画精品收藏于国家流芳百世的艺术殿堂，这是画家毕生心血的追求，在这至高无尚的荣誉面前，画家自身的价值得到了承认和肯定。

画家白铭的艺术生涯同新中国同龄，他的发展道路与新中国同步。时代造就了画家，画家描绘了时代。所以人们说，画家为生活创造了美。

作者：王德恭 包头市志史干部

中年书法家麻天佑

王新洲 高志昌

麻天佑，民盟盟员，内蒙古书法家分会会员、包头市书协副主席。笔名关中布衣、华山村农、彭祖、绿野、鱼凡等。1938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朝邑县农民家庭。1947年就读于乡塾“朝邑县私立养正学校”。从此每天练习写大仿。幼年时期的麻天佑对写字课即有浓厚兴趣。他勤练不息，其作业经常受到老师表扬。1951年入朝邑县南寨子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入西安六中，1956年入大荔中学上高中。1959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俄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麻天佑一直没有间断过写大仿。在中学，他是学生会宣传委员，在大学当过团支部书记。老师们欣赏他的字，课余时间经常为学校和社会筹办展览。

1963年，大专毕业的麻天佑毅然报名到“祖国边疆去。”他一路风尘，来到草原钢城，分配到包头市第二中学任教。仍潜心研习书法艺术。1975年，调到市展览办公室，他的书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今，麻天佑先生在包头市职工大学专门教授书法课程。

麻先生曾说，寇遐是他的启蒙老师。1948年，麻天佑在家乡读书时，其兄从西安带回“西北绥靖公署”高级顾问、著名书法家寇遐的一幅隶书中堂。麻天佑手摹神追，反复临写。

真正恋上书法，还是他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学习期间，麻天佑多次徜徉在碑林之中，他有时凝神注视柳公权的《玄秘塔》，有时手抚智永和尚的《圣教序》，回到宿舍更是刻意临

习，孜孜以求。节假日，他就教于西安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孙蔚如（曾任陕西省长，书法家）、张风会（曾任副省长，书法家）、寇遐（政协副主席）。麻天佑不耻下问，还拜访卖字为生的岳松济老先生。在良师益友的教诲下，他向书法艺术的道路大步迈进。

麻天佑在包二中工作期间，经常参加包头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书法小组活动。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从事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转机。1964年国庆节，麻天佑坐在二宫讲座厅里，和书法爱好者们一起等待阎汝勤老师来讲书法课。主持人陈忠走进来对麻天佑说：“今天阎老师不来了，我看你给大家讲讲吧。”麻天佑连连摆手，站起来表示歉意。但禁不住同志们热情推举，他说：“我实在讲不了，就让我来写字吧，请大家多多指点。”一拿起笔，他就进入了艺术境界，“挥斥方遒”、“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等古朴苍劲的隶书一一挥就。后来第二文化宫在节假日又让麻天佑表演了多次，均受群众好评。他步上了包头市的书法殿堂，自成一家。

在书法艺术上，麻天佑继承传统，敢于创新。他以法度严谨、风神潇洒，疏朗开阔、道婉俊逸的风格著称。他的篆、隶、楷、行、草诸体功力都较深，尤以隶书、行书见长。

他的隶书吸收了颜真卿的开阔豪宕，刚劲雄厚，大气磅礴的神髓，又巧妙地避免了臃肿堆积的流俗。而他的行书多见于行中带草，错落有致，千姿百态，正可谓“长短肥瘦各有志”、好似“行云流水，美女撒花”。他善于鉴选古帖，吸收精华，又能出古洗古，向新的境界迈进。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潜心钻研中，形成了自己的书法理论。他认为：书法不同于应用的文字，两者有联系有区别，而书法是把文字的线条变成了有力的势的东西，或者是给文字书写带上了强烈的艺术色彩。通过点划线条的搭配表现字的艺术造型，显示

各种动态神情与风韵气势。特别是通过书家强烈的感情流动及丰富的想象，在观赏者的心灵中产生一个意想浮游的境界，给人以凝神观赏、余味回甘的艺术享受。

麻天佑先生还强调，在临习古人碑帖的过程中，要博观广询，才能事半功倍。

“篔土积山高，滴泉归海大”。在麻先生平素的勤奋耕耘下，收获也是很大的。仅三中全会以来，麻天佑先生发表在各地报刊的书作就达五十多幅，论文十几篇，宣传报道他的文章十多次。他还参加许多各类书展。

1965年8月，文化部组织赴日本的书画展览，麻天佑作品有五幅入选。他的书作也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

1972年，北京举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书画展览，麻天佑的书作再次入选。

1982年，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团市委组织书画义卖活动，麻先生的书作义卖达千元以上，他除取少许润笔费外，其余约八百余元都捐献给市少儿基金会。

1982年，市文联、包头师范、包头医学院、包铁分局联合举办了麻天佑、胡海如、李云超书法联展。

麻天佑的书作，流传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台湾等各地。还曾为日本东京教授高木秀树写过隶书条幅。1983年高木秀树的同学出任访华代表团团长，当他还未来包时，就由北京来电，指名要麻天佑先生的书法，麻先生欣然馈赠三幅，为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1984年春节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麻先生手书对联一幅，发行于区内外。1985年，他的作品参加中国书协等单位举办的边陲五省区书法联展，获得好评。1985年6月15日，麻先生隶书《龟虽寿》在面向全国发行的《书法报》刊载。

1986年，他的行为作品被山东烟台美术博物馆收藏。

1987年6月，云南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举办书画义卖活动，麻先生一下就献出四幅作品。8月，民盟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举办盟员书画展，他的六幅作品参展。

1988年2月，他应邀参加山东淄博龙年书法笔会暨中国书画家联谊会；5月，他的作品荣获内蒙古四盟三市“松鹤杯”书法大赛一等奖。此外他还为几家园林书写碑文，如1986年陶渊明诞辰1600年，湖南桃园县搞大型纪念活动，麻天佑先生书写了《桃花源记》全文，用以勒石，最近又为包头市烈士陵园书写碑文等。

麻先生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写匾作书。他的学生遍及包头乃至全国各地。其中唐金诚、刘恒军、郭呈祥三人都曾从师于麻先生。1988年6月，包头市东河区公园路小学11岁的杨力同学荣获“全国少年书法大赛”第三名，他的书作曾去日本展出，他就是麻天佑先生的“贴身徒弟”。在包头市书坛很有影响的中青年书家赵守仁、郭旗、吴春山等都经过麻先生的教授。麻先生长期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包头辅导站和包头分校及市老年大学授课，为我市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书法人才。

作者：王新洲、高志昌，均为包头市党史办编辑。

稀土事业的领导者 葛鸿文

张 毓

葛鸿文，河北完县人。中学毕业后，任本县小学教师。1940年10月参加革命，42年9月加入共产党。48年随军南下。53年以来，一直从事工矿企业领导工作。进入80年代之后，率领包头稀土研究院职工倔强奋进，在我国稀土事业的起飞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赢得了国内外许多稀土行业的专家、学者们的高度瞩目和赞美。

包头稀土研究院是冶金部直属重点科研院所之一，座落在昆都仑区团结大街东端北侧，与道南的阿尔丁公园相对。它是根据聂荣臻元帅1962年的指示：集中全国力量，配置国家一级的研究院所，为开发白云鄂博资源的综合利用，经国家科委批准，于1963年4月1日成立的。可它一诞生，就进入“社教”、“四清”运动。虽然国家为它在63年、65年连续两次召开“4·15”会议，65年6月陈毅元帅又亲自来视察稀土中间试验基地，指示：加速建设，为国防服务，终因“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科研受到严重冲击，到82年底，才共获部省自治区级科研成果126项。从83年开始，在葛鸿文为首的党委领导下，开始起飞。它以自己特有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已与19个省市63个县的149个单位建立了科研生产关系，还建立了八大八小的联营工厂，并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厂家建立了稀土情报联系。经济效益从83年的38.5万元逐年翻番，上升到88年底的750多万元。

葛鸿文，原任包头钢铁公司副经理。80年8月方毅副总理来调包钢经理黄墨宾任武汉钢铁公司经理时，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经内蒙，让葛牵头主持包钢行政，协助当时包钢党委书记何树声抓行政工作。后冶金部让他到稀土院主持工作，并说明与包钢经理职级相同。他说：“我55岁已过，60岁不到，再过几年就要离休了，”辞不受任；82年李东冶部长又要他到稀土院，他仍不受任。并说：“稀土院已经几起几落了，我去干两年，情况熟了，年龄到了，还是选年轻人好。”

可是，稀土院却有稀土院的难处。“文革”后，领导更换频繁，归属问题几经起落，又兼派性干扰，科研上不去，有些技术人员已经调走，还有130多人要求调走。真是问题成堆，困难成堆，麻烦成堆。恰在此时，8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稀土院科技人员发出的呼吁：“我们想起飞，没人按电钮”的署名记者来信。为此，冶金部、内蒙党委和包头市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4月21日，冶金部在稀土院召开职工大会宣布：葛鸿文任包头稀土研究院党委书记，安治礼任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

(一)

葛鸿文43年离开教师岗位，先后任区公所秘书、代理区长和县民政局长等职。那时，每人每天供给一斤三两小米，五分钱菜金。严格而清苦的生活，养成了他深入群众，善学肯干和深思熟虑与依靠群众完成任务的朝气蓬勃的顽强奋斗精神。48年南下，任河南省淅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52年任新野县委书记。53年调武钢勘探公司任政治处主任。由于他钻研业务，又调鞍山钢铁公司烧结厂、大虎山矿任副厂长、党委书记。57年到包钢白云矿，任党委副书记、矿长。白云鄂博是56年建矿，他到任时，已有职工4000多名，是包钢当时最大单位。这期间，他对白云矿的特殊性能进行了认真的、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63年包钢调他任生产处处长。

“文化大革命”中，象他这样认真抓生产，积极钻研业务的人是在劫难逃。运动开始不久，就受批斗，靠边站了。他成了光拉车不看路，“唯生产力论”班子里的干将。“文革”的发展，使包钢面临停产。军管后又抓生产了，他从“牛鬼蛇神”堆里被解放出来，让他到有色一厂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对我国新兴的稀土工业很感兴趣，知道白云矿中的铁、稀土和铈是国家极其宝贵的财富。有色一厂出产的稀土合金，当时在全国能与它比美的厂家真是寥若晨星。他抱着团结广大职工，要很快把生产搞上去的决心，走马上任了。可是，他把底牌亮早了。他向军管会谈过，一年为国家挣回五百万到八百万元利润，把厂里的设备和环境改变一下。可他忘了“利润挂帅”正是“文革”的大忌！“以生产压革命”是他受批判、靠边站的主要原因。这话早传到厂里。所以他一到任厂军管就让他到学习班。他认为这也是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好地方。时间一长，他开始觉悟，一期接一期给办学习班。说是让全面负责，可老离不开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他说：“这实质是让我进班挨整。”厂里工作军管全面接管，出了事故、责任又找他算账，让他负责。不服，就开批判会。为生产问题经常发生冲突。整党以后，不给党员登记，还把他送到公司学习班，直到72年。

72年，公司军管会决定，开发白云鄂博副矿，命葛任党委书记兼矿长。为顺利开展工作，派去两名副师级军管作他的助手。白云矿主要是打派仗影响生产。他到任后，狠抓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先把老工人出身的干部解放出来，又把生产骨干调动起来。他利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有利条件，一个多月，配齐了各级班子，生产也上去了。白云矿成了包钢公司先进单位。73年，他被提为包钢副经理，兼白云矿党委书记、矿长。后来又兴起“批林批孔”，说他解放干部、抓生产是“克己复礼”，并说白云矿的先进是吹出来的。面对挑战，他反复思考后召开了全矿干部大

会，发动全矿4000多名职工，开展一个讨论题：我们矿的先进，是干出来的还是吹出来的？！一下把全矿职工的认真精神调动了起来，邪气很快压了下去。直到75年他回公司，白云矿的生产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发展趋势。

（二）

83年4月25日，葛鸿文、安治礼到稀土院就职。这正是稀土院满院丁香含苞吐蕊，花朵盛开，芬芳四溢的季节。他们敞怀作了个深呼吸，顿觉心胸爽快，精神倍增，同前来迎接的同志说：“咱们院可真是满院花枝满院香呵，以后再多种些。”后来，行政处在整理院容院貌的绿化中，真的在多处移栽了许多丁香，花期一到，香飞四邻。

可迎接他俩的并不都是花香，而是需要继续处理“文革”中的遗留问题，创造崛起奋进的条件与稀土事业如何起飞的问题。一天，有个同志找书记，谈他们在“文革”中的大方向问题，对院内情况的分析和看法。谈话中，葛发现这么一位好同志，却站在派性的一边看问题，说派话。问他可读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没有。书记劝他回去认真的看一下。不久，又一位同志来找，谈自己在“文革”中的是非与责任，谈自己这些年个人的遭遇与苦衷。加上其他同志来找，他深感两派中的一些人盯住了他这位党委书记——单位的一把手。他回想以前处理“文革”两派惯用的几种方法：一是支一派搞垮一派；二是面上肯定两派，暗中支一派压一派；三是选出身好的多的一派，或选受压多、受迫害多的一派支持。事实证明，这方法都不行。由此，他也想到了“大方向”问题。在单位，两派多是一个打书记、保厂长；另一个打厂长、保书记。出了单位，两派口号一致，打谁都打谁，保谁都保谁。归还历史本位，两派都在造反，都想夺权，都想掌权。这只能说是一个舞台的两个角色，他的结论：两派都是错的！

否定两派，这可是中央从来没有提过的问题。他把自己大胆新颖的想法，在党委会上亮了出来，竟得到多数同志支持。统一认识后亮出两块牌子：第一，两派都是错的；第二，科研单位以科学技术为主体。他的理由是：工厂以工人为主体，农村以农民为主体，军队以士兵为主体，学校以师生为主体，科研单位当然以科技人员为主体。这也很麻烦，“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喊了好多年，又“掺沙子”，又登“上层建筑”，改过来行吗？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研究室主任，不管他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如果在学术领域不能作牵头人，在课题选择与研究方法上不能做带头人，这个室就不可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只有在学术上能牵头，课题上能带头，又能团结调动人的，研究室才能多出人才、多出效益，才能领着人们去攻关，去攀登。研究单位需要而且欢迎有更多这样的人，并且应以他们为主体。

两块牌子亮出去，得到了大多数职工的拥护。当然，后来还得力于党中央也提出了否定两派的决定。但职工们却赞扬说：葛书记有胆有量，有远见。

稀土院遗留下来的不仅有派性，还要继续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稀土院在“文革”中是有名的“庙小神灵大，水浅王八多，牛鬼蛇神可以大把抓，大网拉”的单位。在原有不足800名职工中，有130名职工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知识分子占78%。党委向全院发出平反决定，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接回被遣返回乡的职工、家属，并安置了生活，安排了工作；对受迫害致死的家属及子女，给予妥善安置；对72名身心受到损伤的职工（科技人员占53名）给适当的经济补助；给95名科技人员增加了住房面积，有的搬进了新居。

84年8月末9月初，《人民日报》记者高粱、肖刚前来访问。葛把面临的三大难题——科技成果转让难、知识分子不值钱与知识分子子女就业难的问题，介绍给了两位记者。记者答应把

材料上呈中央。果然，9月23日呈上，24日胡耀邦总书记作了批示。葛立即请党委副书记胡玉林、副院长王绍铭二位到北京办理具体事宜。结果，除工资因涉及面太广，其它事项均已落实。中央批给稀土院80名招工指标，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对科技人员工资低、待遇低问题，后经自己努力，除86年调级外，88年实行了内浮工资。与包头地区其它企事业单位比，基本赶上和接近了人家的水平，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需从一件件具体事上做起。83年以来，他还突破了知识分子入党难这一关，使一些多年一直申请入党、又符合党章要求的同志加入共产党。刘化民，57年北大化学系毕业，在学校时提出入党申请，二十多年志向不变。只是因为家庭成分偏高、再加派性划线，迟迟得不到解决。葛深感一些人头脑里的框框太多，老看成份、出身、社会关系，不认真学习党章。经讨论，在83年，刘加入了共产党，又担任了研究室主任。这些年，刘在开拓稀土在农业、牧业、水产养殖业的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绩。84年，讨论接收印尼归侨高级工程师潘玉良入党，又遇到“历史”问题。葛说，人家的历史在52年回国时已作了结论，怎么现在还提！院长安治礼愿作他的介绍人。同年6月25日，65岁的潘玉良，在同志们热情洋溢欢迎他加入共产党的支部大会上，激动不已。26日包头市政协开会，市长向他祝贺说：“稀土院党委有胆识，为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开了门，带了头。”85年，讨论高级工程师李樊华入党。他属于“老黄牛”型人物，61岁，长期从事稀土物理检验。他，既无惊人的成就，亦无豪言壮语传入人耳。但他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内蒙古四十年大庆前，物理检验室为其承担制作纪念用的金属香币。为抢时间，室里动员职工加班，动员家属承包加工。李参加了加班，家属参加了加工。事后发加班费和加工费，他却坚决谢绝了。开放搞活以来，凡他带的课题与承揽的任务，不管

计算奖金与收入，他从不比别人多拿，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与他人攀比。在人们心目中，他的思想意识是先进的，给人们树立着另一种榜样。本年11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班子建设、制订规章制度，整顿科研秩序，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和有干劲、有开拓精神的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葛以他那顽强奋斗、勇于开拓、智谋果断与稳中求进的事业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些年，我们生活的多方面都以大起大落式、非此即彼式、两者居一式与快步跳跃式的方法指导一切，他却处处深思熟虑。在接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同时，不忘记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工人；在大胆提拔使用近50名科技人员进入领导岗位的同时，不忘记没有学历、富有管理知识与经验、有开拓精神的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在解决知识分子子女就业难的同时，没有忘记了老工人们待业在家的子女；在安排中青年干部的同时，也没有把年令偏大的干部“一刀切”去。

稀土院的职工普遍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已调走的职工有的又写回申请，希望再回稀土院服务。有了“按电钮”的人，稀土事业在摇摇欲试地准备着起飞。

(三)

事业的起飞是艰难的。

85年3月，中央颁发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事业费将以每年20%的比例削减。作为单位的一把手又面临两大难题——事业要起飞，经费却削减；人员配齐了，面临着缺钱。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讨论，决定走科研生产经营型之路，向外开拓的目标是：

立足包头，面向全国，开拓江南，发展两广，步点

山东，插向东北，进入山西。

同时在院内建立湿法萃取、金属冶炼与钕铁硼事业开发部三条稀土中间试验线。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内部打下每年可收入七百

至九百万元的基础。

向外开拓是困难的。

第一个联营之路，是包头市委书记张灿公搭桥。但由于他人插手，刚刚开始不久，就告吹了。

第二个，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江南稀土材料总厂。84年6、7月间，偶然的一个机会，江苏省常熟市来人，要看看稀土院的展览室。其中一位负责人如获珍奇，立即谒拜党委书记葛鸿文，要求支持他们，并邀稀土院派人到常熟考察，帮助地方建立工厂，俩人一谈即合，实地考察后，在常熟市大义镇由农民集资、出劳务；稀土院出技术人员、出管理人员，江南稀土材料总厂以自己的产品和质量，很快在国内外占有了应有的市场。当时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总理赵紫阳等都亲临参观、考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一些地方报刊，都分别以通讯、消息作了多方面报道。

建成“江南稀土材料总厂”之后，稀土院又分别与广东的河源、乳源，湖南的益阳，江苏的泰兴，山东的淄博，山西的原平、忻州，辽宁的辽阳，陕西的岐山，内蒙的呼、包两市和达茂旗等建立了八大八小的联营工厂。六年来，稀土院共取得科研成果144项，获奖成果66项，申报专利16项，获专利权1项，获国家发明与科技进步奖6项，获部省、自治区级科技进步奖60项，推广科研成果项目175项。科研成果推广的覆盖面，已达到：

大江南北，珠江沿岸，洞庭之滨，渤海岸边，雁门关下，松辽平原，西北边疆，达茂草原。

1989年2月17日，葛鸿文书记、安治礼院长，因年龄已“超期服役”，经冶金部批准，离开了领导岗位。葛虽然不担任领导了，但院里委托他办理的单项业务，他仍然不辞劳苦地到江南、东北等地，协助新任领导为稀土事业的腾飞而努力着。

作者张毓，包头稀土研究院纪委副处级检查员

眼科专家郭体绪

张 清

衡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是看他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了多少物质享受，而是应该看这个人向人类贡献了多少有益的东西。

在草原钢城包头昆都仑区乌兰道东段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医疗咨询服务站里，眼科门诊室一位年逾古稀的医生不辞辛苦，忙来忙去，认真细致地检查治疗着一位接一位的眼病患者，他就是包头著名眼科专家、七十四岁的昆区政协委员郭体绪。

郭体绪，中等身材，胖胖的体形，走起路来不紧不慢，说话时总是胸有成竹，面带笑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和蔼可亲、肯关心别人的人。

情系人民 余热生辉

郭体绪大夫从事眼科医疗和教学工作五十余年，在漫长的几十度春秋岁月，治愈过多少患者，人们是无法计算的。但凡经郭大夫治疗过的病人，对他那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精湛高超的医疗技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无不交口称赞，终生念念不忘。如今，郭大夫年事虽高，然而“壮心不已”。一九八五年他离休了，告别了他几十年热心施展医疗才能的工作岗位。他原工资照发，本来可以坐在家里安闲地欢度晚年了，可是他总感到呆在家里对不起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他说，“我是搞眼科医疗专业的，看到很多眼病患者得不到及时诊疗很痛苦，我不能坐视不管。”一个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责任感，一个共产党员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驱使他再度走进医疗室，被聘请到市计划生育服务站眼科搞医疗咨询工作。他不辞辛劳，准时上班接待病人。消息传开，前来治病的人终日络绎不绝，上班前门诊室外就排上了队。休息时间，千方百计打听到郭大夫住家的患者，便找到门上请求治疗。四年时间，他诊疗和检查病人7678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吗？不是一个浇灌着郭大夫心血的数字吗？生命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社会的奉献，而并不取决于年纪的大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对求医的患者，郭大夫一视同仁，不论职务，不分职业，不管老少，总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详细诊察，从不敷衍轻率，不确诊决不放过。这种高尚的医德，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虽说不是绝无仅有，但也确实不多。郭老认为，医生为患者服务，反过来患者又促进医生业务技术的提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充实理论，互为促进，才能精益求精。

郭老是包头市第一个眼科医生，是包头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一九五一年由一般医师晋升为主治医师，一九六二年评定为包头医学院讲师，一九八一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二十八年间，他一直担任五官三科主任，并一直任中华医学会包头分会理事和历届眼科学会主任委员。每谈到医生的职业道德，郭老就说作为一个人民的医生，必须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要视病人如亲人，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体贴入微地关心病人，爱护病人；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所以治病要运用各种检查手段，全面仔细地诊察，一丝不苟，做到准确的诊断，然后才能施以恰当的治疗，收到预期效果，同一种症状，可能产生于各种原因，所以必须查清病源，“缓则治本，急则治标”；倘若遇到疑难、复杂慢性病人，还要在精神上给以安慰，使其对医生产生信任感，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配合医生治疗，定有事半功倍之效，虽顽疾沉痾，亦可治愈。当年包头郊区乌兰计村有个叫

出色小的患者，双目失明达十八年之久，经过郭老的精心治疗，终于重见光明，使他从五保户中解放出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郭老欣慰地说：“能为患者解除病痛，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安慰。”

郭老以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医疗事业上的卓著成就和贡献，赢得了党的信赖和群众的崇敬。一九五七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当选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代表，同年获得市教育工会优秀医务工作者奖；一九五九年获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曾被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朝元老”、“内人党”等罪名关“牛棚”、强迫劳动七年之久的人民医生、共产党员获得了新生。他振奋精神，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中。他除了承担医疗、教学和党务工作外，还撰写了十几篇医学论文，其中有两篇被评选为优秀论文获奖，有八篇在专业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其余的在自治区和市学术会议上作了交流。能为医疗事业贡献力量，郭老感到无限欣慰，他积极参加医学科研活动，一九七八年获得市医学科学学术活动积极分子奖。

医术高超 名扬各地

一九八五年，郭老被推荐为昆都仑区政协委员，从此他积极参与区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工作。他说：“我虽年逾古稀，但仍愿把光和热贡献给人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为人民服务不但做到来者不拒，而且我要主动送医上门。”他利用整党学习之余，诊疗疑难眼病患者589人次，参加体检了数百人。一九八六年，他首先给离休老干部作了“保护眼睛，防治眼病”的保健知识讲座，听众达100余人，受到热烈欢迎。同年，郭老直接诊疗眼科病人516人，协助计划生育服务站作婚前体检4,750人。一九八七年，他诊治眼病患者858人，一九八八年更上一层楼，他全

力以赴，全年诊疗病人912人。郭老所接诊的病人多数是复杂疑难病症，但他总是热情接待，对每个找他治病的人都要经过细心认真地检查，确诊后再制订出治疗方案，对症诊疗，从不马虎轻率。高超的医疗技术，丰富的治病经验，严谨的工作态度，使郭老盛名斐然，治愈后高兴而归的患者，一传十，十传百，名扬各地，不仅近在咫尺的患者接踵求诊，而且远居千里的病人亦慕名而来。一九八八年夏天，河北张家口郊区二十四岁的农民杨润慧双眼患虹膜睫状体炎，曾在张家口、大同等大医院多次诊疗，未见效果且日益恶化。来到包头时由于虹膜粘连，炎症渗出物几乎把瞳孔全封闭，视力仅有眼前指数（0.02以下）。她丈夫拉着手走路都有困难，还带着个吃奶小孩，艰难极了。不几天连回去的路费也快花光了，吃住都有难处。面对这一将要失明的青年人，郭老发扬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方面积极抢救，精心治疗，一方面想办法帮助她们解决困难，建议他们在曹家营子以每月15元的房费租住了一小间房子，再由杨的爱人担着卖菜挣一点钱，维持生计。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杨润慧的眼病治好了，医药费和路费也有了，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离开包头回家务农去了。临行前，他们来到诊室，对郭老的深情厚谊表示由衷的感谢。郭老看到自己亲手治愈的患者重见光明，“夫妻双双把家还”，心情无比激动，欣慰不已。是啊，“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巴彦高勒市十八岁的女青年农民马春艳头疼不止，复视严重，视力很差，不能持续看东西，深感痛苦。曾在当地市、旗医院多次就诊无济于事。听说包头有名医，便千里迢迢来包找到了郭老。经郭老详细诊查为高度斜视和近视，斜视度达18度，经适度的眼镜矫正后，视力达到1.0，不但提高了视力，还清除了复视和头疼。马春艳满意而归。

建设包钢，服务于包钢，为包钢职工解除疾苦是人民医生义

不容辞的职责。五十二岁的包钢干部张国信长期头疼，视力仅有0.5，经郭老细致地诊查，为复性近视散光和动脉硬化。给予适度眼镜矫正后达到1.5的正常视力，并给以处方治疗动脉硬化，治愈了疑难病症。情况明治疗才能有针对性。二十二岁的包钢材料处女职工田月琴，右眼外伤后失明，左眼交感性虹膜炎继发青光眼，且头疼恶心，久治无效，亦将濒临失明。她找到郭老痛哭不止，郭老视病人之痛为己之苦，便全力给以确诊，先以药物医治，继而酌请二附院杜世祐主任大夫施以手术，使其左眼得到了挽救，视力恢复，头疼消失。看到患者能上班工作了，郭老非常高兴。

郭老的医术还表现在分析治疗眼病中，善于发现不合格眼镜给屈光不正者带来的痛苦。包头七中二十三岁的女教师毕晓珍，花去上百元钱配的直接眼镜，因质量不合格，磨擦伤害角膜并感染，致使左眼角膜炎后溃疡，影响视力且疼痛、脑鸣、流泪，影响工作。这引起了郭老深深的忧虑，据此，郭老曾多次建议组织培训眼镜店的验光人员，以提高他们的光学知识和验光技术，更好地为屈光不正眼病患者服务。

废寝忘食 事业为重

应接不暇的患者，常常使郭老无法按时下班，然而强劲的事业心使他忘记了疲劳，简直“不知老之将至”，精神不减当年。眼科门诊室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他一边询问病情，一边进行检查，一边登记病历，一边开处方。今年三月八日，二〇二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领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找郭老治病。郭老考虑到他们远道骑自行车来很不容易，便认真诊断病情，聚精会神进行治疗。谁想治完以后，看门人员早锁上大门下班走了，郭老在医疗室被整整“关”了一个中午。郭老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患者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文革”前十七年，郭老正值壮年时期，他回忆说：“党和政府对我信任，自己觉得有使不完的

劲。解放初期，包头市只有一个人民医院，我是医院五官科唯一的医生，当时农民翻了身生活逐步提高，城市职工队伍日益壮大，要求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五官科每天门诊病人达百人之多，有时多达一百三十人次。我和两个护士白天看门诊，夜晚查病房，做手术，早晨六至八点给卫校学生讲课，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三十余年后，郭老依然如故。他说：“我衣、食、住都不缺，为什么不坐在家里休息，而废寝忘食地工作呢？因为解除病人的疾苦，恢复患者的健康，是我最大的乐趣。”去年除了咨询治病，又为53名眼、耳科病残儿进行了诊察，对其中四分之三作了观察治疗，四分之一不易治愈的他建议给予生二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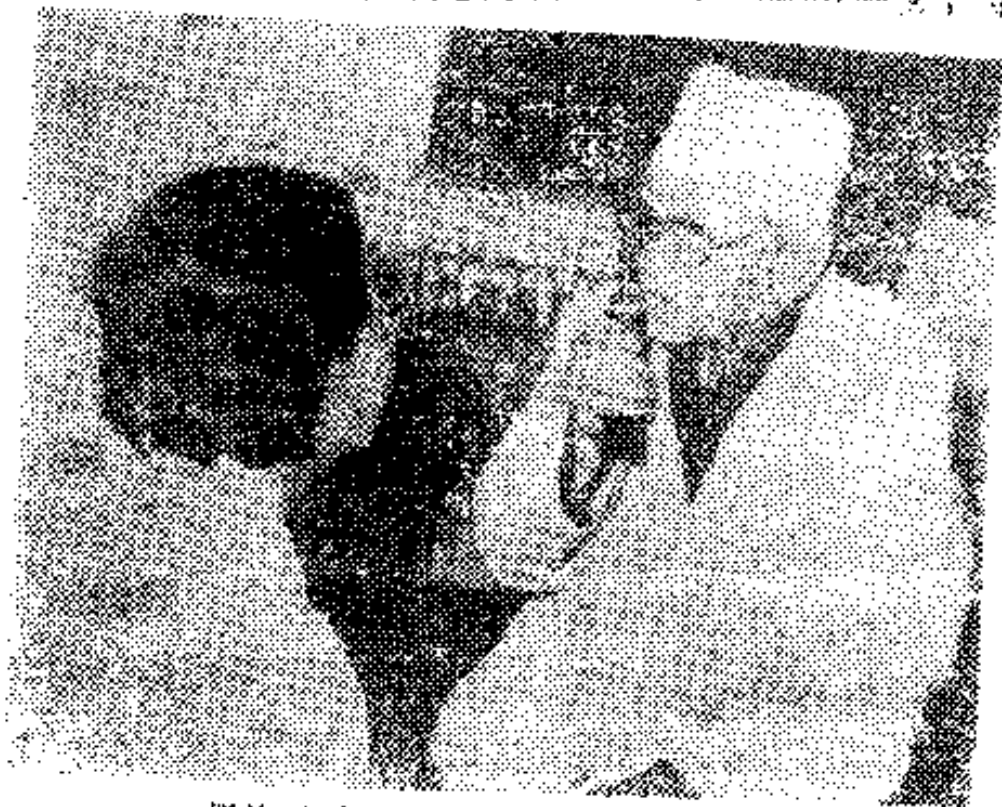
郭老认为，身为人民政协委员，不能徒挂虚名，应积极参与议政，围绕新时期政协工作的性质、任务，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工作。他积极参加医药卫生组的活动，提出加强保健和食品卫生检查、实现医院之间横向联合的许多好建议。去年国庆节前夕，他不顾年迈，不畏疲劳，随同政协领导和卫生组成员到市场视察了食品卫生、个体医药和眼镜店等行业。他发现眼镜行业存在较大的质量问题，只顾经济利益，不讲社会效益，致使许多眼镜价高不合适。他还发现了不少近视、远视、散光等眼病并发有隐性斜视。郭老认为，近视眼是青少年的多发眼病，上海调查报告称发病率为52%，昆都仑区也达38%，这对学生的学习和升学就业都不利，他提出要积极贯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他建议学校要培训校医，给学生讲眼睛保健课。为了使需要配眼镜的屈光不正患者增长卫生常识，遂写了“隐性斜视”和“浅谈学生配眼镜”两篇文章，登载于包头日报上。郭老从目前包头乃至全国资料统计数据获知，50%以上的人有轻重不同的隐性斜视，这引起他对中华民族视力素质的忧虑，病因之源起，矫正治疗之方法，他将五十余年的丰富经验公诸于报端，语重心长；那几乎达半数不合格的中小學生眼镜，不是矫正过度就是矫

正不足，致使头晕、眼花、恶心、视物变形，视力日趋下降。郭老十分关注地谈了什么是近视、远视及其发展趋向，介绍了镜片常识，给人以启示。

八月炎夏，医疗卫生组携带医疗器械，前往阴山脚下昆都仑河畔的塞外古刹昆都仑召为驻庙喇嘛和附近农牧民送医上门，其中那个年令最高、兴致勃勃的老者便是郭老。他一边认真检查，一边记下患者的姓名、病历，以便为他们准备配眼镜和 治 疗 药 物。半天时间，郭老集中精力诊治眼科病人20人。热情温和的态度，认真负责的医风，使喇嘛和牧民们深受感动。一位久病不愈的牧民激动地称赞：“到医院看病，得整整等半天，也见不到个名医，你们上门看病，真是服务到家了！”

一专多懂 造诣精深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郭老除了致力于拯救患者，还经常翻阅报刊资料，了解全国和全世界各类病态的出现、发展和蔓延趋势。他还是位一专多懂、一专多能的医学专家。除了致力于眼科专业，还探讨研究其它疾病的病源和病症，郭老发表在包头



郭体绪委员在给眼疾患者检查病情。

日报上的那篇“警惕性病复萌”的文章，深刻阐述了性病的含义、传染的原因、由国外传入的历史和包头解放前性病的发病率及对民族健康的危害。郭老告诫，性病

是国家声誉的大敌，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健康尊严，优化社会风尚，使家庭幸福，国家富强，应该认真做好婚前体检，不得漏过一个性病患者。郭老回忆起解放初期为了根除性病，曾应有关医务人员的邀请，从今东河区出发，到大青山下的西水泉沙石场劳改队治疗劳改犯中的性病患者的情景。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还要去东河进行一番调查研究，进一步掌握旧包头的妓院和性病危害的有关数据，为《昆都仑文史》写一篇史料文章，以教育后人。”

郭老不负众望，以其辛勤劳动结出的硕果，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和敬重，连续四年被评为政协工作的积极分子，受到了表彰奖励。郭老感慨地说：“五十年来，我从一个一般医师成长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

“为有源头活水来”。早年（1931至1939年间）郭老就在祖籍河北省献县专攻医学，一九四〇年，听朋友说包头没有眼科医生，便风尘仆仆来到塞外。他回忆说，一九四八年秋，包头解放前夕，我虽然是绥远省立包头医院的眼、耳、鼻、喉科医师，但月工资仅给银元券三元，连一个人的月口粮都不够，何以糊口养家？不久，包头解放了，蒙绥军区卫生部部长李振智及主任军医罗定州等接管了包头医院。李振智部长曾陪同蒙绥军区司令员姚喆、副司令员王长江请郭老看病。“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解放初期那段如火如荼的经历给郭老留下难忘的印象。为了培养人民医生，一九五五年郭老被派往天津医学院眼科进修班深造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国轰轰烈烈支援包钢建设的热潮中，郭老欣然来到新建的包头第一医院工作。有一件事至今使郭老记忆犹新。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视察包钢，因天热旅途劳累，左眼患了“球结膜下溢血”急性眼疾，双眼底均动脉硬化。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市公安局谢玉林处长专门请了郭体绪大夫给以治疗。郭大夫关心地劝林老多休息，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郭老除了医疗工作，还先后

为包头护校、包头卫校和包头医学院的学生讲课三十多年，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郭老谈到体会时认为，这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又促使我不断提高理论水平，这就是教学相长。是啊，郭老在这块土地上印出的不平凡的足迹，不正说明一切成就都出自于对事业的忠贞和辛勤的耕耘吗？

让余热去变为强大的动力吧！正如郭老所说的，余热不能用物质现象来衡量，更不是燃烧后留下的灰烬，而是老年人知识和经验的重新发光，作用也许更大。

端午节的由来

寸心

每年的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古代又称“诗人节”。

两千五百多年前，楚国出了位才华超群的爱国诗人屈原。他曾在楚怀王手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此间，他见朝廷腐败无能，黎民怨声载道，于是提出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等许多有见主张。不料，后为贵族排挤，遭谗去职，继而被流放。

在长期流放生活中，屈原与民同甘共苦，体察民情，用民间文学艺术的形式，创作了忧国忧民的大量诗歌，其中以抒发其当时感情的《离骚》为代表作，陈述了他对楚国深沉的热爱，对政治黑暗，外交失败，民不聊生的抨击。在民间影响极广。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大举攻楚，破楚都。屈原悲愤欲绝，深感救国无望，就在五月初五这天中午，自投汨罗江而死了！

荆楚百姓痛惜其死，遂纷纷划船前去江中打捞，终未如愿。这时，乡亲们自发地包粽子以代祭品，竞相投祭。划龙船、包粽子，从此成为民间纪念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风习。至于插艾和戴香荷包，也都是对屈原表示“爱戴”的意思。

矢志不渝报国情

李光珍

1917年3月，我出生在河北省成安县农村一个普通的家庭里。

1934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何梅协定”的时候，我正在保定培德中学念书。“何梅协定”，丧权辱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学潮此起彼伏，我也加入到抗日游行的队伍中。为了抵制日货，还参加了校学生会组织的周日执勤活动，检查返校生携带的物品，凡有日货一律没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妻子王婉芳的大力支持下，我怀着抗日的激情，考入了成都第十五期黄埔军校，在第一总队步科一大队一中队第三区队学习。总队长先是贺光谦，后是王甲三；大队长陈济川，中队长潘连升，区队长杨世源。十五期共22个总队，除第一总队外，学习期限均为一年半。第一总队培养的是教育干部，学习期限为三年。第一年进行入伍教育，第二年分科教育，第三年是学生教育（各级指挥模拟演习，由队长、区队长监督）。三年从始至终学习四小教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陆军礼节。一年分科后学习八大教程：战术、地形、筑城、兵器、通信、防毒、工兵、战车。每天上午是课堂教学和操场教练，下午校外演习。毕业前实习时，战术实施一个月，地形测量一个月，筑城实习一个月，以师为单位的对抗演习两周。

1940年7月，我从黄埔军校毕业。我们第一总队毕业生统一

安排在后方机关、军校等部门工作，大多数学员也都愿意留在后方。但我对日寇十分痛恨，坚决要求上前线，终于获得批准，与同期毕业的十三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国民党第56师，均是排级职务。这十三名同学是：高亮、琨纯益、杨生文、孙逊、贺文、邓玉瑄、郭金生、刘清泉、刘德泉、周剑华、阎德才、高文厚、王荫越。当时，部队正在潼关东北作战。我们从成都坐汽车到宝鸡，又乘火车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西安。一打听，56师已调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湖北省老河口了。从西安到老河口，须经过洛阳、安阳，但洛阳一度被日寇占领。另外一条路可由西安经宝鸡到汉中，再坐船到老河口，大家都觉得绕路，不大愿意。还有一条路，即先到56师留守处报到，再到师部。56师留守处设在安康，去那里须翻越秦岭，仅一个大山头就有二百里高。此路狭窄，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通过。但大家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地上路了。背着行李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越走越觉得逼近抗战的前沿，越走步伐越轻快。当登上秦岭顶峰时，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向北望，黄土高原连绵起伏；向南看，草木茂盛，苍翠无边。祖国壮美的景象激起我们无限的爱国情怀。然而今日却有大量的国土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怎能不使人义愤填膺呢！真想插翅立刻飞到杀敌的战场。从山顶下去就是安康了，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步伐又加快了。当我们带着佩剑，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康留守处报到时，已是徒步行军的第十八个夜晚了。

1940年12月，日寇第二次攻打老河口，我们战区预备队全面出击，打得敌人大败而逃。1942年，第六战区吃紧，国民党中央电令第五战区派部队增援。师长励鼎璋率领全师由老河口莲花堰出发，急行军开往什仲坪接防。为行动隐蔽，不被敌人察觉，我们昼伏夜行，连续三夜不能休息。然而夜行军时，全师将士无不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到达什仲坪后，我们轻装前进，随即参加了当阳之战。当时，我在166团团部当副官，主事的吴义成副官

在莲花堰离队出走，因此，全团只剩下我一个副官。团部的杂务工作全需我去做。团旗是全团的生命，失掉了团旗就意味着全团的覆灭，我于是随身携带，精心保管，决心与之共存亡。另外，我还负责团长的行动、团里杂勤人员的管理、团部与师部和各营的电话联络、行军打前站、供应给养等工作。

部队到当阳之后，立即发动了进攻。我们夜间剪开了敌前沿阵地铁丝网，悄悄地向里摸，不巧惊动了马群，顿时枪声四起，双方伤亡惨重。这次战斗，给第六战区解了围，较好地完成了作战任务，部队受到了第五战区的通令嘉奖。我们十四名黄埔军校同学中，阵亡了三人，他们是孙逊、贺文、邓玉璠。我在周家院含泪掩埋了邓玉璠同学的遗体。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943年，日寇又窜犯大别山。当时，我已下到166团1营2连当连长，师部设在罗田县。日军组织了一个师轻装出发，边走边打，就到了罗田。日军攻打县城时，王荫越副连长在组织阻击中出了大力，激战一天多，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敌人放火焚烧了县城。过了一个月，我师又进驻罗田，但见残垣断壁，老百姓痛哭流涕，惨不忍睹。

日军攻占罗田后，转到了湖北腾家堡，与我们营相遇。我们立刻抢占了有利地形，与敌交火，日军无心恋战，边打边走了。

腾家堡遭遇战后，我们全军调湖南漆家河整编，记得，当时四周都是山，山外驻扎着好几个军，被整编的官兵们乱放枪。我们这个军被取消了番号，改为56师，归并到92军，军长是侯镜如。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我们师开赴北平执行接收任务。八年抗战我从未回过家，也不可能回家，现在胜利了，我迫切地想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10月21日，我们进了北平，满城都是兵，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找到了我的一个亲戚，这才知道妻子已搬到北平北沟沿居住。我喜出望外，当天就在北沟沿见到了妻子儿

女，只是妻子已认不出我来了。

原来，我的老家河北成安沦陷后，遭到日伪军、土匪的肆意摧残。我的父亲被土匪打死后，我的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含恨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妻子王婉芳带着两个孩子跑到了临漳县南羊羔村娘家避难。在南羊羔村，她参加了村妇救会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直接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革命工作。根据上级指示，1942年10月下旬，与刘朋寿（即刘亚平，化名杨玺东，中共党员）、王碧臣（我的岳父，八路军总部高参，化名王家修）、王树人（中共河北成安县委宣传部长，化名王霞）等同志来到北平，组成一个新的“家庭”，长期做华北伪军上层军官的策反工作。而这些内情，我是在全国解放后得知的。

八年抗战，人民备受其苦，饱尝动乱之艰辛。现在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却又孕育着新的内战。我不甘受内战之苦，更不愿参与打内战，在妻子和其他搞地下工作的亲友的影响下，我多次向部队写申请，终于在国共和谈前夕以请长假的方式脱离了部队。

妻子和亲友们对我的行动十分赞赏，经常帮助我提高认识，他们的进步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常为他们做外围工作。曾协助他们秘密筹集武器。不久，我就与成家两兄弟成庆华、成庆嵩熟识了。当时成庆嵩刚从抗大回来，为掩护工作，要在辅仁大学复学。这需有现役军人作保才行，于是我作了保人，使他顺利入学。我们成了好朋友，常常交换思想，彼此十分融洽。交谈次数多了，我就知道了他们的真实身份。有一次，成庆嵩得了腹膜炎，需手术治疗，想到他们生活拮据，我就把妻子仅有的一个金手镯无偿地送给他看病，使他很快痊愈。

这期间，地下党人员几经变动，最后只剩下我和妻子、岳父母等人。后来，地下党的负责人贾建国被国民党逮捕，地下党从此与组织失去了单线联系。

我为生活所迫，曾做过小买卖，当过教育副官。1947年1月，经黄埔同志张鹏铃介绍，我到北平第一军官训练班任战术教官。北平解放时随傅作义起义。起义后在解放军十三兵团学习，后参加了教育工作。

1952年思想改造时，我们向组织陈述了我的过去和妻子做革命工作的历史，以使组织上能全面掌握我家的情况，也希望能把妻子的组织关系给接上。但因历史事件客观的复杂，随着时间的推移线索更难以把握，以致于弄巧成拙，妻子的教师工作也给停了。妻子失去教师工作后，怀着为党多做贡献的愿望，又先后参加了扫盲工作、街道工作等。

十年动乱，我和妻子都没有逃脱磨难。挖肃清队的专案人员硬逼我妻子证明成庆华是叛徒，王淑媛是国民党，遭到严辞拒绝。为此，她受到更加严厉地批斗，身上留下好多后遗症。

1978年，我的问题得到了落实，结论为起义人员，系一般政治历史问题。1988年1月5日，我妻子的问题最终得到落实和解决，国家安全部门对她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历史有时是不公平的，但永远不公平的历史是没有的。

现在，我和妻子在家安度晚年。我被推荐为昆区政协委员后，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丰富了。前不久，我给在台湾的老同学去信，介绍祖国几十年的变化、现在的面貌及我的晚年生活，希望海峡两岸同学经常联系，共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出自己的余热。

（广玉 整理）

文本作者：李光琦，黄埔军校

毕业生，现昆区政协委员。

走向光明

易 磐

1949年的2月初，我在广州国民党空军第一军区第四处当机械附员，住在广州东山的一所阴暗的库房里。当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南京的国民党中枢已逃往台湾，空军总部也已迁往台北，在广州的国民党空军所属人员，也都不作久留的打算，不知什么时候就要逃之夭夭。

为什么总是逃跑呢？这个军区部1948年秋从沈阳撤到北平，又从北平撤到武汉，再从武汉撤到广州，不到半年的时间，就从大北逃到大南，现在又将准备逃往海南岛或台湾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的确十分苦恼，出于一个青年人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心，我徬徨忧郁。我曾写信给台湾我的一位老师张志男，征求他的意见，我应该到哪里去？他当时是国民党空军总部的一个副处长。他给我回信，让我立即去台湾，并已给我办好了入境许可证。我没有马上行动，因为我考虑到，去了台湾也是“僧多粥少”，又有多大的指望呢？我本是国民党航空机械学校毕业的学生，跟着国民党走是应该的，可是，撤退的苦难，给我心灵上蒙上了阴影，我需要重新思索了。由于业务的关系，我常去广州天河机场，那里搞地勤工作的有许多是我的同学，我们在一起经常私下商量今后的出路，有的人准备随波逐流，有的人打算回老家去，谁也不愿到解放区找共产党，怕危险。所以每次谈去谈来都

没有一个稳妥的办法。

1949年5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学蒋昉从广州到香港去玩。那时去香港不受任何限制，乘火车到九龙，再乘船过海。原来香港是一个傍山依海的阶梯式的都市，繁华、有秩序。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报纸，有的是替国民党说话的，有的完全站在对立面骂国民党的。我们沿着临海的干诺道走，发现一家“生活书店”，里面挤满了人，我们也走进去，看见书架上摆满了许多进步的书籍，突然，一本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出现在我眼前，著者“毛泽东”。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取下这本书翻阅，一下子就被这本书所吸引。“中国向何处去？”著者提出了一个千万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主张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太好了，真使我兴奋。要建立一个政治上不受压迫、经济上繁荣的新中国，这是几万中国人的理想。我回想自己在蒋管区学习、工作的十年，抗战初期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几乎天天跑警报，日本侵略者压迫我们；抗战胜利后，国内一片乌烟瘴气，官老爷们趁接收之机，大发国难财，搞“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车子、金子、女子），老百姓受他们的压迫，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后来，内战打起来了，国民党节节败退，军事上土崩瓦解，政治上完全丧失了民心。我怎么还能跟着这些腐朽的势力跑呢？毛泽东写的这本书，有许多地方我还看不懂，但他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使我在消沉中见到了一线光明。而且，著者明确地写道：“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原来，共产党并不反对孙中山，我反复地看清了这句话，联想过去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那完全是一派胡言，为什么“凶恶”的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得招架不住，面临垮台呢？这正如毛泽东说的，旧的社会制度已是“日暮西山，气息奄奄”，而共产主义的思想“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是的，这就是对当前形势的总结。

不能不令我信服。我第一次到香港，没有时间去领略那里的都市风光，而得到了思想上的启发，解开了内心深处的一个疙瘩。我的同伴却很不以为然。

回到广州以后，我决心要到解放区去。我在天河机场和许多同学、同事机前告别，他们一再劝我上飞机与他们一同去台湾，我却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后会有期”。那时，不打算跟国民党跑的也有不少人，但怎样能到解放区去，还没有门路。1948年6月间，我与同学韩中和悄悄溜到香港，跑到“文汇报”社去访问，一位姓刘的编辑了解我们的情况后，鼓励我们到解放区去，说那里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那里才是青年人的光明之路。他并且告诉我们，可以搭乘英商轮船到天津，注意报上登出从香港开往朝鲜仁川的船，那就是去天津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刘编辑的帮助，回来后积极准备动身。

可是事不凑巧，从香港开往仁川轮船的消息，突然停止了，广州的报纸上见不到了，这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与韩中和商量，认为只有等待，他说他希望晚些时候走，因为他妻子身体不适。后来我又联系了一个同事薛德文，他积极支持我早日去天津，我把香港“文汇报”刘编辑的地址告诉了他，他说他等我走了以后再行动。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薛德文是党的地工人员，他对我的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去解放区的信念。

1949年8月21日，是星期天，我利用到天河机场及去市内办事的机会，与韩中和一道，到广州民生轮船公司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只身离开广州去香港，我开小差逃跑了！与韩中和约好在北京见面，以后他果然也到了北京。

我站在“石门”号轮船的船舷旁，向广州告别，向我十年的旧生涯告别。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摘下头上带的“大帽花”和肩章，狠狠地把它抛入海里，身上感到一阵清爽，旧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船到香港之后，找好了旅店，立即去英商太古公司买船票，不巧，两周以内的票已全部售完，我只好等待。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的确是富人的乐园，穷人的地狱，不是我久留之地，我急于离开。终于在1949年9月4日，我登上了从香港开往仁川的货船“湖北”号。一周的海上航行，9月11日抵达天津。在船上有几位也是和我同命运的人，他们告诉我到北京灯市口人民解放军三一部队报到，第二天我就赶到了那里，我终于投向人民的怀抱。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两眼闪着泪花，这就是我所盼望的新中国，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四十年过去了，新中国已无比强大，政治上安定，经济上繁荣，人民生活成倍提高，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往后的日子将更加美好。我从事教育工作已卅余年了，现已离休。我从一个幼稚的知识分子，变成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年前从广州逃往台湾的旧同仁和同学，你们一定非常想念家乡吧！祖国需要统一，骨肉应该团聚，让我们共同努力，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我们重逢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易磐：区政协委员。

优秀的民族教育工作者包家驹

〔蒙古族〕 包广仁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年过半百的蒙古族教师包家驹同志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他的亲属中已有不下十人从事教育事业。他的已年迈退休的双亲都曾是深孚众望的教育工作者。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民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

然而，生活犹如一条长河，有时激浪滚滚，有时溪流涓涓。半个多世纪来，包家驹同志的生活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经历了许多崎岖和坎坷，遇到过很多挫折和不幸……。

征途艰难步不停

一九五七年，包家驹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系。当时他怀有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理想，对他来说一切都充满希望，一切都那么赋有诗情画意。他曾暗下决心，定要发愤读书，增长知识，掌握本领，将来去培养更多的人才，为祖国，为民族的繁荣富强多作贡献。

可谁能想到，单纯而善良的包家驹刚踏入大学校门不久，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倡导下，也积极热心的帮助党整风，给系党总支工作提了几条意见，结果大祸临头，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曾一度头昏脑胀，痛苦不堪。但他的理智和信念终于战胜了灰心丧气和悲观绝望。他靠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

爱，挺住了种种打击，并且面对漫漫逆境曾不止一次默默地发誓，一定把自己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

一九六二年，年仅25岁的包家驹身负沉重的“摘帽右派”的枷锁，怀着到艰苦的地方进行锻炼、进一步接受监督改造的心情，只身到了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走上了教学工作岗位。在那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岁月里，他要开展工作所面临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社会上的压力刁难和不明真相的人的冷嘲热讽，给他带来无尽的精神折磨和心灵创伤。然而当他走上讲台面对众多学生时，便会忘却自己的孤独和生活中的烦恼，感到人生的充实与快慰，也正是对于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才使他永葆革命的青春，成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永不退缩的战士。

在史无前例的那个时期，包家驹同样没有被幸免，“老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接二连三地扣到他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挨批斗，蹲牛棚……，他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但是他不仅没有动摇，没有后退，反而更加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深信，人类的发展，民族的兴旺，国家的繁荣，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大批人才。所以，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美好的理想，脑子里想的依然是数学专业和教学工作。

一往情深育新苗

人生的价值在于无私地奉献，这是包家驹一贯遵循的处世哲学。他深深懂得，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做到以身作则，为人师表，除了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外，还必须有对学生炽热的爱，和对事业的无私的奉献。

早在一九七三年，当时作为班主任教师的包家驹，看到他班里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迫切要求加入共青团的吴宝昌同学，升到高中二年级时仍得不到解决，虽然他是个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只因其父有历史问题而无人过问他的政治命运，把他

长期拒于组织门外。对此，包家驹忿忿不平，他挺身而出，四处走访，深入了解，最后，终于通过公安部门证实了该学生的父亲确无历史问题后，校团委才批准他入了团。入团后不久，吴宝昌同学担任了校团委委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赞赏。当然，此举就一般情况而言是平凡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需要有一定的胆识和勇气，而对于那种处境下的包家驹来说就更加不易了。事后，他感慨的对人说，为了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个人担点风险，甚至付出些代价和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是教书育人同步进行。

对于残疾学生，包家驹更是体贴入微，倍加照顾。范厘伍同学家住农村，从小跛足，高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和身体残疾而被迫辍学回村务农。包家驹对范厘伍同学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十分了解范厘伍是个品德优良，求知欲强烈，很有培养前途的好学生。因此，他会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联名向盟教育局推荐范厘伍同学，几经周折得到批准，范厘伍同学很荣幸的被盟师范学校破例录取。一九七九年，当包家驹调到盟教育学院后，又把该学生择优录取到教育学院让他继续深造。后来，范厘伍果真不负众望，成为深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的中学物理教师。

十年动乱后，锡盟的教育战线师资奇缺。这时，包家驹面对严峻的现实，想国家所想，急人民所急，不畏艰难，积极主动地承担了培训教师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包家驹蒙受了二十二年的不白之冤得以昭雪，他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他多么兴奋和激动啊！他哭了，是那样的甜蜜动人，真是开心极了。当时他虽年过40却焕发出青年的活力，工作上更加大显身手，施展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他先后被聘请为盟教育学院大专班教师、盟师范学校的兼职教师和内蒙师大函授高师班的兼职教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包家驹等一批热心人的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努力拼搏和精心培育下，一批

批合格的年轻有为的初高中教师很快茁壮地成长起来，并陆续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因此，在短短的几年中，锡盟的教育战线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包家驹在锡盟工作了二十年。二十个春秋不算长，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是，看看吧！就这二十年中，岁月的犁铧在他脸上耕耘出条条沟痕，草原的风雪在他头上染织出缕缕银丝。就这二十年中，他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了锡林郭勒大地，换来了满天桃李的累累硕果。

雄心壮志攀高峰

一九八一年，包家驹从锡盟调到包头市蒙古族中学继续任教。来到新的环境以后，他又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教学改革的洪流之中。他为了变封闭型为开放型、经验型为科学型、把以传授知识为重点的教学转变为以培养能力为重点的教学而认真探索，千方百计的更新知识、更新观念。虽然他在大学数学系受过五年系统而严格的专业训练，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需要，他对自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现代教育学、现代心理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兴的科学知识。近几年，他省吃俭用购置了大量的专业书籍，订阅着七、八种数学杂志。他结合教学实践，经过日积月累整理了数以百计的资料，收集了几千道习题，在此基础上撰写出《运用教育学、心理学指导数学教学的体会》、《关于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探索》等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包家驹从事教学工作已将近三十年，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是在备课上从不懈怠马虎，为讲好每节课，他都要认真查找资料，反复琢磨推敲，既备教材又备学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讲课时，他的语言精炼、形象而生动，教学态度严谨、一丝不苟，教学方法上总是采用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再加上知识面广，逻辑性强，因此，就象磁石一样吸引学生。有的

学生曾这样说过：“听包老师讲课是莫大的享受”。这几年，市教育局教研室的有关人员几次到蒙中检查教学工作时，通过对包家驹课堂教学的观摩、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抽查学生作业后，对于他的教学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包家驹平时谦虚谨慎，团结同志，乐于助人。他除了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外，还经常替那些请病事假的老师代课，既无怨言，又不计报酬，所以，赢得了同志们的尊重和信赖。

包家驹与李忠昌的亲密关系在蒙中被传为佳话。李忠昌于一九八〇年从包头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包头蒙中任教。一九八五年，当学校决定让他担任高三理科班班主任时，他因教龄短，经验少而显得信心不足，有些畏难情绪。这时，包家驹主动去接近他，思想上同他促膝谈心交流感情，互相勉力共同进步；业务上传帮教带，相互取长补短，一起编写复习提纲，一同走访学生家长。正是在包家驹的热心帮助和自己的主观努力下，李忠昌在思想和业务上进步都很快，一九八六年，在本校被评为模范班主任，荣获了市教育局先进工作者称号，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们二人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一九八六年全国高考中他们二人所教的理科班数学最高得分为103分，平均达67.1分；文科班数学最高得分为105分，平均达61.1分。当年，包头蒙中的升学率名列自治区民族中学中第四位。

包家驹又是个多才多艺之人。他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酷爱文学艺术，《锡盟日报》登载过他的文章；《内蒙古文艺》发表过他的作品。他编导的歌剧《云岭山鹰》和《牧羊鞭》曾荣获过旗文艺调演创作、导演一等奖。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两周年之际，他昼夜创作的诗歌大联唱《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经过全校教工认真排练后，在校内外演出均获得极大成功，社会上产

生了巨大反响。后来，该大联唱在锡盟各地被许多单位移植演出，那些饱含激情的诗句曾长期被人们抄录传颂。

冬去春来花飘香

一九八四年昆区政协成立，包家驹被推荐为政协首届委员，一九八五年，当选为包头市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现在他是蒙中数学教研组组长、包头市数学学会会员、数学研究会理事，又是昆区政协二届委员。他的朝夕相伴，共过患难的妻子被市里命名为三八红旗手；他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曾身陷过囹圄的弟弟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蒙古族青年作家。

是啊！鲜花总是向着那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开放。包家驹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的在教育战线上奔波，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教育事业，绝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成名成家，而只是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甘当下一代的人梯，用心血点燃初升的太阳。

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副秘书长、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老有所为精英奖”获得者小志

〔满族〕关铁玉 刘捷

在包头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全体人大代表一致通过，确定从1988年起，每年9月1日为包头市“敬老日”。在这个日子里，全市都要以各种形式，隆重庆祝和表彰老有所为与敬老养老的先进人物。

在全市首届“双奖”评选活动中，共评选表彰了“老有所为精英奖”获得者50名，“敬老好儿女金榜奖”获得者76名。其中我区老干部杜守恒、卢子岩二同志，荣获“精英奖”。

杜守恒，男，61岁，中共党员、民盟昆区支部委员，昆区政协委员，区委宣传部离休干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担任战地宣传与记者工作。离休后谢绝外单位的高薪聘请，仍服从组织和工作需要，留在政协机关尽委员义务，为编辑出版《昆都仑文史》与《昆区政协通讯》作贡献。从首届昆区政协委员会以来，经他亲手征集、研究、编辑、出版的《昆都仑文史》已有五辑，近80万字，《政协通讯》14期约12万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离休后编辑的。由于他在文史工作上成绩斐然，虽已离休，仍连任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杜守恒从事文艺工作多年，长期担任昆区文学艺术界的组织领导工作。经他具体辅导和培养的文学青年，有的已成为作家、诗人。离休后，他受上级领导委托，于1987年春筹备召开了昆区文代会，当选为区文联副主席兼文协主席。他还创办了《鹿原》

文学报，现已出版26期，约50万字。另外，还在昆区建区三十周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献礼活动中，经他组织和编选出版了《鹿原》文学作品集四部，约80余万字。

他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和内蒙古摄影家分会会员，离休后一直笔耕不辍。四年来，仅用民间文学形式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作品，即在十多家报刊上发表20多件，他还协助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创办了《塞风》民间文学杂志，并当选为编委。他在摄影艺术方面造诣也很深，曾受区委和区政府委托，在百忙中参与了“张海迪式的好青年—王桂芝事迹展览”、“包头市蒙古族小学建校三十周年校史展览”和“昆区精神文明建设成绩展览”的拍照工作。仅三个展览，就收展了他的摄影图片300余幅。

由于杜守恒在离休后继续发挥光和热，为党作出了可喜成绩，连续四年被选为昆区先进老干部。1987年10月出席了包头市各界爱国人士为四化做贡献经验交流表彰大会，被授予先进个人称号；1988年6月，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离休干部发挥作用经验交流会，被授予先进个人称号。同年“九·一”，在包头市“双奖”大会上，他受大会委托，代表全市“老有所为精英奖”的获得者讲了话。

卢子岩，男，64岁。昆区防汛指挥部离休干部。曾先后在华北军区体工队、包头市体委等部门从事体育工作。1986年离休后，某厂拟用高薪聘请他做顾问，被其谢绝，甘愿分文不取，为本区近二百名离休干部的晚年健康尽义务。在他的辛勤劳动、挨门逐户宣传动员下，于当年7月组成了昆区老年门球队。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他和另一同志联系场地、器材，并迅速组织队员投入训练。他从基本功教起，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解要领和操作方法；对反应慢的老同志，他手把手教，逐渐使手脚不够灵活的队员们都产生了兴趣。接着，他又耐心地教授门球战术技巧。很快，把一个从没摸过球杆的老年门球队，办得生龙活虎。两个月

后，以卢子岩为教练的昆区门球队，便在全市老年门球运动会上，荣获第一名的战绩。同时，他还组建了老干部汽排球队，也不断训练队员和选拔尖子。在全市比赛中都赢得很好的成绩。截至1988年7月，昆区老年基层门球队已有16个，区联队3个，队员总计逾百人。其中有多人原靠吃药度日，靠手杖走道，自从卢子岩组织起这些门球队之后，他们个个青春焕发，红光满面了！

在卢子岩同志的倡议下，1987年成功地举行了昆区第一届“老运会”，先后组织了大型比赛3次；组织代表队参加全市老年门球赛12次。尤其同年7月间，在全市六个单位联合举办的门球赛中，同28个硬队角逐，昆区队在这次比武中夺得了冠军，捧回了“金杯”。教练卢子岩，受到广大老干部的一致赞扬。

由于卢子岩在体育事业上成绩斐然，1987年5月昆区政协换届时，被特邀为文化体育组成员，并列席了各次全委会议。现在，他还连任着昆区老干部协会委员、昆区老年体协副主席、包头市排球协会副主席等职。他不贪恋金钱，不图安逸清静，自我劳累，为昆区老同志的体魄健美作出了优异成绩，因而在1987年我市召开的首届老干部代表大会上，荣获先进个人奖；1988年6月，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离休干部发挥作用先进个人称号，随后又出席了内蒙全区老年体育工作先代会，被授予先进个人称号。同年“九·一”，在包头市“双奖”大会上又获“老有所为精英奖”。

关铁玉，包头七中副校长；刘捷，区委宣传部干部。

编 后 记

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首届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四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昆都仑文史》第五辑与大家见面了。

这是我区全体政协委员、广大文史撰稿人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爱国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奉献的又一丰硕成果。在此，我们向一贯重视和支持《昆都仑文史》工作的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区政协各委员和为本辑文史付出艰苦劳动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昆都仑文史》第五辑，从征稿到编排，始终受到领导和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包钢党委书记史玉华、作家李汀，市政协副主席顾钧等许多驻区单位的负责同志，都在百忙中为本辑文史撰写了价值较高的稿件；区委老干部局，也为我们征集和选送了本区离休老干部撰写的、内容生动感人的革命斗争回忆录；有些政协委员，特别年事已高的郭体绪、李光珍、易磐等同志，这次都提供了“三亲”史料。在审定稿件时，不仅分管文史工作的政协副主席姜兴始终亲手校阅，而且主席乌力吉、常务副主席白玉，也亲临文史委员会议，同大家一起认真讨论史料，并对本辑稿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更受鼓舞的是，当本辑文史发稿前，区委书记李敬三同志，也应约为我们撰写了诗作。在建国四十周年印刷任务很重的情况下，驻区的内蒙古教育印刷厂，首先安排了

本辑文史的排版印刷。这些，都是确保《昆都仑文史》第五辑预期间世的重要条件。

文史工作，在我们这个建区只有三十多年的钢铁工业基地来说，一开始就有重重困难。如果严格遵循征集史料的“上下限”，那么从戊戌变法到建国之前的五十年，这里还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之一角，虽不能绝对说此地未曾有过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查来访去确实寥寥。真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奇迹般地出现了遐迩闻名的“草原钢城”。因此我们认为，人民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和探索新路子。这就是：调动“三亲”人士，撰写钢城三十年；并在“服务包钢，发展昆区”的思想指导下，以写人物活动为主。在人物史料中包括健在的、为群众公认有成就有影响的人士。尽量注重史料题材、体裁的多样性，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强调短而精，但也重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情节具体细腻、文笔隽永贴体的长文。我们意在针对昆区历史短、位置重要、人才荟萃的实际，把《昆都仑文史》竭力办出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乡土教材”。

由于我们努力不够和限于编辑水平，虽然过去几辑都是这么办了，但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本辑，因争取时间，在选编工作上不深不细，肯定存在许多缺点和不周，敬请各界人士多多批评指正。

昆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年6月20日

主編：杜守恒 包广仁
编辑：马国庆 卢月文
校对：王秀兰 李慧芬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昆都仑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

作者 =

页数 = 2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